

星洲工人运动的历史行程

(1930年——1963年)

杨小黑 编著

本文分三个历史时期阐述：——

前言

一、1930年至1947年（非法、半合法时期）

- (一) 工运的先行者与第一间建筑工会的成立
- (二) 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星火燃烧
- (三) 日本占领时期的工人斗争和星华义勇军抗敌
- (四) “和平时期”的工运活动与面对的问题
- (五) 全星馬工人群众支持“新宪草”运动

二、1948年至1959年

- (一) 纺织工会的成立与领导罢工斗争
- (二) 各业工厂商店职工联合会的成立——工运领导中心
- (三) 福利巴士工潮爆发和演变
- (四) “各业”工联会务的发展和活动
- (五) 全星建筑工友联合会的诞生
- (六) 星英宪制谈判与工会的要求
- (七) 一九五六年“九一八”事件与反迫害斗争
- (八) 建筑工联与各工团联合发表声明
- (九) 泛星各业职工联合会的建立与发展过程
- (十) 1957年8月22日大逮捕事件

三、1959年至1963年

- (一) 1959年新宪制大选及人民党事件
- (二) 建筑工联的会务活动和出版物
- (三) “泛星工联”的会务活动
- (四) 抗议鲁孟巴被害和芳林补选风波及捍卫民主权力的斗争
- (五) 有关工人运动的统一与团结及职工总会的组织

后语

写点林清祥

炼狱

星洲工人运动的历史行程

(1930年——1963年)

杨小黑 编著

前言

1930年代，馬來亞（含星洲）工人阶级走上了历史舞台，就一心一意、毅然决然肩负起历史使命，领导了各民族人民的民族解放事业的斗争，坚决反对英殖民主义者的奴役统治；为争取馬來亞的独立、民主、自由的实现，进行了长期、艰难、浴血的殊死斗争；同时也带头组织动员各民族工农大众起来反对压迫、剥削和迫害的政治经济斗争，争取改善各民族工农大众的生活待遇和工作条件，提高了人民大众的政治觉悟，为民族解放事业；为抗日卫马时期的反日本法西斯侵略的斗争，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和不可磨灭的卓越贡献。

战后，星洲工人阶级秉承过去的优良传统，当面对着英殖民统治者继续占领，依然进行压迫、剥削和逼害；当英殖民者悍然颁布“紧急法令”进行镇压逮捕时，也一样敢于起来抗争，决不退却放弃斗争，不怕流血牺牲，依然走在时代前线，奋不顾身的战斗到底的光辉事迹，谱写了可歌可泣的历史篇章，给人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

他们的丰功伟绩，他们的英雄形象，让人们广为互传至今。我们决不应忘记他们血的磨炼而筑立的血碑！才有今日我们的社会发展而繁衍起来。因此，不能让过去的工人运动历史留下空白，更不能让异类人及其御用文人一笔勾销掉；企图私自抹煞掉历史事实；或塵封不见于史册；或篡改史实，把工人群众铸起宏伟贡献贬入另册，永不见天日，以此蒙骗世人！历史终究是历史，历史事实也终究是历史事实。历史事实的判断是不能以“胜者为王，败者为寇”来考量，更容不得掌权者、附庸的刀笔吏随心所欲的编造、篡改，甚至把历史斩断，利用代表“人民利益”的幌子，颠倒黑白，极尽歌功颂德的能事，大量宣传美丽的谎言，变成即定的假是真。把反对英殖民统治，争取国家独立的斗争，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胜利果实，全归功于他们这些所谓超级精英、机会主义的政客们！我们不应忘记独裁当政者对民族解放和民族国家所造成的危害行径，对各民族文化教育强行乖离了正轨发展的施策所加诸的后果！

凡具有良知的、有正义感的、真心诚意为人民利益而奋斗的人，是不怕被专横、恐怖、暴政的威迫、利诱、陷害；耍弄“诽谤”名堂而致人于死地的倾家荡产的手段所吓倒！历史的真实一定会摊开示众，还我历史的真面貌。更何况馬來亞（含星洲）的真正的民主运动还没有取得成功实现，人民的民主、自由权利没有真正得到，我们还必须继续努力！

一、1930年至1947年（非法、半合法时期）

（一）工运的先行者与第一间建筑工会的成立

战前，英殖民统治者采取压制与迫害的摧残手段，对付工人运动，剥夺工人的言论、结社集会的民主自由权利，工人不能合法组织工会，不能举行罢工行动，有关工人改善生活待遇和工作条件的要求无法实现，劳资纠纷无法得到合理解决，致使许多工人群众处于水深火热中。1930年代，星洲工人阶级走上了历史舞台，开启了工人阶级为解放人民的历史任务。工人阶级的先进份子则积极进行宣传教育，组织动员各民族、各行业工人，提高工人的觉悟，自觉组织工会，以集体的团结力量，争取改善工人的工作条件和生活待遇；反对英殖民统治，以各种形式和方法，开展了经济、政治相结合的斗争，力图改变工人阶级的命运。他们组织了地下行业工会和地下星洲总工会，领导了各民族各行业工人开展斗争，推动了工人运动的发展。

为了利于集中号召，组织动员、教育、培养工人骨干，想方设法建立了公开、半公开的结社组织，例如“星华建筑工程公司”、“公司房”、“估俚间”和各业的“互助会”、“联友社”等等，进行各种合法活动，广泛地联系、团结工友，发扬互助精神、帮忙救济失业、饥饿的工友度过难关；同时也利于举行各种活动，号召动员工人们展开共同的斗争，磨炼了工人骨干及锻炼了工人的斗争意志力。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哪里有剥削，哪里就有斗争，这是无法抗拒的现实规律。当时在建筑工地工作的先进份子，目睹建筑工人遭受的压迫和剥削感同身受，遂决意积极开展宣传、教育活动，向工人宣传必须团结组织起来，成立工会的重要性，这样由先进的建筑工人李良领导及组织的星洲的第一间建筑工会终于冲破了各种困难而成立了，时为1930年代中期。由于建筑工会处于地下状态，不能公开合法活动，斗争遭遇到许多困难和阻碍，他们却也利用各种形式和方法进行改善建筑工人的生活待遇。而且取得了初步胜利，扩大了影响力。

由于建筑行业的特殊性，建筑商包到建筑工程又承包予二手包工，二手包工又把各门类的工作分别承包予三手包工，形成层层包工制。建筑工地虽搭有“万山”，楼上供工人留宿或休息，楼下贩卖伙食及茶水，却都是临时性，一俟建筑工程完成，就得迁移，工人也就失散了，所以工人的流动性很大，很难积聚工人的力量，而地下工会又易于遭受镇压，工人运动难于发展。为了积蓄工人力量，指导工人运动，设法以合法的形式进行斗争，当时有一批先进的建筑工人例如李良、陈炳宏、江渊、文燕、余洪等都在建筑工地开展工人运动，他们都是地下建筑工会的工作人员，他们在摸索中找到一种组织形式，即成立了“星华建筑工程公司”（简称为星华公司），他们集合了一批进步的或开明的建筑工程各工种的熟练的老师傅，联合一批积极的建筑工人组成合作社性质的“星华公司”，筹集资金，承接小规模工程或二手工程。同时，公司还附设了一座有几十年历史的旧楼房（在如切一带），上下两层，可供数十人留宿的工人提供伙食，这就成了建筑工人的固定会所。“星华公司”是具有双重性质，一方面是合作的企业，一方面又是建筑工人的联合战斗组织。它既可为社员在建筑工地一旦工作完毕后提供了住宿而留住待业；又可选择社员中待业者到新的工地工作；它更成为了工人的活动中心和有领导的斗争组织。

1936 年星洲各行业工人（例如饼干厂二千多人，市议会印籍清道夫一万多人）到处要求增加工资，改善生活的斗争。建筑工人也行动起来，向建筑商提出要求条件。由于当时官方的“华民政务司”代表资方作为调解人，它却惯用改良、欺骗的两面手法，瓦解工人的斗志，工会识破它的阴谋诡计，因此“星华公司”号召集合了约两三千工人，从办事处出发一路游行示威到“华民政务司”办事处请愿，要求尽快答应工人的要求，后又游行回到“星华”，接连至第三次游行示威到“华民政务司”大门前就开大会讲演不走，而且驻扎了几天，依然得不到回应。随后“华民政务司”和资方以法西斯手段，动用警方以水龙头扫射，摧残了工人的斗争，后来工人改变了斗争方式，继续作坚决的斗争。

“星华公司”成立了一支“星华宣传队”。平时，他们分头奔赴各建筑工地进行宣传、教育和鼓动工作，收月捐、特捐，听取工人的迫切要求，确定发动斗争，例如追讨被捲逃或拖欠的工资和增加工资的要求等劳资纠纷事件。另一方面在宿舍内举办识字班、读报班，进行文化、时事和先进理论的教育。总之，他们锻炼和教育了许多杰出的为人民利益而献身和工人运动的干部。

“星华公司”和地下建筑工会已经是结成一体，分不开彼此。这是当时建筑工会斗争的特殊组织形式，也是星洲工人运动的样板，它在星洲及马来半岛的各行业中享有极高的声望，至今犹有人传诵。

与此同时，由于地下建筑工会的成功范例的传播和影响，许多其他行业的工人纷至要求协助成立工会的工作；他们委派骨干代表去协助地下各业工会的筹建工作及扩大组织新工会的工作。地下建筑工会就成为了促进星洲工人运动的一支突击队，它既团结了各工会及工人，也扩大了宣传和影响力，为星洲工人阶级和人民的反殖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939 年 10 月星洲建筑工人响应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的罢工运动的号召开展了大罢工。建筑工人是一支最坚强的工人队伍。1939 年以来的工人斗争，形式上虽是经济斗争，而实际上是政治斗争。因此，矿工陈路领导的地下星洲总工会决定发动建筑业全体工人争取实现统一的起码的工资及各类别劳作的工资标准。这既是符合建筑工人当时的要求，又能争取到中小包工头的支持或中立，又能配合当时的反帝战争的斗争。这是“一石三鸟”的好办法。

经过充分的估计到大多数雇主可能接受的合理要求程度，作了周详的考虑后，就由工会宣传队分头出发到全岛各处民事军事建筑工场和“估俚间”进行宣传，发动工人作好准备斗争。

当时星洲建筑工地，包括军港的几处军事工程，以及外资和民族资本家的私人建筑，共有十余处，在业工人数千人都受雇于建筑商公会属下建筑商。建筑工人代表向建筑商公会提呈要求，也分别向各建筑商提出。限定一星期内解决，结果谈判不能达成协议，工潮爆发了，所有现场工人都停止了工作，表现了空前的一致和团结。与此同时工人代表以仲裁的建议和调解人的保证，接受了先复工再谈判，复工以一星期为限。由于策略灵活，

利用矛盾，分别谈判，各个解决，期限即到，多数单位已签定了合约，接受了统一工资的标准。罢工恢复不了几天，余者也不得不接受而结束了罢工。

当时还有火电锯工人也在地下星洲总工会领导下展开了罢工斗争。火电锯工厂都集中在加冷路（俗称火城）一带，约有十多家，雇佣了千多内外工人。在先进工人的努力下，争取了积极份子动员工人组织地下工会，又设立了公开的“火电锯联友会”。

他们选择了最先建立的地下工会小组而组织力量最强的广福昌火电锯厂工友，带头向资方提出两项要求：一，增加薪金，改善伙食，二，不得借故开除工人，解雇工人要同联友会商量。两项要求得到全厂工人拥护，资方难予拒绝，未经罢工，就解决了。这激起了工人的斗争信心，纷纷组织起来，就在这时候，火电锯业资方结成“攻守同盟”，要打垮联友会。而工会组织最弱的松林火电锯厂老板受领打先锋，威胁工人退出联友会，开除一位厂干事。工会负责人亲到松林厂动员工人，并由工友选出二位代表向资方提出四项要求：收回被开除工友、增加工资、改善伙食以及罢工期间工资照发，并限定资方 24 小时内答复。松林厂资方非常顽固，进行种种破坏工人团结的阴谋活动，罢工终于爆发了。

由于工会已做好了预定计划，各厂都派来了纠察员，组成了联合纠察队，在该厂周围巡逻戒备，另一方面，各厂又派来了人员，把松林厂员工都接走到各厂住宿、吃饭、作替工（除了纠察人员），并与各厂工友座谈串连。面对着同业工人团结一致采取史无前例的这种罢工形式以及罢工对资方的营业收入造成巨额损失。罢工的第二天晚上资方就不顾所谓“攻守同盟”接受了工人的全部条件。

这两次斗争的胜利，促成了火电锯业工人全面斗争的条件成熟了，各厂都选出了工人代表并召开了全星火电锯厂工人代表会议，一致决定向资方提出多项共同要求，限期 24 小时答复，限期一到就罢工。那些接受要求的复工。而复工的既可在人力和经济上支援仍在坚持罢工，又分化了资方的战线。大罢工进行了几天，各厂资方都先后接受了工人的要求条件。大罢工取得胜利。

1939 年建筑和火电锯业工人爆发的大罢工，对星洲工人来说是第一次既为了改善工作条件和生活待遇，保障工人权利，同时也以国际主义精神支援中国抗日战争的具有经济与政治性的的罢工，而且都取得了胜利。其意义重大，影响深远，提高了工人的政治觉醒，标志着工人运动朝向正确方向发展，肩负了为民族解放的历史使命。

（二）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星火燃烧

1940 年 5 月 1 日，星洲有五万工人群众示威游行，庆祝国际劳动节，遭到英殖民者及其军警野蛮的暴力镇压，射杀了两名染织工人的流血事件，轰动了狮岛。

有文章叙述了这个事件：

“當時要在英帝国主义戒备森严的条件下，组织和领导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实在不容易，但广大的工人群众，终于战胜了重重困难，……举行了盛大的示威游行。参加示威游行的队伍超过五万人。他们人人手持木板扎成的标语牌，从四面八方涌向惹兰勿杀大草场，准备暴力镇压时抵抗。……如遇到挑衅，工人就狠狠迎头痛击。‘五一’前夕，英殖民当局也大肆准备，除了百般恐吓工人群众，更动员了星洲全部警察和其他的部分军队，还从长堤彼岸调来了大批警察参加镇压行动。‘五一’一早，当游行队伍通过芽籠路时，街边人群涌集，口号声震天动地，五光十色的标语牌汇成一条巨龙。‘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工人兄弟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大战’、‘要求改善工人生活’、‘要求开放民主自由’、‘要求释放一切政治犯’……整个獅城怒吼起来了，像春雷响彻大地，人们的热血沸腾，像海浪一样汹涌澎湃，游行队伍在前进。”

“軍警已在路上布下了路障，警察荷槍实彈，截阻群众，游行队伍被挡住了，不能前进了。英帝强令游行队伍要解散，几经交涉，双方相持不下。軍警便殴打工人，特别用野蛮手段对付女工，分段截击，企图把游行队伍分割成小段，各个击破，引起群众更加愤怒，双方隙后发生了正面冲突。這時警棍乱舞，很多工人被打伤了，头破血流。群众以牙还牙，用木棍、汽水瓶石块当武器与軍警展开搏斗。軍警竟然开槍射杀群众，两位染织工友—罗良助和梁清点中弹光荣牺牲了。”

這次的“五一”国际劳动节五万人的示威游行，是为抗议英殖民当局对馬來亞（含星洲）人民以国际主义精神支援中国抗日战争所展开的抗日救亡运动的无理限制与镇压、逮捕的行动；也是为反对英殖民当局支持帝国主义战争，加强对工人的压迫与剥削的斗争行动。

1940年“五一”国际劳动节的大示威斗争，意义是重大的，为馬來亞（含星洲）工人运动的历程谱写了光辉的史诗，也为反帝斗争的史册写上了灿烂的篇章。

（三）日本佔领时期的工人斗争和星华义勇军抗敌

1941年日本法西斯军队从马来半岛吉兰丹州登陸入侵馬來亞，一路長驅直下，而英澳军队却节节败退，有如丧家犬向南逃跑，日軍直到柔佛海峡才遇到“星华义勇軍”的抵抗，保卫星洲为時已晚。

1942年1月間，当日本法西斯的炸弹掉落星洲的时候，星洲工人阶级的战斗堡壘—“星洲各民族各业总工会”在这之前已组织起来了，号召各民族工人团结起来，动员一切力量保卫星洲！

英殖民者却在等到极危急时，才释放被扣留者，而“抗敌后援会”才能得以成立由林江石领导的民众武装部，組成“星华义勇軍”。它迟迟才发放简陋的武器，臨時匆促的训练，彈藥缺乏，加之英軍心惊胆丧，無心抵抗，仅有“星华义勇軍”及工人群众在火線上抵抗敌人的入侵，終寡不敌众，只能退守后解散。日軍的一路黑旗軍由于受到星华义

勇军的抵抗，丧尽天良一路屠杀无辜百姓。而英軍司令白思华就此举白旗投降。1942年2月15日全馬（含星洲）终于落入了日寇魔掌中。那时我还少不更事，却是亲眼目睹的！

星洲沦陷后，日寇進行大檢证，名曰搜捕抗日份子，传令人们集中各个划定的地区，等候检証。结果許多人不明不白的被推上軍車載去集体屠杀，慘絕人寰。当时我也曾偷跑到大坡单边街检举处现场看究竟，人们都被令蹲在地上，不得站立，我目睹日寇用锄头柄殴打站立起来的人的情状，至今不会忘记的！這笔血债是令人难于忘怀的。

这里引述一段文章來說明日寇占领后的活动情况：

“虽然在日寇残暴的施行白色恐怖的屠杀暴行，但是工人兄弟并没有絲毫畏懼，而更加英勇和坚决负起敌后抗日任务，广泛地展开抗日斗争，进行怠工和破坏敌人的工作。許多工人兄弟到敌后参加抗日軍武装杀敌，牺牲了无数头顱与热血来保卫民族利益和民族解放事业的伟大战斗，使抗日运动如火之燎原，这种先锋模范的战斗精神，促成全民全面一致抗日高潮，牵制着敌人的后方，使日寇法西斯在全馬的统治日夜不得安宁，缩短了日寇法西斯的死亡命运。”

从这里可以說明前述的地下的“星洲各民族各业总工会”的成立及其领导的工作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光輝燦烂的战斗历史。这火种的流传而发扬光大，随处牵敌，使敌不宁，是有着极深刻的历史意义！

1945年8月14日日本天皇無条件投降的消息传来，人们奔走相告，一片欢腾，以为从此脱离了苦海，期待着有希望获得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

有一本1947年4月15日出版的“星洲一年來的工运”，曾这么描绘：“日本宪兵刚从‘金龍大厦’搬出，英勇的建筑工人就进去召开建筑工人大会，筹备组织工会了，所有的工場都相继停工了，工人们没有一个不在忙碌着，一方面进行筹备和复兴自己的工会；一方面广泛的进行着组织保卫团、治安队、除奸团，发传单，贴标語，宣传演讲……进行维持社会秩序等治安工作，配合着刚从内地开到星洲的人民抗日軍，迅速地把纷乱不堪的星洲社会秩序安定下来；一切在‘昭南’时代明目張胆，为虎作倀的敌奸走卒都已消声匿迹了。”

這说明了战前和敌佔时期地下工会的组织和潜伏着的工会人員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所以日寇投降时，他们能极迅速又有组织地起来肩负起维持社会秩序的治安工作，稳定了社会秩序而作出了贡献。

（四）“和平时期”的工运活动与面对的问题

日寇投降后，全星工人陷入穷困和饥饿状况中，极需救济，英軍政府不仅不给予救济，反而雪上加霜地悍然宣布无贖废弃日本軍用票的使用，造成严重的灾祸，使到絕大多數工人没有分文维持生活，使中小工商业者破产倒闭，絕大多數工商业不能复工复业，使廣大工人群众陷于失业、饥饿痛苦的深淵中。

当时全島各行业的工会，曾普遍进行失业登记，要求英軍政府救济并安插失业工友之举也告徒然，引起了工人們的极大愤慨！

本來全星工友們在英軍接管馬來亞（含星洲）后，他們热切希望英軍政府能根据国际宪章，在民族自決的原則下，建立馬來亞（含星洲）各民族自治政府，实现民主，改善民生的合理愿望。但残酷的现实，把工人們的幻想无情的毁灭了！

在這種严重的局面下，当时的建筑工友會于 1945 年 9 月 18 日召开了各行业工人团体代表座谈会，一致要求恢复组织“星洲各民族各业总工会”并成立了十七人筹备委员会。在筹备期間，由于工厂继续倒闭，商店关门，物价天天高涨，在不得已之下，9 月 26 日有数千工人集体游行至劳工司请愿；30 日又有七千餘工人到劳工司要求，但当局完全不理會工人的痛苦和要求，却採取敷衍的态度，不设法给予救济。在這種情况下，“总工会筹委会”只得召开工团代表大会，组织救济委员会，向各界社会人士募集经济、物质、米粮等救济失业工人，并供应每人每日二顿饭，长达一个月之久。

由于英軍政府只热衷于稳固其統治政权而不理會工人的困境和要求，也不改变过去的奴役政策，仅作政治上的某些改良；在劳工和工资政策上仍旧如故，工人没有民主权利，反而变本加厲地进行压制和剥削，结果造成码头、煤炭、起落货、电火局、香业等共有八千名工人相繼为改善生活待遇等要求不遂而罢工，当局不但不解决工潮，反而採用恐吓手段，威胁工人领袖，逮捕工会宣传队员，下令驱逐码头工人出宿舍，迫使工人流离失所。遂由九十个各民族工团于 10 月 22 日提出抗議政府無理逮捕工人的四項要求。

在這種情况下，全星工人阶级就更迫切要求团结的热望下，“星洲各民族各业总工会”于 10 月 25 日正式成立了。有一百十余单位参加，拥有廿余万华、巫、印各民族工人。這是星洲工运历史上空前事件，也促进了各民族工运向前发展，同时更增强和提高各民族工人争取民族解放的信心和决心。这时期的大多数工会处于半合法。

1946 年 1 月 29 日爆发了全馬工人及各民族人民的总同盟大罢工事件，抗议英軍政府摧残人权，逮捕抗日有功人士，反对恢复 1940 年法令的斗争。在星洲“1·29”总同盟罢工則是为了要求人权的保障和人身的自由，促当局改变旧殖民地奴役政策，接纳人民的意见。罢工工人有廿万人。因为單在一月底止就发生了当局搜捕建筑、机工等团体三十余人，搜去物件，摧毁和没收小販貨物三十多摊；开枪镇压工部局和医院和平請願工人等事件。

接着在 2 月 15 日前后，英軍無理开枪击毙二名印族工人，动员大批軍警，分头围搜全星各团体机关，开枪威吓逮捕了二十余人，搶夺总工会所有文件记录，抓走总工会常委 SA 加納帕西（全馬职工联合会主席）及工作人員十一名；遂酿成“2·15”流血事件。当人民纪念“2·15”游行时，竟遇到全副現代武装配备的大批軍队开枪射殺游行队伍，二人當場毙命，數十人以上受伤等残暴行径。

跡后更逮捕、驅逐“馬总”秘書長、“星洲总工会”主席卢成，秘書長林文金及谢天、王文时、陈振春、王梅香、韩亚春和面包工会主席沈传福，建筑工会主席劳向，文化界民主人士陈公侯，“新民主报”总编辑、“血碑”編者陳如旧等史称“十君子事件”；還有教师公会主席、华僑中学校長薛永黍，后被用非法手段致死；2月15日，林垂亮为了主持追悼抗日時期牺牲者而举行的大集会，遇到英殖民者的無理阻扰和破坏，出动大批軍警、坦克車冲進会场，大肆逮捕和枪杀手無寸铁的集会群众，他为了群众的生命安危，舍生忘死，挺身而出，結果被捕入狱。这个事件，引起了人民的愤慨，很多社会团体經常组织游行示威到西籠敏（即后的欧南园監獄，今已不存在）監獄門前抗议和声討，使英殖民主义者惊慌失措，释放不行，不释放也不行，就暗地里下了毒手之后才放他出獄，一星期后，他的心脏突发扩张，停止了跳动而逝世。這一事件頓使星洲社会震惊，激起广大群众的無比愤怒！

林垂亮举葬当日，举行了一个隆重的追悼会，參加送殡人潮汹涌，约有二万余人，从密駝路到武吉智吗六哩，游行示威，高喊口号“打倒英帝国主义，血債要用血來还”，控诉英殖民者的血腥镇压罪行！這是当日參加送殡者的回忆记录。

英殖民者就是這樣恐怖地草菅人命，正如它們所說的“宁可錯抓千人，不可放过一个”，所以当时被逮捕、驅逐、監禁的爱国民主人士和工运人员不計其數。

1946年9月至1947年9月一年内，在星洲发生的工潮据不很完全的统计共有117单位。參加罢工的主要部门有：沿海、工部局各部门、交通部的電車、巴士車、罗厘車、三轮車、鐵道等，建筑各部门、机器部门、电气部门、胶业部门、生产业的火鋸、漁业、酒类及手工业等，其他如店员、报販、戏院、書記、难民、农民等，此外尚有英国空軍及士兵的同情罢工，当时参加罢工的成分是非常广泛的。在可能統計參加的人數中，計有要求改善工人生活待遇而未罢工的有五万五千九百七十九人；經過罢工的有三十六万八千八百九十六人；属于经济的有十一万四千一百七十四人；属于抗议摧毁民主和同情罢工而帶有政治性质的有三十一万七千零一人，总共人數四十二万四千八百七十五人。（星洲一年来的工运）

（五）全星馬工人群众支持“新宪草”运动

由于英殖民者罔顧民生，不管人民的死活，陷工农大众于水深火热中，迫得人民大众不得不用行动起來抗争，它却依然故我，不願順从民意，解决民困，反而用残酷的暴力手段对付人民，引发了工人們的义愤填膺，更引起了全馬各民族、各行各业人民要求独立自主的訴求，而英殖民者却表面上答应民主改革，以政治改良欺骗來应付。

它先由总督、各州苏丹及馬來民族統一協會代表联席会议委任“工作委员会”，提出了“报告書”。实质上却举行多次“秘密会”，后又委任少數“馬來封建贵族”及其御用工具人士組成“协议委员会”所謂征集民意后，抛出了一个“政制建议书”于1946年12月20四日公布后，經過总督、苏丹及馬協代表三次秘密会议，再由英殖民部數度考虑后，又抛出了一个“政制建议修正书”并于1947年7月24日正式出籠了，企图使英国成为

馬來亞永久合法的統治者，其中要害的是把星洲歸為英國直轄的海峽殖民地，而馬來半島九州、檳城及馬六甲合為馬來亞聯合邦。

這就是英國慣用的瓜分殖民地，分而治之的統治手腕。它剝奪了人民的公民權利，而欽差大臣則成為太上皇。這樣的“修正書”當然受到全馬全星各民族，各界人民的強烈抗議，反對聲浪群起，怎么也壓不住心頭怒火，火冒三丈！

早在“建議書”頒布前幾天，星洲各政黨各團體代表舉行了一個會議，成立了一個“聯合行動委員會”提出了三大綱領：一、新加坡應包括在統一的馬來亞內；二、由普選方式產生全馬的中央立法機構，以建立負責的自治政府；三、凡以馬來亞為其永久家鄉，並對之效忠者，應享有平等的公民權。

1946年12月22日在吉隆坡召開全馬各政團的代表大會，正式宣布成立“全馬聯合行動委員會”；1947年2月22日，在馬來國民黨及馬來進步青年團的號召和主持下，全馬六十七個馬來團體代表大會，也成立了“馬來人民聯合陣綫”（後來增至七十四個）大會也一致反對“政制建議書”。

領導民主運動的兩大團體終於聯合起來，並在星洲起草共同的“人民新憲草”，經過了二次會議，通過了“新憲草”，並成立了一個十三個團體的“工作委員會”和由五個團體組成的“憲法運動小組的委員會”。

一個是由英殖民者導演的“政制建議修正書”是分而治之，伏筆於分化馬星民族關係而使英殖民者易於煽動民族分裂，易於燃起種族衝突製造流血事件，以達到英帝國主義者永久統治馬來亞的邪惡目的。而星洲則可成為其搜刮馬來亞財富資源和控制的軍事的橋頭堡。

一個是由“全馬聯合行動委員會”和“馬來人民聯合陣綫”一致提出的“人民新憲草”，是人民爭取獨立民主的權利，實現馬來亞民族獨立自主，民族自決而建立一個新馬來亞的無可爭議的要求，是人民的迫切願望！並訂於1947年10月20日總罷工罷業一天。這一統一的行動是由“全馬聯合行動委員會”和“馬來人民聯合陣綫”所共同發動的。這是全馬性的各民族人民的偉大的政治總動員，是反對當局的“政制建議（修正）書”及擁護“人民新憲草”的人民的怒潮在汹涌着！這也體現了全馬各民族人民團結一致的共同心聲和行動的深遠的現實意義。

當時“星洲各民族各業總工會”也曾召開四十二工團代表大會，通過20日全體總罷工一天，也通過總罷工罷業宣言，號召宣傳、動員支持總罷工罷業行動。

領導這次的民主運動的兩大政團：一是“全馬聯合行動委員會”，主席是僑生界有名望的領袖陳禎祿先生，秘書是馬來亞民主同盟余柱業先生，團體委員：馬來亞民主同盟、印度國大黨、泛馬職工聯合總會、抗日軍退伍同志總會、馬來亞新民主青年團、全馬各州的婦女聯合會等總數近四十萬人。一是“馬來人民聯合陣綫”，主席是馬來國民黨副主席依沙先生，秘書是馬來國民黨總秘書阿都哈密先生。委員：馬來國民黨、馬來進步青

年团、馬來农民協會、各州的觉醒妇女協會、各州的馬來激昂学生联合会、全馬馬來經濟委员会、全馬馬來宗教委员会等，会员总数有十多人，参加团体有七十四单位。

有关“新宪草”的提出及共同行动，各团体负责人发表了谈话。

全馬联合行动委员会主席陳禎祿发表了重要谈话。

馬來垂民主同盟秘书余柱业说：“总罢工证明了全馬一切有组织的人民已经明白表示了完全拥护‘人民新宪草’，完全反对‘改制建议（修正）书’。总罢工的意义被普遍了解，有力的影响还未组织的人民也起来了。”

中国民主同盟的胡愈之则说：“用总罢业来表示出人民对于政治问题的意见，这种办法是非常民主而且合理的。”“我们同情馬來垂人民争取民主自由而奋斗的民主战士，我们表示诚挚的钦佩与最大的敬意。”

中华总商会主席李光前也说：“关于新宪草中主張建立一个民族院，解决民族间问题，这是很好。今天最主要的各民族应该和好合作，尤其是在大家一致反对不民主的‘建议书’的时候。”

全馬的总罢工罢业胜利地举行，这标志着全馬各民族人民的政治觉醒；是全馬性的各民族各阶层人民的民主运动的先声，争取民主，争取独立，争取自由的偉大斗争；是目标一致，团结一致，行动一致，各民族人民有着共同綱領的斗争行动；是空前壮举，令英殖民統治者胆寒而动摇了它的統治根基的致命伤，应永久地載入馬來垂（含星洲）的史册。

战后和平时期及颁布紧急法令时期所发生的一系列动乱事故，不是无缘无故发生的，我们可以很清楚看出个中缘由。抗日战争胜利，人们欢天喜地，以为从兹可以改变了人们的命运！可是由于接受了国际奸细莱特预谋设定的圈套，不察究里，没法识穿它的阴谋诡计，而放弃了争取马来亚独立的綱領，解除了抗日武装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路线，而没有把握当时有理有利的时机和条件，动员广大人民行动起来，更朝前一步，坚决抵抗英殖民者的再佔领。

当人民面临生死关头，迫不得已时诉诸行动抗争，却被诬指为制造局面混乱，而无情地采取暴力镇压、逮捕、驱逐、枪杀等不法手段，对付手无寸铁的人们。这就是真实的“恩将仇报”的可耻面目。

英帝国主义者忘了人民大众不計前嫌，于 1948 年 6 月 20 日悍然颁布“紧急法令”，实施白色恐怖统治。藉口“内乱”，避开国际法，利用鬪乱的名堂加诸人民各种罪名，把正当合法的抗争行动，說成“恐怖活动”，把反抗者冠予“恐怖份子”，事实是他们进行了一系列的屠杀、迫害、焚烧村庄、砍頭示众、迫迁行动、立新村牢笼姦淫擄掠濫杀无辜等等罄竹难书的無人道的行径，才是货真价实的“恐怖分子和恐怖活动”。当日軍侵占馬來垂（含星洲）时，它退却逃跑、投降，没有尽本应尽的责任保卫馬來垂！和平后，它本已没有任何合法的理由再踏上馬來垂。

当日本投降时，马来亚抗日军已迅速组织成立“人民委员会”，维持社会秩序，这说明人民是有能力管理自己的国家，无须英殖民者越俎代庖！

如今伦敦的档案局所揭示出来的，证明了英帝国主义者的暴行的事实！再也不能自圆其说了，再也不能蒙骗世人了！虽然这已成为了历史陈迹，却不能被涂抹掉殖民地战争把马来垂夷为血海，使人民长期陷入苦难中的悲痛事实！

五十年代有一首广为传唱的歌曲：“我爱我的马来垂”：

“我爱我的马来垂，马来垂是我家乡。

日本时期不自由，如今更苦难，

谁知狗去猴子来，马来垂成血海！

兄弟们呀姐妹们，不能再等待。

同胞们呀快起来，不要再等待！”

当你唱起这首歌来，就会影像出悲痛的现实境况来，也会缅怀前人的大无畏的不屈精神，鼓舞着继续奋斗！

二、1948年至1959年

1948年6月“紧急法令”实施以来，白色恐怖笼罩，星洲人民群众反对英殖民者的奴役政策、压迫与剥削，要求改善工人生活待遇的罢工斗争依然频频发生；要求民族独立、民主自由的呼声响彻云霄，各种抗议行动时有出现。英殖民者（当时是工党执政）顽固坚持旧殖民地政策，不顺民意，还政于民，反而采取残酷的暴力手段，进行殖民战争，屠杀抗日有功人士、群众运动领袖和职工会负责人和干部，大举搜捕、监禁、驱逐成千上万民主爱国人士出境，据统计共有一万五千人以上等骇人听闻的数字。

1949年5月4日，马来垂职工联合会主席加纳栢西，就是被英殖民者所绞杀！这种凶惨的冷血手段并不能吓倒工人群众！

1952年12月29日，星洲英海军基地雇员就开展了要求增加工资和生活津贴的大罢工，海军部门的医院工人亦参与了罢工。这次罢工获得星洲各业工人的支援，当时的劳工组织捐助十万余元支援罢工工友。

“紧急法令”颁布后的四年半，英帝国在马来垂的殖民战争和追随美帝国的“禁运政策”，马来垂的经济情况日益恶化，通货膨胀，人们生活费不断上升，使工人阶级日益贫困。海军基地工人大罢工和工人群众对罢工工人的支援，表明了马来垂（含星洲）广大工人群众正为反对英殖民战争政策所造成的恶果和捍卫切身利益而积极斗争。

虽然英殖民当局於 1946 年 5 月以后，曾公布“职工会注册法令”，职工会可以进行合法斗争，但是“紧急法令”一实施，许多积极的真正为工人谋福利的职工会，都被无理取缔而不能存在了！仅有的黄色、灰色工会，例如林有福的“职工总会”及其属下的行业工会和资本家御用工会等。由于白色恐怖的侵袭，工运处于低潮，局面陷入沉静状态。

迨至 1953 年底，工人的命运及处境並沒有改变，依然处于饥寒交迫中，失业、工资低廉、工作条件苛刻，无法维持生活；而顽固资本家又不許工人组织和参加工会，利用各种条件迫害工人。在这种情况下，工人群众已是忍无可忍了！随之各行业的工人们纷纷组织起来，筹组各自行业工会，不顾白色恐怖，依照“职工会注册法令”注册，展开合法活动。虽然还有逮捕、驱逐、封闭等事件，但是工人运动却广泛地开展，虽有起伏，终于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力量。

（一）纺织工会的成立与领导罢工斗争

1954 年 9 月馬來亞纱厂的青年工人，终于起来反对资本家蓄意迫害开除工友及要求改善生活待遇及工作条件而罢工。馬來亞纱厂是李乃偉從香港移來星洲于 1953 年 2 月开设的一间纱厂，工资低廉、工作条件刻薄，入厂工作还要交保证金，半途不作不能领回保证金；男女工人都要做夜班；工人手脚慢些的经常受到管工的暴力和挨骂；资方无理的任意开除工人。因此，一群富有正义感的积极的青年工人起来组织工友，筹组工会。当厂方得悉消息后，暗中通过政治部人员在一个深夜包围工人宿舍，大肆搜查，并抄录工人的居民证。资方利用这一举动，企图恐吓威胁工人屈服但不能得逞。

这群年青小伙子坚决要筹组工会，却在注册工会问题上遭遇不少阻碍。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不得不寻求林有福的“职工总会”协助。由于当时是“林德宪制”即将举行第一次“民选”政府，林有福愿意协助，却提出二个条件：获得注册后必须加入“职总”，由“职总”委派一名受薪秘书。他们無計可施时只得接受条件。由于工会没有合法地位，难于与资方谈判，一旦采取工业行动，又会变为非法罢工，资方即可与警方采取行动对付。当时已有四百多巫、华、印各民族男女的纱厂工友们，已意识到随时会被开除解雇的厄运，必须团结起来，展开斗争，才是一条活路！於是工会提出改善生活和工作条件的要求，要求资方谈判却得不到回应，遂於 9 月 9 日发动罢工抗议行动，虽经数次谈判都不能达成协议。罢工期间，屡遇警方干扰对付，而林有福也曾到场慰问工友，向警方交涉，有一次我曾見他在现场作秀表演，展示同情罢工；罢工其间也曾遭遇到私会党的威胁破坏等。而“职总”仅是做戏表演而已，他们已意识到只有靠自己工人的团结力量进行抗争，才能取得最后胜利。

这群青年工人朝气蓬勃，敢于冲破各种艰难险阻，一心一意团结工友坚持斗争，赢得了工友们的信任；也获得了社会人士及各行业工人的支援；尤其是各中学学生经常到现场慰问，给以精神和物质的支援！这之前正值学运发生的“5·13”事件也是在社会人士和各业工人的支援下取得了胜利。学生们已认识到一方有难多方支援的重要性，这种自觉

地相互支援，众志成城的精神鼓舞，而发动学生到現場支持罢工工人的斗争，也是学生们正义感的伸张，是无可非议的！不像有人乱说是受人指使的。

纺织工人坚持了 59 天的罢工终于取得了胜利。

纺织工会领导的工潮之所以爆发，可以看出资本家利用紧急法令实施的时机來迫害工人，不肯和工会谈判协商解决劳资纠纷，反而登报公开解除雇佣关系，這等于开除了全体工友，又利用劳工司介绍新工替代罢工工友，新工发觉被蒙骗反而站到罢工工人一边；它一而再地利用私会党恐吓工友；更何况“职总”的态度暧昧，如果不是各民族工友团结一致，坚持斗争，並得到工农学各界的支援，要取得胜利談何容易，更何况這都需要拖延了近二个月才能获得解决。是紧急法令实施以來最長久的工潮！纺织工潮胜利的意义，是纺织工友在白色恐怖迷漫的威逼下敢于站起来斗争的先声，对星洲工运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罢工胜利结束后，工会负责人总结經驗，意识到必须鞏固工友们的团结，提高工友的思想觉悟，认清当前的局势，提高警惕，保持工会的活力，才不会得而复失。這需要在工会内开展宣教和文娱活动，举办文化識字班、巫文班、戏剧活动、舞蹈唱歌，設立图书馆等。这样才能增强工会力量，扩大工会影响力，迎接未来更大的挑战，实现工人阶级的愿望！

不应该忘记的是当时纺织工联会的总务罗华林，是工会的创立者，也是工潮的领导者却在 1955 年 6 月 11 日，被英殖民者以“公安法令”逮捕入獄，却于 1957 年 1 月 21 日不明不白死于牢房里。一个年青有为的工会负责人，就这样死于非命；這不能不引起工人群众痛恨英殖民者及其傀儡们利用“公安法令”逮捕並在牢獄内以慘酷手段迫害致死的被捕人士的罪恶昭彰的罪行！

（二）各业工厂商店职工联合会的成立——工运领导中心

据当时被捕驅逐出境也是“各业”筹委会秘书苏文生的反映，1954 年他受僱于电車公司售票员。由于电車公司工人的基薪很低，“外快”却几倍于工资，而且人人皆分有，形成了一条“外快鏈”，查票员也莫可奈何。后资方采取立法手段对付工人，凡被查出收取乘客錢没給票的就定为贪污罪，可判监三年。工友们恐慌起來，议论纷纷，他们就向工友宣传要有一个真正能够代表工人利益的工会领导向资方提出加薪的要求。由于得到工人的支持，遂召开全体工人大会，选出了新的领导班子；提出了增加工资和撤消对售票员的检控的要求，限时答复，結果资方只答应增加工资，而获得了初步胜利。

由于他不屑于林有福的“职工总会”，希望有个真正的总工会来领导工人的斗争，遂和“轆布染织职工会”主席楊高錦磋商，向他提出另組总工会的设想，并得到大力支持。

1954 年中，在“轆布染织工会”会所召开了第一次筹备委员会会议，出席工会代表及个人相当踊跃。有电車工会主席和执委、三輪車工会代表、硕莪厂王炳煌、建筑工人許垂服、香业師父高脚陳和店员、裁缝師等。会上推举楊高錦为筹委会主席，苏文生为秘书。

工会定名为“各业工厂商店职工联合会”，以劳动者个人为单位会员。会后苏文生去会见林清祥，要求他协助找李光耀当工会法律顾问，并介绍了“各业”的筹备情况，林清祥则答应要尽力把“各业”搞起来。但第二次筹委会会议时，苏文生就被秘密绑架逮捕后被驱逐出境，以后的筹备情况他就无从知悉了。

1954年8月12日，“新加坡各业工厂商店职工联合会”取得了注册证。除了林有福把持的已存在的“职工总会”及其附属工会，当时工人称之为黄色工会外；是另一间成为公开合法活动的真诚为工人利益服务的工会，这标志着星洲工运新的里程碑的出现，是工人大众向往参加的工会！“各业”会务的强力发展和壮大，也成为坚决反对英殖民者的中坚力量，证明了“各业”所遵循的会务方针是正确的，也是继承了先前工人运动的正确宗旨及其奋斗抗争的目标！

“各业工厂商店职工联合会”的第一任主席是杨高锦，副林振国，总务陈国伟；受薪工作人员陈国伟、王炳煌、郭大英、张文友和受薪秘书林清祥等。

1955年间我曾接受许亚服（建筑部干事会主席）应杨高锦的嘱托到“各业”密驼路总部帮作点会务工作时，曾看到林清祥躺在木板凳上休息，因此，我深信他早已在“各业”工作了，也验证了苏文生所说的认识林清祥的话；更何况1955年5月14日“福利工潮”时，方水双、杨高锦等多人在“新公安法令”下被逮捕时，林清祥曾召开了会员大会，并发动会员签名，抗议无理逮捕行动要求马绍尔无条件释放被捕人士，同时以四种语文书写请愿书刊登于各报上（1955年4月14日）。否则，广大工人们将继续罢工。随后被捕者获释。这说明了林清祥是工会的重要人员。几十年后，苏君曾到星探亲时也探访林清祥，他们忆述了“各业”的创会和被封的经过；林清祥也表示想写“各业”创会的历史。只可惜杨高锦、林振国和林清祥等人都已故去，是否有留下历史记录，则不得而知。

大家都知道，紧急法令的实施，星洲工人阶级陷入了灾难深重的境地。工运处于低潮，继续受到反动资本家利用紧急法令的契机猖獗地的迫害与盘剥工人，趋使他们生活于水深火热中，当时有些工人先进分子，不顾个人安危，想方设法筹组或改组工会，以利于公开合法领导工人进行改善生活待遇和工作条件，增加工资的斗争。他们极需要有间强而有力的职工会作后盾。“各业工厂商店职工联合会”的成立，正逢其时，因此，各行各业工人，有个人、集体的参加，会务迅猛发展，从初期的几百人猛增到1956年就已经拥有了三万余名会员。与此同时，马来工友、印度工友，也纷纷加入“各业”，并成立马来部门，专司处理马来工人事务。这样一来，“各业”工会的会务工作非常繁重，需要处理无数的劳资纠纷和罢工事件。有些经过谈判、协商而达致协议签定合约，有些尤其是外国资本家则非行动起来经过罢工斗争才能解决。

为了适应会务的发展，“各业”分别成立了四个区分会，即：1，武区主任：蓝勇东；2，大坡区主任：郭大英；3，小坡区主任：卢大通；巴区主任：郑激发。这才利于团结、联系工人，开展文化、文娱等活动；也利于动员，扩大组织工人，及时处理劳资纠纷等等。

附：“各业工厂商店职工联合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名单：

主席：林振国副杨高锦，总务：林清祥副陈国伟，

財政：王炳煌副郭大英，组织：蓝勇东副张文友，

宣教：卢大通副高扬。

执行委员：何杰、许亚服、魏忠立、邱彼得、陈亚容、陈亚送、郑激发、林石塔、
王金星、白庚碇、邱有才、陈水生。

1956年2月2日，“各业”工委召开会议，通过以馬來语为今后召开一切会议所用的主要语言，华语及淡米尔语为相輔的语言。這是多么有智慧的决定.据说林清祥曾倡议建立馬來学校，使馬來教育系统化。這正是堵塞住那些散播华族是“大漢沙文主义者”，分化民族团結的居心不良者的企图。“各业”工会摒弃英语而用馬來語作为工作语言，对后来各工团开办馬來文班学习馬來语，加强民族团結起了促进作用。

由于会务的发展繁重起来，需要争取匯集大批工作人员襄助。尤其是各民族的负责人，还需要征聘馬來与印度工作人员专事负责会务。

实质上，各业工厂商店职工联合会已成为各民族工人的媒姆，這是星洲工人运动史上非常特出的例子，因而引起马来亞人民的特別关注。各业工厂商店职工联合会这种势头的猛起，也是延续 1945 年至 1947 年星洲工人的英勇斗争，当时在强而有力的各民族各业总工会指挥下，在广大工人团結一致和工运统一下，都争取到胜利果实，提高了工人的阶级觉悟和思想认识。虽然牺牲了好多工运领导人、积极干部，却经受了时代的考验，经受了火的鍛鍊，领悟了要改变工人的命运，不能单纯停留或满足于经济方面的斗争，更必须进行政治方面的斗争，更何况当时依然是英殖民统治。所以争取馬來亞（含星洲）的独立、民族自决，反对英殖民统治，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工人运动的重要任务。舍此，都无法改变工人的现状，也无法得到法律保障，随时会陷入深渊不能自拔。因此，深沉了解与吸取工人运动的历史教训是极为重要的。例如“各业”属下建筑部的负责人、干事及会员们就常常提到“和平时期”建筑工会及工人的斗争史跡，感到自豪而引以为荣。工人们都会传承这种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大无畏精神，进行反迫害反剥削，争取自由民主的实现，作不懈地努力奋斗到底！

“各业”工会这群自创会以来的生力军，例如杨高锦、林振国、林清祥、陈国伟、张文友及其一批工作人员等，是一群富有理想的工运人士，他们舍生忘我，敢于直面人生，无私奉献，真诚为工人阶级谋福利，为消灭迫害与剥削而战斗，他们继承了工运先辈们的战斗精神，因而导演了一出精彩绝伦的工运史剧，一首首韵律高昂的工人乐章！

由这样一群人领导下的“各业工厂商店职工联合会”，当然获得全星各行业工人的拥戴和信赖，紛紛加入，并团結在它的旗帜下，加速了工运的发展和工运的统一，使工运更加增强力量而强大起来！“各业工厂商店职工联合会”遂成为星洲工人运动的领导中心，肩负起领导工人运动的重任。這就是报章媒体所说的“密驼路集团”。而全星九五工团工作委员会也成立了，秘书长是詹密星。这是当时自然而然地形成的无形的工运领导中心，是时代赋予的使命！

1955年4月英殖民者抛出“林德宪制”的殖民地民主，在林德宪制下举行选举。劳工阵线获得执政，馬紹尔拒绝“自由社会党”的合作要求；行动党也中选三个议席，其中林清祥是在武吉智嗎区中选。林清祥的中选，星洲人民尤其是工人们感到无比兴奋，有了一个真诚为工人们利益的民选代议士，在立法议院为他们伸張正义，反映心声！

1955年5月1日，全星二万余工人在芽籠羽球馆热烈庆祝五一国际劳动節的大集会。這是自1948年頒布紧急法令后，第一次展示了工友们的大团结。当雷一般的掌声、欢呼声、默地卡声震撼着整个羽球馆時，当争取馬來亞独立的呼声从羽球馆迸发出來時，你就自然而然意味到工人阶级一股无可限量的力量，它将成为争取独立的馬來亞的坚强的主要力量，成为坚不可摧的战斗堡垒！当开会时间宣布时，人潮还络绎不绝地拥來，顿变成火流延燒起來，真是盛况空前！

让我引述“新报记者”亲临描绘会场的布置情况，記錄了大会场内外，都贴满了标语和掛了许多布条。大门两旁悬挂了两幅大漫画，左边画了一个巨人斜躺在地下，一只手被一条鉄鍊釘在地上，另一只手上拖了条鉄鍊，釘在地上的鉄鍊已被巨人拔了起來，旁边一个鼻子比平常人高了些的正高举了一只大鉄鎚，准备把巨人釘牢；写着“馬來亞人民”的巨人眼睛怒视那正准备釘牢他的人。這表示了人民已是忍无可忍了！而条条标语都是深紅底黃字，其中有“抗议警方干涉与破坏福利工潮”、“坚决反对警方用暴力拘留人民而不必审判的紧急法令”、“争取八小時工作制”、“絕不作外來統治者的炮灰”、“馬來亞独立万岁”等等；讲台前两旁的布条写着：“劳工政府实现其竞选诺言，修改或废除紧急法令，实现自治与独立，改善劳工和人民的生活，反殖民主义和他的幫兇”、“全馬人民团结起來为废除紧急法令与争取独立而奋斗。”

林清祥在致开会詞时说：“……紧急法令存在着的今天，人民一切言论、結社、集会等自由都完全丧失，可是，工人能够不怕紧急法令，大家今天能够觉醒起來团聚在这里控诉：受压迫、受剥削、受轻视，已是工人奋斗而得到胜利。”

他又说：“五一的意义在那里呢？它又是怎样來的呢？那是一百年前，工人兄弟为了反压迫反剥削、反对资本家吸血，大家团结得似鋼鉄般硬，争取他们的权利，争取他们的合理要求，他们罢工、游行示威，結果受到维护资本家利益的警察，用木棍殴打，使许多工友倒了下去，許多流血受伤，他们的血没有白流，終於是胜利了！到了今天，在资本主义国家内，资本家还是一样压迫与剥削工人，吸尽工人的血汗还不够还想连骨都吞了下去，而警察还是用野蛮手段对付工人。所以我们工人兄弟的斗争还没結束，还得努力奋斗到底！”大会通过了十六条提案。这可见在当时白色恐怖环境下，工人大众不畏惧紧急法令下失去一切权利的威吓，敢于公开藐视它，敢于冲破法网，不怕牺牲的斗争精神，为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起了先锋作用，不仅值得大书特书，而且还应秉承他们的精神，继续努力奋斗！

1955年5月10日，馬來亞职工会领袖陳传文率领访问团蒞星时，在欢迎大集会上激动说：“本來新加坡和联合邦是联合在一起，可是狡猾的殖民主义者却把割开了。虽然如此，

联合邦的职工运动者和劳苦群众却很关心星市职工领袖和工人群众的斗争，我们对你们在此地所作斗争的努力很表钦佩，我们将把你们的经验带回去，重新组织，重新检讨，以便更积极地为劳苦群众争取利益。”

他说：“英殖民主义在联合邦或星市都一样摧残职工运动，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互相依靠生存。因此，他们联合打击职工运动。紧急法令的实施，完全打击了职工运动，使联合邦的职工运动几乎无法抬头，职工领袖被驱逐出境，工团被摧毁。凡是搞职工运动者，都特别受警方的监视，无论工团开会或进行任何职工运动都被警方监视，每次开会得申请准字。……谈到工友罢工，也是常受威胁，例如端洛锡矿罢工工友，被警方打得头破血流——我昨晚参观了在花拉公园召开的群众大会的印象非常深刻。新加坡人民对政治发生极大兴趣，并非偶然的事，这都是因为工人觉悟性提高，以及职工运动者努力的结果。……”

接着“各业”总务林清祥说：“……两地人民和工人并不会被一条桥所割断，他们的心还是紧紧联合在一起。几年来工人领袖不断地教育了工人，使他们晓得起来反对殖民主义。行动党的组成也适应人民的情绪，它以人民反对殖民主义的情绪化成纲领。——他们已懂得依靠现政府是没有用的，因此，纷纷都加入真正为工人争取利益的工会，作实际的斗争。因而一个工潮接着一个工潮，甚至有的工潮发展为政治斗争。……他们懂得，除非一切不合理的法律取消后，才能解决他们不合理的生活。……”

星马本是一家人，英殖民者为其统治利益，不顾人民的反对强制把它分割开来，使星洲成为英帝直辖的海峡英殖民地，变为其东南亚军事基地和交通枢纽要塞。利用这种分而治之手腕，分化民族团结，制造民族仇视，削弱反殖力量，达到永久统治，其用心何其毒也！

马来亚（含星洲）人民和工人大众是不会轻易上当的，他们依然团结一致，相互支援，支持民族解放斗争，反对紧急法令和殖民战争，开展要求马来亚独立的斗争！这次他们敢于冲着紧急法令的威胁而来访问，正显示星马职工运动者的统一意志和重要任务，需要动员起来，行动起来迫切需要，坚持持久的艰苦困难的斗争。

（三）福利巴士工潮爆发和演变

1955年4月25日至5月16日，巴士工友联合会属下福利站巴士工潮爆发的事件及后演变的恶化及扩大化，仍是当时极为震动全星人民的事件；是工运史上可歌可泣的大事件，影响深远！让人民清楚看到本是纯粹的劳资纠纷，可以通过双方协商解决却演变为英殖民者及其仆从劳工阵线政府，利用暴力灭绝人性的残酷手段对付罢工工友，致引起了工人受伤流血事件的爆炸性场面。遂引起了全星人民、工人群众、学生们等各界人士的愤怒，群起支援、慰问与抗议行动！

在工潮爆发之前，反动的顽固的福利站资方以为有了英殖民当局及“劳阵”的撑腰下，企图破坏及扑灭职工运动的发展，以为可以轻而易举地扼杀工人组织工会的自由民主权

利。当福利站工友参加了巴士工友联合会后，资方悍然开除该站二名负责人，当工会提出改善生活待遇及收回成命的要求与之谈判，资方态度强硬，谈判破裂，工会发出十四天罢工哀的美敦书。届期前二天，资方遂与工会达成协议，工友们获得加薪。但是，资方并非至诚与工会合作，而是争取时间作好瓦解工会解僱工友的工作：一方面利用工贼组织黄色工会对抗巴联；一方面大量招募新工，准备代替旧工友，资方这一恶意企图引起了工友们的惊觉与愤懑，于4月18日停工抗议二小时，双方遂经数次在劳工部谈判，均告徒劳。工会不得已于4月22日再发出十四天罢工通知书，詎料二天后，资方便寻找藉口，制造事端，引起了三百多名工友停工抗议，资方便即日发出通知书，辞退全体停工工友。翌日当工友欲上工时遇到拒绝，而且还召警察及镇暴車保护新工出车。

这种利用各种藉口，违背已达致的协议，是蓄谋已久的邪恶目的，加上警方的武力保护，资方气焰囂張，以为即可瓦解工人组织和罢工工友的斗争！

4月27日当罢工工人向新工劝说时，警方却藉口所谓阻碍交通，是所谓犯法的，而遭到警方驱散、拳头、警棍、盾牌像暴风雨似的袭击工友，有数名工友被殴打当场昏厥，十余工友受伤，有些伤势严重，惨状不忍卒睹！

这就是当时刚执政的劳工陣綫政府对工人的恩赐！

在工潮不断恶化，事态不断演变下，当局不得不宣布设立调查庭，进行调查工作。当调查庭开庭时，李光耀律师接受了庭上临时建议，即罢工工友与新工以二比一复工，工友闻讯大表不满，经工会负责人的苦口婆心劝说，为了顾全大局，尊重法庭的判决，工友们才忍痛接受。可是顽固的资方却我行我素，再耍花招，不确实履行临时协议，而当局却鼓励继续出車，引起工友的大不满，再度停工抗议。事态又再次严重化了！

1955年5月12日，警方起用強力的水龍頭，掃射蹲在厂门前纠察的罢工工友，还无法驱散，就更加強水管的扫射力，顿时飛沙走石的袭击，打伤致许多工友流血的惨絕人寰的暴行。这就引起了更大的凡响。

福利站罢工工友並沒有被吓倒而屈服，而是更加团结起来，视死如归坚持到底，直至获得合理解决，否则绝不罢休！他们的斗争得到同行业工友们的鼎力支援；星洲十七工团的声援，更加鼓舞了罢工工友的斗志！

由于警方接連用残暴的武力手段对付罢工工友，使工潮更加扩大和恶化，二万工友响应罢工声援；各界社会人士及学生、工人涌到罢工现场慰问、支援，也一样受到警方的对付，引发了冲突，场面混乱失控，酿成了三人死亡、廿余人受伤，被捕者有廿四人，愤怒的人群抬起被射杀的一名晉江学校学生張崙銓（年仅十六岁）的尸体游行示威抗议声讨的流血事件。這却被当局誣指为“暴动”，公然宣布罢工为非法，阿力山大一带实施戒严！

当时的职工会代表大会秘书处已就警察的暴力行径致电三通给英国工党和英国职工总会，尼泊尔总理、印度总理和印度职工工会，敦促他们关注新加坡警方的残暴非法的行径。

立法议员林清祥发表了谈话：“前晨（5月12日）警方置公众的谴责於不顾，第三度用暴力对付福利站和平罢工工友，已引起全星各民族人民的公愤。作为人民行动党党员——余本人一向遵守党的路线，以和平斗争方式，去争取一个独立民主的馬來亞的实现，故欲坚决反对警方的暴力行为，亦认为‘法律’若能真正维护人民的利益是不需要警棍、水龍頭、催淚弹、监牢及其他残暴手段來压迫人民遵守的，因暴力所產生的结果是更强大的反抗力。現在大家都说事情不应扩大，我希望政府能体谅工人的苦衷，合理出來解决此事，然而馬紹尔首席部长昨夜在广播电台——指责由工潮发展起來的严重局面，为少数共产党人所煽动的。这种言论在过去曾不断地被殖民地政府用來对付群众的独立民主运动。身为劳工政府的首席部長本应清楚认识工人的悲惨处境，並公正的出面处理工友的合理要求，相反的馬部長对福利站罢工工友维护合法组织及合理要求改善待遇的斗争，从未加以支持，現在竟指责渠等受人煽动，这不能不令人感到在殖民地政府看到各民沆族人民要求独立民主运动高漲的今天，渠等鑑于整个殖民地制度已开始动摇，不得不拆下民主招牌向人民展开全面进攻时，馬部長已屈服了，并用自己的口说出殖民統治者的话，这完全暴露了劳工政府的面目。”（1955年5月新报报导）

由于局势不断恶化，当时华中、中正二校又被無理着令停课，更引起人们的关注抗议，風波浪潮时又会涌來。这一严峻情势，迫使首席部長馬紹尔不得不出面親自干預工潮，并强制资方公司接受其建议：一、公司即刻解散新组织的“公司职工会”，无条件承认巴联；二、全部罢工工友复工；三、双方有关其他纠纷，交由仲裁人甘尼氏全权处理。

5月17日巴联属下福利站罢工工友终于取得了最后胜利而结束了工潮。福利站工潮事件是典型的，具有广泛意义的。任何资本家如蓄意利用禁止、破坏、开除等手段对付工人，終將自食其果。其实职工会负责人一向秉持合理合法的方式以协商、忍让，也会顾及资方的营业状况解决劳资纠纷，求取合理协议；并没有不顾一切动輒就付諸行动而斗争；除非资方不承认工会，不与工会谈判，不解决工人的要求；而是蓄意瓦解工会致工人于死地，迫不得已才采取罢工行动，这仅是保卫工人的生活利益而已。职工会从未意图煽动利用工人罢工，使资方停止营业、关厂、倒闭的说词，更何况有时谈判时退让以求解决还得说服工人接受协议。改善生活待遇与工作条件是全体工人的共同意见，工会仅代表工人提出与资方谈判寻求達致协议；如不能解决而付诸行动，还得全体工人的同意。这怎能说是工会利用煽动工人任意制造事端，福利站工潮自始至終清楚展示了当局与资本家沆瀣一气，不循和平合法協商途径解决劳资纠纷而是蓄意瓦解工会，逼使工人当奴隶，扑灭工人运动的发展，但英殖民当局及其仆从的如意算盘終不能得逞。

一个自称是“劳工政府”却甘願被利用未破坏工潮的工具。馬紹尔首席部長的出場表演及其后有些问题不太听从指挥（有关争取独立自治問題）断然愤而辞职，这显示了馬紹尔还有点可爱之处；从另外一方面可以窺見英殖民者的真面目及接任者林有福的奴才心态。

罢工工友坚持斗争和全星工友兄弟团结一致及各行各业的人士甚至学生们的大力支援，形成了一股坚不可摧的振撼力，迫使英殖民者当局及顽固资方不得不解决工潮结束罢工。

这对星市工人阶级具有广泛的影响和增强了人们的洞察力，从而提高了工人认识经济与政治斗争的不可分割的重要性，认识了社会变革的必然规律，使工运及工农大众更有信心面对更大风暴的来临！

福利站工潮说明了压迫得越凶猛，反抗的力量也越巨大。纵使顽冥不化的资方利用各种不法手段，例如不承认工会，私会党组织新工会，集体开除工友，劳工处雇请新工，警方保护出车等等，都是以失败告终。

福利站工潮更展示了工人不怕任何暴力，横行的野蛮手段的袭击，敢于抗争到底的威武不屈的大无畏精神！这完全体现了工人阶级不怕牺牲敢于胜利的本质精神，影响深远！

（四）“各业” 工联会务的发展和活动

1955年5月英殖民者及其仆从劳陣政府泡制了“新公众安全法令”剥夺人权，导致了由全星九五工团组成的反对“公众安全法令”工委会，号召在立法议会开会时停工抗议行动。工委会秘书长詹密星发表告全星各工团及所有爱好自由的人们书：“……在这黑暗的一天，在这黑暗的时候，一致追悼欺骗人民的，作政治自杀的劳工阵线政府，並决定以我们千百万工人及群众团结的力量，坚决反对这剥夺人权的‘新法令’到底——到最后一人！当天上午十时立法议院开会时，我们千百万的工人兄弟及群众停工十分钟，以示抗议。为了职工运动的发展，为了民主与自由，让这极有意义的十分钟更加强和鞏固我们斗争到底的信心和决心。”当时九五工团代表了八万多工人会员。

1956年1月11日，各业工厂商店职工联合会发表了检讨过去所犯的一些错误並制定今后的工作方法与原则的一九五六年发展会务与计划的报告，曾指出我们有厂干事、总干事的组织，可是如何使这些组织健全与起作用，並沒有很好做到，这虽与当前的章程有关系，但至今仍未做好修改章程工作。这反映了工会执委沉醉于当前的点滴工作成绩，忽视组织工作的重要性，没有及时提出新的领导与组织形式。由于厂干事經驗少，能力不足，又缺乏对整个形势的清楚认识，往往在处理问题上没有把握与决断力。对許多工友的困难与要求无法完全照顾。

該报告提出今后将注重的事项：加强工会领导中心与总干事，厂干事及一般工友的关系。尽速修改章程，使工会的领导方法与组织形式适应新情况，适当地扩大現有的领导中心；加强与进步工团的合作，设法促进工运的大统一，以便联合全星工友一致反对不合理的工运政策与不利工运的法令，使英殖民地当局与资方利用工团分裂來打击工运的企图成为不可能；在劳资两利的原则下，做好团结开明资本家工作，以便减少工运所受的政治压力，为促进民族工厂及改善工人利益共同奋斗；提高干事与工作人员的素质，必須注意一般存在的个人英雄与宗派思想，加强批评自己的缺点，摒弃一切个人成见及加强学习，为适应这种需要开办研究班、学习班及干事训练班；发揚正确的批评作风，严止背后批评或不正确地以打击他人抬高自己的作风；欢迎会友、干事提出一切对会务有建设性的批评；确立严格的检查工作；发扬优秀的工作作风与表扬及獎勵模范工作者；批判一切不正确的工作作风並对犯有错误的工作者，根据情况給予适当批评或处置。

这是一篇极为重要的指导会务发展的决策方针，说明了“各业”这样庞大的工会组织，领导中心要带领这样有三万余人的工人队伍，不犯这样那样的错误是不容易的，问题是在于是否能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以工运理论为指导方针，强化领导中心，以坚强的决心与统一意志下，巩固组织，加强团结，适应新情况的发展，朝共同目标奋勇前进！

这是“各业工厂商店职工联合会”发挥推进工运发展作出的贡献！也是影响促进各工团的团结面向未来的推动力！

1956年3月4日，巴士工联在羽球馆举行庆祝九周年会庆时，林清祥在五千多人的大会上曾说：“大家不能存着自满的思想，現時，工运仍然处在非常危险的处境下，有一种政治上的恶势力正在企图抬头，想扫荡工友们辛苦换来的斗争成果。”他又说：“今天我们的力量已经使殖民者的统治基础动摇了，但这并不是说他们已经要倒下去了，相反的他们正利用現時的政治局势的动荡不安，想办法向人民大规模进攻，他们正用种种方法来组织和整顿自己，以便恢复过去的殖民统治局面。这样他们就可以通过非常反动的政府来破坏和摧残工人的成果。”他还说：“馬紹尔渡假回来后曾说起政治危机，因政治的恶势力日渐来临，而感到害怕。实际上馬紹尔先生无须害怕的，如果他真正要为新加坡争取独立和民主，那么，全新加坡的工友们都支持对抗殖民势力的。如果有勇气的活，我们还可组织一个统一战线。”（新报报导）

还有报导林清祥在拥有三万余会员的“各业工厂商店职工联合会”特别会员大会上的讲话。他说：目前各工团号召统一步伐，犹如星市各政党呼吁统一阵线一样，这是表面上的统一。我们应该注意某方企图利用统一的口号，而一方面施行分裂政策。“因为有的工团是代表资方，诸如有的政党是代表殖民地官员一样，背道而驰的宗旨，是值得我们提防的。”这是林清祥的一番颇具智慧敏锐而深有洞察力的分析。

当时星洲有好多政党：进步党、自由党、社会党、民主党、劳工党、华巫联盟（馬华和巫统）、行动党，后有自由社会党，他们都蠢蠢欲动，各自整顿、变换，甚至利用私会党参与，壮大声势，企图在政治上染指，讨好英殖民者，保护殖民者的统治利益，这是当时反动右派所施行的伎俩。劳工党而后变为劳工阵线，把持住“职工总会”，他们摇旗呐喊统一工运，关注工人利益，暗地里却鼓励组织资方工会（黄色工会）利用私会党徒、新工破坏工人罢工的无耻勾当。

这里引述馬大社会主义俱乐部一九五六年二月间，主催四大政党代表辩论马来当前政治问题。劳陣林有福，华巫联盟張赞美，自由社会党陈翼枢，行动党李光耀。李光耀针对自社党的自由社会主义，足足辩了半个小时，指出“如果相信民主制度，我们实不能剥夺馬共参与政治权利。我们都说要实行宪制斗争以及和平改革，如果馬共也遵守这种原则，我们实在不能不使馬共享有跟我们同样的权利。只有这样，我们的民主美名才能保持得住。”

李光耀还曾说：“如果不给我们独立，他们就会面对和平革命的不愉快后果，当到面对時就会向我们的愿望妥协，現時局势已发展得太遠，英国人是回不过头來了，在不久的将来，他们将要在共产党的馬來亞和非共产党的馬來亞两者选择其一。”他又说：“独

立的馬來亞可以抵擋共產主義，一如緬甸和印尼那樣，但是，如果我們得不到獨立，共產黨就會在本地獲勝。”

而林清祥則曾在武吉智馬行動黨支部大會上發言主張承認馬共的合法地位。使馬來亞結束戰爭達到和平。（這是當時星洲政局的特點，影響工運與工人的鬥爭，才在此提出）

當時有八十八工團大會一致通過組成爭取獨立的統一戰線，作為馬紹爾首席部長的強有力後盾去英倫談判結束殖民統治。第一次的憲制談判是由馬紹爾領導，團員有林清祥、李光耀等。由於馬紹爾還有點良知，宣布議會實施多語言制及堅持人民的一些心聲；而代表團的聲音不能一致，殖民地大臣波德卻瞭然於心，結果談判失敗了。事後馬紹爾曾慨嘆英倫對本邦人民的獨立願望置之不理。由於馬紹爾沒有勇氣接受挑戰，而是於五六年六月六日選擇辭去首席部長職。

（五） 全星建築工友聯合會的誕生

1955 年中期，“各業”建築部的幹事們就在醞釀籌組獨立的建築工會，這是絕大部分建築部幹事們的願望，他們目睹了“各業”這種工廠、商店有固定性工作場所的綜合型工會，不太適於建築業分散、流動性頻繁的建築工友。必須專注於集中人手進行組織工友，才能進行有效地改善工友的生活待遇和工作條件。由於建築業的特殊性，流動性，又是多層包工制，工作時間普遍拖延至九、十小時，工資低廉，工作繁重，事故頻乃，工作沒有保障，更甚的是拖欠工資，捲逃工資，沒有定期出糧，工傷保險賠償和工地衛生問題等，建築商推給二手，二手又推予三手，推來推去吃虧的是建築工人；而建築工地的積極分子也難於立足，一旦被發現宣傳組織工人，包工頭只要一聲沒有工作或工作不足，就得走路了！所以，當時建築部的幹事們認為這樣龐大的“各業”工會是難於單獨專注集中人手，照顧及組織工友的工作。另一方面，建築工人向來有着優秀的鬥爭傳統，都曾出生入死地奮鬥，為保衛工人利益作不懈的鬥爭。幹事們經常提起“星華”的事跡引為自豪。所以“各業”屬下建築部幹事們是滿懷信心要出來組織自己的工會，繼承建築工會的戰鬥傳統，為工運作出貢獻！這種獨立性的決心非常強烈！

當時“各業”曾召開建築部幹事及會員會議，闡述“各業”的立場，規勸幹事們不要離開，影響“各業”的發展；當時好像也有人指責此舉是分裂工運。據說早些時就有人曾企圖分裂“各業”，拉攏會員另立工會，那是當時林有福的“職工總會”的伎倆。那時“各業”的成立約一年多而已，會務發展極迅猛，“各業”負責人不同意幹事分離出去另組工會是很自然也可以理解的。當然作為總務的林清祥是不可能同意的。不過他當時是以理分析利害關係來說服幹事們，而沒有胡亂指責幹事們的言詞，是頗值得欣賞，表現了一個大工會負責人的風度！後來有一二個幹事留下來。據說當時“各業”中委會曾召開會議討論此事，會上有人提出開除一事，不獲通過。顯然地，林清祥等人不認為建築部幹事是敵對份子，蓄意分裂工運。我認為這是明智的決定。否則建築工聯將面對更多麻煩事！

其实，在 1955 年 12 月，“各业工厂商店职工联合会”属下建筑部就曾在羽球馆召开了一个全星各建筑工地的工友大会。出席的约有一千余名工友。这个大会还是建筑工友们的控诉大会、申诉了建筑工友的苦难生活。在大会上提出四项要求：实现八小时工作制、每月定期出粮二次（每月 1 至 3 号或 15 至 18 号建筑行业出粮的常规）、劳工保险、组织调查团。1955 年 3 月新报已有一篇特写文章：“记星市建筑女工的辛酸史”，专谈建筑女工苦难生活和悲凉处境，她们在工地当杂工，搅拌水泥、挑砖、挑灰掘土等粗工。有红头巾、蓝头巾、蓝底白点巾极为特出醒目的装扮，俗称三水婆。一天的工资仅三、五元。她们都在豆腐街、广合源街一带，散散落落地席地而坐，皓候包工头前来招僱。这里引述新报记者的话：“国泰大厦、亚洲保险大厦、新市摩天楼一座座耸立起来——有谁知道那类摩天楼的每一块砖头，每一桶水泥，正渗满了女劳工们的血汗呢！她们冒着烈日、大雨一担担地，把砖块水泥，从地下上二楼、三楼、四楼，竟竟地走着狭小的板桥走上去。於是，平地上耸起座座高楼华夏，她们却住在牛車水、丹絨百葛，薰得烏黑、骯髒、杂乱的座座鸽子笼，一架布床，一个铺位，聊作松其为人营造洋房之一把老骨之用，有的连电灯都没有，踏进门去，眼无所覩，惟闻得一片人声喊声、小孩啼声，与那耳边厢的一丝同情叹息！”

“各业”工联在成立初期能够举行这样盛大的建筑工地工友大会，向社会控诉，发出工友心声，说明了他们是关注和改善建筑工人的命运的。客观的说，“各业”建筑部干事们对工运的立场是和“各业”相一致的，没有人意图分裂工运。我是极为清楚的。局限于当年的环境与人事关系问题，没有条件也不方便沟通信息，遂引起有人后来在建筑工地散播建筑工会是林有福派的流言。当工会得知这类流言时，执委、干事们大表不满，情绪激动，在未查明真象时他们也懂得不得胡乱还击，破坏“各业”的信誉；如有工友们提问时只作解释即可。这之后工会负责人曾多次接触“各业”中委，进行沟通，使彼此间了解互信，促进团结，他们也否认。由于影响不大，仅是全星建筑工友联合会成立时的小插曲！提起这事，仅显示了当时工会负责人是有理智的不轻易听信流言，不意气用事，造成和“各业”对立。而是号召执委、干事们团结一致把自己的工会搞好做出成绩来！这就是谣言止于智者，很快地就不攻自破了，不会引起内斗，妨碍工会之间的团结。

当年有 60 人发起组织“全星建筑工友联合会”。成立后产生的第一届执委会主席黄伟日，副汪金来，总务许垂服，副李清华，财政姚有合，副苏呈辉，文书杨啟主，宣教杨小黑，副黄垂源，组织吴仲桂，副郑格泉。执委陈串鼻（小馬哥）、陈金虎、郑惠月、黎观送、高耀辉、杨福康、蔡东南、张天助、王耀珍、陈培森、林锦田等。

一九五六年九月执委会制定“会务方针”：“加紧扩大组织，巩固领导，逐步为改善会员生活而斗争。”作为会务的指导方针。

加紧扩大组织，意味着必须到建筑工地进行宣传、争取动员工友参加工会，因此，号召执委、干事及工作人员自愿在各工场宣传与招收会员，1956 年已有一千五百余名会员。还差强人意。

改善生活待遇，首要的工作是争取实现八小时工作制，为此，工会向民选政府呈递备忘录，派代表晋见首席部长，同建筑商公会交涉谈判，均无结果。后来常务理事会会议决定采取强硬手段全面推动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强硬手段指的是下午五时放工时间，各执委、工作人员、干事们分配到各工地敲锣打鼓促工友收拾工具放工。除了开明建筑商及包工头遵守外，收效不大；反而使工会人手疲于奔波忙碌，不胜负荷；落后工人害怕，无所适从；开明建筑商及包工头也有怨言；相反地使一些顽固敌视工会的建筑商及包工头凶恶起来，利用黑势力对付工会，同时造谣中伤、诬蔑破坏工会；控制工友继续拖延时间，另一方面，也使落后工人不满工会，真是吃力不讨好。

从实践中证明：这种代替工人行动的做法是不可取的，是无法达到预期目标，也无法长期维持下去！是欲速不达的。大家才醒悟到只有通过宣传、动员组织工友，参加到工会，自觉地有组织的行动，以工人团结的力量作后盾，由工会领导他们去争取，放弃了代替工人行动的“强硬手段”。工会接受这个经验教训后，放弃全面争取而是分别在有条件的有组织基础的工地促使建筑商、包工头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取得了局部的胜利；至于顽固的建筑商、包工头的各种恐吓和黑势力的干扰，工会并不害怕，而是敢于正面还击，并“以夷制夷”加以化解，使黑势力知难而退。

除了这项工作外，其他的有定期出粮、工伤事故、劳工赔偿、拖欠工资、工地没有厕所及卫生问题等等都极需即时或经常处理解决。尤其是拖欠、拖欠工资及拖延出粮日期都必须即时处理。这些问题在当时建筑工地是很普遍发生的。

职工会不仅是处理劳资问题，改善生活待遇和工作条件等等单纯的经济性的斗争而已，还有另一项重要的迫切的任务，就是必须开展文化教育和文娱活动。建筑工人都是大老粗，受教育极少、文盲多，文化程度低，为了消除这种现象，巩固组织，巩固领导，发展会务，唯有提高执委、干事们及工作人员的文化程度和思想认识，认清局势的发展，提高警觉，才能面对更高的政治性斗争，经受考验，屹立不倒。

关于工会的文教与文娱活动，必须认识到它的重要性与迫切性；但也必须依工会的具体情况和条件，按步就班地开展起来。建筑工人大多没有受教育，文盲多识字少，首先就开办识字班；意识到马来语文的重要性而办了马来文班，还设有资料组，收集黏贴剪报供负责人参阅；接着歌咏组、午蹈组、华乐组，乒乓队等先后办起来，尤其是午蹈组要开展起来谈何容易，但是在大家的努力下招收了不少组员，又得到一位南侨女生鼎力协助指导，忘我的工作，人数不断增加而气氛热烈，甚至车业工会也有人要求参加。（建筑工会成立时会所就设在原本是车业工会会所内的源源旅店顶层）由于她一人感到忙不过来，又去找了几个同校女生来协助，她们从不缺席而且认真负责把午蹈组工作搞好。真是难能可贵！

当工会成立一周年会庆暨鲁班先师诞辰纪念大会在南天酒楼天台举行时，就有了文娱节目助兴，大开建筑工人的眼界，这对后来工会开展的各种文教与文娱活动时，吸引了他们到会来参加活动。

为了发展会务和扩展组织工作，工会负责人不是坐在办公处，等待工人自己前来参加而已。建筑工会号召执委、干事们及工作人员义务组成脚踏车队，定期分組分别到各工地招收会员、收捐、宣传教育，鼓励工友们到会所参加活动，分发告工人传单及会訊等；由于建屋工地散落在星岛各地方，交通不方便，没有固定地点，时常迁移，只有脚踏车最利便，一天可到好几个工地，又分为小组，分头进行，就可到达大部分工場进行工作。

脚踏车队既能招收会员、收捐，又能联系工友，听取他们的心声，做宣传，扩大影响；既能锻炼、提高执委、干事们的工作能力，密切和工友的关系，建立感情，又能把工人们的要求和意见反馈给工会负责人，方便即时处理劳资问题。

脚踏车队分别奔赴工地往来解决了搭车的不便，又能做好宣传组织工作，当时脚踏车队几乎跑遍了全星各个工地及乡村地带。这是当时建筑工会的一项创举，是一项深有意义的工作，对会务的发展，起了相当大的作用。也说明了当时的执委、干事们全心全意奉献于工会，不计较个人得失的高尚品质，也不问工作的艰难困苦而一往向前忘我的负责任的精神，建筑工会能拥有这样一批义务工作人员的献身，为工会的发展壮大作出贡献而感到自豪！也是工会组织成功的保证。当时受薪工作人员只二人而已，每月一位五十元，一位三十元，是无法维持生活的，唯都寄宿在工会，日夜拼搏，没有任何怨言，确都熬过来！

“各业工厂商店职工联合会”被封后，其属下灰料部、石厂及属于建筑业的会员都转到建筑工会。至 1962 年已拥有四、五千会员。工会先后成立了分会，计有浮罗敏島、武吉班让、四脚亭、三峇旺、楊厝港、如切等区；也成立了各部门的干事会，計有灰料部、油漆部、石厂部、筑路部、割草部、打地基部、建丰厂部、東新木器部等。这一來工会会务极为繁重，尤其是劳资问题，处理纠纷，谈判合約等都随之增加。而各分会多设有各类识字班等文化教育活动与文娱活动，这就需要很多人手，人手的调配成了主要问题而极需解决的。例如四脚亭分办事处，那是私会党出没的地方，开办了识字班，学员及教员也多是女性，必须照顾她们的安全及不受干扰。当时工会采取护送办法，以策安全。不过，那时的私会党好些是讲义气的，对工会也有好感，我们也“以夷制夷”作准备，所以未曾发生事故。这之后成立了妇女小组；工会领导也形成了核心小组，重力负责中心领导工作，扩大工会的影响力；保持工会的纯洁性和团结性，使执委、干事及工作人员心情舒畅地工作！

由于在源源旅店顶层和车业工会共用会所场地已不敷应用，遂搬到惹兰勿剎街 415-417 号的一排大厦的天台，面积很大，适合开展更多的活动。后来“汎星各业职工联合会”小坡分会也來插户。

搬进新会所后，除了前述的活动项目外，增加了話劇組、板报壁报組（建筑园）、美术組；文教方面有干事班、时事班、文化班、高級班、中級班、初級班、低級班等。早期採用平民課本，后工会宣教股自己选材编写“工人读本”供文教班应用，既适合干事工

友学习，又具现实意义，有利于工会的工作。工会也设有工友的精神粮食库图书馆及贩卖部，供会员借阅购置。

显然地，这就需要好多负责人及指导人员、干事们齐心协力干起来。工会先后请来了六七位义务的南大生到来协助工作，这些人虽然教育程度高，却都和干事、工友、学员们打成一片，没有摆知识分子架子，而做好工作作出了贡献。有的后来都成了建筑工人。由于文教班的学习内容富有意义，教学方法又好，兄弟工团的干事工友们闻讯也来参加，这出乎我们意料之外！这对促进工团的联系与互相了解大有裨益的。

当时的话剧组排练了好多剧目，例如“雨夜”、“八根火柴”、“怒火在苦难中燃烧”、“走向胜利”、“罪根”、“在建屋工地上”、“金钱与艺术”等等。在会所内经常有小规模的话剧与文娱演出的观摩会；值得一提的是当“在建屋工地上”的导演和演员们结队到建筑工场实地拍摄剧照时，引来许多工友好奇的围观。会内也曾举行听音乐会；举办了上百人露营会及爬山运动等等。

建筑工会成立以来，制定了各时期的会务方针，作为指导会务工作，同时在各阶段进行审查、检讨、以期修正错误，克服缺点、补充新的工作内容，务使工会会务能顺利地正确地执行，不为取得胜利时自满，也不为犯错误而灰心沮丧。尤其对工会内出现的不良作风，不守纪律的背后批评，自由散漫的态度，从不姑息养奸。对于不端正自己的执委、干事、工作人员则采取调动工作岗位，以观后效。对于极少数坏分子则清除掉，净化工会领导层及整体活动人员，才能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发挥他们的能力，所以坏分子都难于混进立足于工会，制造纷争，散播谣言，分裂与控制工会，因此，工会从成立到被封闭，都能一贯遵循工运的正确方向而战斗到底。

1957年4月8日举行第二届会员大会，选出第二届职员并复选：主席许亚服副司徒章，总务李清华副杨啟主、财政汪金来副苏呈辉、文书张少坤副萧友华，执委：王泰生、陈元成、陈坤林、吴文道、章应成、陈串鼻、黎观送、郑惠月。常务委员会：许亚服、李清华、汪金来、吴仲桂，陈串鼻、司徒章、杨小黑。监委会：主任黄伟日副李秋枫，查账吴亚桂副张天助，委员：罗文章、李亚六、陈成。宣教组织联委会主任吴仲桂，秘书杨小黑，财政董华荣，委员林才义。

1957年7月10日在新世界百老汇歌台举行庆祝鲁班先师诞辰暨周年纪念大会，立法议员吴秋泉，义务法律顾问陈维忠及各工团代表都到场并发表谈话，异口同声对建筑工友的劳动功劳，以予极高的评价。提到目前建筑工人的生活状况，大家一致认为，只有精诚团结在工会的旗帜下，才能争取到合理生活待遇。工会主席许亚服在致词中指出：“最近建筑工友的工资会由技工十二元降到八元，杂工六元减为四、五元一日，是殖民统治下所造成的，1948年紧急法令颁布，马来亚人民遭受连绵战争打击，社会经济陷于不安，大批工人失业了，联邦工人在走头无路下，湧到新市，低廉工资亦争作。建筑商彼此竞争，纷纷抑低标价，承包给包工头，再由包工头雇佣工友，形成层层剥削。工会即将发

挥作用，谒见民选政府解决此问题。”大会情况热烈座无虚席，可见那时建筑工人对工会极为重视并寄予厚望！

从建筑工会会员大会选出的执监委员会的阵容及庆祝大会的热烈举行，在建筑工友的殷切期待下，显示出工会会务已是在稳健地发展；同时得到各工团的真诚支持，是左翼工运的一支可靠的力量，也促使工会在工运的斗争中起着一定的作用。

（六）星英宪制谈判与工会的要求

新英宪制谈判始于 1956 年 1 月，由首席部长馬绍尔领导的“默迪卡”谈判代表团（包括行动党的李光耀和林清祥）与英殖民部大臣波德谈判，谈判触礁而失败，馬绍尔愤而辞去首席部长职。馬绍尔慨叹英倫对本邦人民的独立愿望置之不理。

拥有一万名以上的十七工团则曾致函给首席部长林有福和各政党“默迪卡”代表团，表示全力支持“默迪卡”代表团，号召团员在争取目前最低限度的全部内部自治的要求，应站稳岗位。並向代表团保证，要是英国殖民部拒绝新加坡人民的要求，则工友将全力支持合理的联合行动。信中说：“我们应提醒和重新坚持代表十三万工人的新加坡职工联合会‘默迪卡’大会于 1956 年 3 月 7 日和 6 月 17 日所通过的‘默迪卡’决议案；这些议决案全力支持各政党‘默迪卡’代表团的目標，並且清楚指出殖民部应该负起第一次‘默迪卡’谈判破裂的责任。‘默迪卡’决议案的主要目的是促成新加坡人民的团结，表示需要一个联合‘默迪卡’代表团，而且清楚明瞭新加坡人民目前的最基本要求。”

“我们希望英国殖民部在宪制谈判中，能符合联合国宪章的原则，避免英国再一次在全世界人民面前，被譴责为热爱自由人民的压迫者和基本人权的虚伪维护者的醜名，”

“我们强调将给予各政党‘默迪卡’代表最忠诚和坚决的支持。是知道代表团将不会背叛人民的期望，而帶回來一个少于第一次谈判所同意的条件的协议”。

十七工团：电車工联、巴士工联、全星建筑工联、木器工联、华洋百货店员联总、无綫电工联、特士司机工联、藤器工联、纺织工联、理髮工联、茶岁酒吧职工会、黄梨工联、汽车工厂僱联、洋人僱联、书业工联、咖啡店员工联、鞋业工联。

后来由林有福率领的各政党宪制谈判代表团：劳陣周瑞麒、华巫联盟阿都哈密、自由社会党林春茂、行动党李光耀所组成，继续赴英倫谈判。于 1967 年 3 月底達致协议。协议书尚未签署，报告书详细内容没有公布，就有自由社会党陳翼枢乐极忘形地说：“殖民主义快要结束了，这是我们快乐的日子！代表团替本地争取了内部自治权利；为新加坡的政治史开了一个新纪元，从此以后，政治家都可拿这五位代表作榜样。不要为政党私利而你争我夺。”馬华公会黄富南早就意料到谈判会成功。行动党杜進才还发表了书面谈话：“默迪卡代表团跟英殖民部获致的協定的详细内容还没有公布，我们相信我们的代表一定会遵守各政党会议的建议，忠实地执行上次立法会议所委托给他们的任务。---这次只是内部自治，独立的问题是不可避免的跟星馬合併連結在一起。”据报导说林有福及其四名代表都认为是一百巴仙成功。夫复何言！？

如果是按照所说的那样，那又为什么在协议报告书签署之前，会议决定的详细内容却不公开公布；到底葫芦里賣什么膏药，当引起了人们的置疑！

星英宪制谈判协议报告书于 1957 年 4 月 11 日，在伦敦兰卡斯特大厦礼堂签署。各政党五人代表团一致在协议报告书上签了名。

协议报告书公布后，有几项条件特别引起人们关注：一、英殖民政府在未来的大选中，不准“颠覆份子”参加成为新大选的候选人。（即在公安法令下被拘捕而上诉被駁回的人士）；二、英政府有权力时宣布废除新宪制；三、立法议院无权更换高等法庭法官；自治邦元首如需要辞退一名法官，必须請示女皇，由英枢密院司法委员会认可后，才能辞退该法官；四、高级警官的职位如警察总监，副警监和政治部人选，推荐之前，英政府有权向公务委员会提供意见，必须先通知由英国委员任主席的内部治安委员会。也就是说必须得到英国政府认可方能委任；五、新加坡政府只能跟联合邦、印尼、沙撈越、北婆罗洲和汶莱订立贸易与文化协定。余者都必须先得到英国的批准。六、自治邦政府将拥有五十一个民选议员；英国政府将委任一名最高专员作为代表。说透了，英殖民者依然大权在握！

据当时报导，星英宪制谈判代表团得意忘形，醜态百出，吹嘘得肉麻，仅仅得到一个“湏固”的内部自治而已！更何况英殖民者惧于人民群众尤其是工人群众的强大斗争，早已实施了所谓“殖民地民主”來缓和广大群众的斗争，而同意有限的内部自治条件。馬绍尔在第一次谈判失败后已经透露出來。林有福有何德何能争取到完整的内部自治。后来人们才发觉五人代表团是“一丘之貉”，各为取悦于英殖民者，以得到英殖民者的欢心，扶上权力午台，自甘作为傀儡，以達到爬上个人野心的权利场，承继英殖民主义者的衣钵。

当时无党派议员林子勤就指出：“在宪制协议中加上有颠覆份子不能参加竞选的条文，是完全违反民主原则；这将会給执政党利用來对付敌对党。代表团应坚定自己的立场，向英国政府表示，这种协议是不符合人民的愿望。”行动党的李光耀说的是現在表示行动党对于协定的态度，未免言之过早。如果英国政府想在下次大选中，压死行动党，那么它就会非常失望。我完全不懂这样的规定怎么能挽救英国在星加坡的利益。言外之意令人遐思！

工团方面仅有“全星工友联合会”发表声明。认为协定是一种障眼法。实际的自治权力，仍然掌握在英殖民者的手上，英国政府是星加坡政府的后座司机。按照这个协定，将来在星加坡最有权力的人就是英国专员。实际等于現在的总督。所谓宪制改革实际只是名义上的改革而已。

兹引述 1957 年 4 月 14 日“新报众生相栏”几則讽刺意味的短則：“殖民地坎？自治坎？”为题说：“今天新加坡人民都在准备热烈欢迎各党派‘默迪卡’代表团返星。市政所周围和独立桥两旁都悬挂五颜六色的彩旗，装饰得焕然一新，可算是一派异平气象，以便吸引更多的人参加庆祝大会。大会全场的装饰主要是彩旗，彩旗之中什么旗帜最多

呢？就是英帝国的米字旗！还有一些就是英国皇室的徽号，和绣上几只張牙舞齿的獅子的绣旗。能够表现星加坡人民争取自治与独立的意志与願望的标志一点也没有，就連各政党的徽号也不准悬挂。……”

“到处是米字旗，到处是皇帽，预想今天参加欢迎大会的人，必然会觉得彷彿是置身于另一次欢迎殖民地总督的大会中。也许这些彩旗就是上次准备用来欢迎爱丁堡公爵的装饰品。上次因为动乱用不着，就留到今天用。今天当他们在兴高采烈地欢迎‘默迪卡’的时候，却看到四周都有英国旗包围着他们，这使他们知道自己还是在老地方。”

另一則“不幸言中”則写道：“新报記者于去年 12 月间报导一項有关在公安法令下被逮捕的人士是否能参加來届大选的新闻里，曾经说过敕令中並未規定，公安法令下被逮捕的人士不能参加大选。新报記者报导说：‘然而，劳工陣線联盟政府当然能够在宪制談判中，与英国達到一項协议，規定在公安法令下被拘留者，不得参加竞选。’上述这一番话不幸言中，所不同的是，签订協约的並非劳工陣线联盟政府，而是各政党默迪卡代表团。虽然林有福提出抗议，可惜各政党代表的大名已经簽了下去。难怪殖民部大臣波德也微笑着说：‘新加坡曾经提出抗议。’有一位立法议员对笔者表示，今日的欢迎大会应该改成抗议大会才对。”

还有一則“李光耀‘東山再起’”特別指出：“在南洋商报上，久未見名的李光耀，前日（12 日）李光耀的名字又出現了。有人阅后以幽默的口吻说：‘李光耀东山再起’。李光耀的大名是在前日南洋商报刊登‘1957 年新加坡宪制会议报告书’内之‘附录甲’条中出现。这条‘附录甲’是列明宪制会议的组织，并将会议的双方代表——女皇政府代表及新加坡代表团的代表姓名、身份列出，在新加坡代表团内有‘李光耀——立法议员’等字”……。（新报众生相栏刊载）

“默迪卡”代表团于 14 日在一片沉闷的气氛中回来。各工团、社团都没有派代表也没有动员组织队伍参加欢迎大会；参加的群众没有预期的热烈，从头到尾，没有人喊过一句“默迪卡”的口号；往日的喧哗和热闹的場面不見了。群众的反应却是意外的冷淡。新报記者写道：“是不是群众认为这次代表团又是空跑了一趟？是不是他们感到前途仍然非常渺茫？是不是他们觉得代表团的成就根本不值得庆贺？只有机场中，贵宾如云；在机场看热闹的多是在附近居住的居民，唯一好看的是五个代表容光焕发。”

在記者会上，只有林有福一人发言回答記者的提问，其他四人噤若寒蝉。由于事前林有福有话在先，代表团一个口一个声，概由他发言；所以，他以三寸不爛之舌，狡猾的、巧妙地、曲线地回答記者的提问，他不敢也不诚实的回答記者們要懂得內情的要求。奇怪的是代表团里有位名闻遐迩的反殖名律師为何不理直气壯把真实的内容告白人民呢！不过这出说得天花乱墜的滑稽戏也就告终。值得关注的是，任何关心政治的人们，读了宪制协议报告书，就会发现好多地方与人民的自治願望不相符合，什至与人民自治要求相反的条规。有人评论单就不准在紧急法令扣留下的人参加竞选，使到行将摆脱殖民统治的自治蒙上了一层阴影，使人们不得不怀疑英政府答应让新加坡自治的诚意。问题在

于：维护人民的民主权利是一个原则问题。如果我们在第一次接受了，就等於接受了可以任由别人剥夺民主权力的事实。后果是不堪設想的。这不单是少数人被剥夺的问题，而是把全星人民的自由选举一概剥夺殆尽的问题，使自治、民主徒有形式而已。有了这种不合理的附加条件，所谓民主的自由的选举，岂不是一宗滑稽的把戏！

而那些恬不知耻者还想瞒天过海，在耍弄肮脏手段，已是返魂乏术了！我们知道，恶名昭彰的林有福的劳阵联盟政府，肯定地会被清除掉！

据说行动党曾召开中委会决定拒绝接受这条文。这对李光耀是极狼狈，他已在宪制协议书簽下大名，已是既成的事实。其实，他已心知肚明，这对于他爬上政治权力場是无害的；还有利于排除异己份子、亲共份子和政治对手。由于人民行动党是一个反殖的，争取自治独立的政党，已获得了人民的支持，使他不得不费尽心机自圆其说，以摆脱困境，让英殖民者对他更具信心。后来行动党出现党内斗争，就不会觉得突兀！

（七）1956年“九一八”事件与反迫害斗争

在那个时期，星洲人民运动蓬勃发展，要求独立自主的呼声响彻云霄，全市各处人民群众起来集会支持，甚至游行示威；工潮又频乃发生，在这种情况下，英殖民者及其傀儡却利用“公众安全法令”、“驱逐法令”、“社团注册法令”大举逮捕全市工会、社团和政党的负责人及封闭社团，遂引起更大的反迫害行动，却遭遇到警方开枪射杀、殴打，施放催泪弹驱散群众的残暴行径并宣布戒严。

1956年9月18日，当局逮捕了“各业”、“黄梨”及“农协”主席林振国；“妇联”、“反黄总机构”主席陈蒙鹤，“妇联”组织部陈玉兴；中正教务部主任彭垂棠、“小教联谊会”主席陈广风、“中学联”康乐主任许统英；吊消“妇女联合会”“铜锣音乐研究会”、“中学生联合会”的注册等。

有鉴于此，廿二工团发表了声明提出强烈抗议，要求立即释放被捕人士和恢复社团注册；九五工团工委会及拥有五万人的枋屋住民公会都表示抗议。

当时适逢“各业工厂商店职工联合会”举行二周年纪念会却成为控诉大会，“各业”的中委、区委在一万余名工友面前宣誓：“面对着政府无理的挑战，维护主席的自由和人权尊严，我们毅然接受挑战、考验，并坚决地贯彻本会‘7·7’首届中央代表大会的誓言——毫不犹疑地站稳劳动工人立场，负起会友们交给我们光荣和神圣的任务——克服一切困难，继续领导会友展开顽强的斗争，决不中途退缩和妥协。”

9月28日九五工团工委会召开全星工团、文化界及其他团体“维护民权代表”会议，大会通过六条议决案，谴责林有福政府无理逮捕职工会负责人与人民领袖，以及无理解散公开合法团体，要求公开审讯所有被捕人士，否则应无条件予以释放，撤消封闭社团的禁令等。学生团体呈上了备忘录。

10月4日立法议会辩论大逮捕事件动议，林清祥支持谴责动议时指责劳联政府是“奎斯林”，（二战时纳粹占领挪威后所组织的傀儡政府）他说：“首席部长（林有福）曾经

威胁说如必要的话，他要再逮捕新加坡反殖民主义人士。如果首席部长以为他用这样的威胁就可以使新加坡的人民屈服，那他就作了政治上的自杀。”而李光耀则说：“政府所采取的路线就是：你是颠覆份子，我就要抓你，这样就可到民主。”又说：“既使你像希特勒那样无情，你也无法稳固自己的地位。”（1962年以后，李光耀这些话正可奉回他自己享用！）

10月26日连续进行大逮捕，有六个职工会领导人：楊高錦、林清祥、蒂凡那、方水双、陳国偉、普都查理及二名馬來部负责人被逮捕。

从9月18日至10月28日，据官方报告有六百多人被逮捕，一百余人受伤，十三人死亡。由于学生的集会抗议，华中、中正两校被勒令关闭，与此同时，勒令七间华文中学开除百余学生、解雇二名老师，数名受警告。

“星洲维护人权委员会”针对当局逮捕三中学学生及向董教施压力事件发表声明“近日当局在对付中学生的和平和合理的申辩与抗议行动中，已向校董与校长施加压力，以达到其全面接管中学校及消灭优秀的华文中学教育。这个事迹由周瑞麒教育部长对各董教提出许多苛刻条件而看出，——是过去殖民官员所擅长于接管和消灭华族教育的手段，且在华族各阶层人民及爱护教育人士的一致坚决反对下，遭到失败。”

“维权会不能容忍此种迫害学生和企图消灭民族教育的施策。-----我们决全力支持董教本一贯爱护民族教育的立场，勇敢地拒绝一切的无理条件，和不为压力和恫言所威胁。”（新报报导）

11月7日新加坡十工团发表声明指出：过去一个月所发生的事件，使到全星人民，尤其是我们广大劳动人民，在恐怖不安的状态下生活，这个不应推委在任何团体或人民的身上。须尽量保持镇定及高度警惕，虽然许多工会的负责人和干事被逮捕了，许多职工团体被封闭了，工人运动受到打击，却不能阻止我们为争取更美好生活待遇的目标的坚强信心。要“民选”政府在短期内公布提出具体理由，公开审讯所有被捕人士，否则应释放。

十工团是纺织工会：謝利生、全星建筑工联：楊啓主、书业工联：陳烈、鞋业工联：朱劍軒、汽车工厂雇联：何文、茶餐酒吧工联：莫华、理髮工联：林英、咖啡店工联：施宣、洋人雇联：周卿、华洋百货工联：陳錦泉。

“九一八事件”在历史上称为“反迫害斗争”。“九一八事件”是自紧急法令实施以来，第二次在星洲的大规模逮捕、监禁、驱逐以及动用军警以暴力镇压的行动和枪杀无辜百姓的流血事件。英殖民者及其仆从藉口肃清颠覆份子，又以“公众安全法令”、“驱逐法令”扣捕、扫荡反殖民主义人士的不法行径。因而引起了全星工农大众及人民群众集会、游行示威的抗议行动，进行反迫害的斗争。这本是星洲人民（包括工农们）合法的民主权利，英殖民者事先就以惯用的骯髒手段制造事端，诬指为“暴动”、“混乱”可以名正言顺地动用武装军警以暴力对付手无寸铁的人民大众，酿成暴乱局面。它却归咎于职工会、人民团体及其负责人所发动的。这就是他们的强盗逻辑：“作贼喊捉贼”。它还宣布戒严令，市区内各处都有军队驻守，继续逮捕所谓违反戒严令人士。

星市动乱结束后，有人提出意见，要在一个孤立无援的城市展开反迫害斗争，必须讲究策略，不能盲目硬斗，要从大局出发，掌握好时机，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尽可能积蓄保存力量，长期埋伏，等待时机，避免作无谓的牺牲，不要孤注一掷，也就是说，要打有把握的仗！但是，必须了解当时的局势，人民反对殖民战争，要求和平，争取独立的呼声响彻云霄；形势翻江倒海；星洲人民要求独立自主，结束英殖民地统治，也势不可挡，宪制谈判也还在继续博弈。而劳资纠纷、罢工事件迭起。反迫害斗争也不可避免地被迫展开了！

林清祥曾多次谈到职工运动坚持遵循宪制的合法途径，开展以和平方式和合法的群众斗争，争取结束殖民统治；有关劳资关系问题上以协商方式解决；对民族资本家要有不同程度的对待，照顾他们的处境，不能迫使他们走向死角。当时的职工会、文化团体都是公开合法的，遵照宪制办事，没有非法活动，罢工也是和平纠察等等。问题就出在英殖民者及其傀儡们并不遵循宪制行事，对于人民的合法公意从不买账，一意孤行，无视人民的要求，引发了爆炸性的局面，是在所难免，局面既已被搅乱又失控，许多自发起来示威游行抗议已是无法阻挡，只任由军警横行霸道的镇压而胡乱射杀，这是谁之咎！事实是英殖民者经常利用各种混乱的情势，藉口制造“合法”镇压群众运动，这当然引起工人群众及广大人民的群情激愤，进行和平游行抗议，表达民意，宣洩不满情绪。例如支持各政党代表团赴英伦谈判，行使集会的合法权力，何罪之有！

反迫害斗争的经验教训，是值得深层反思而吸取。但经验告诉我们，不能仅是参与和平合法的抗争，而没有作好必要的事前思想组织准备，更必须准备两手，预防阻止被袭击而措手不及。

“九一八”事件发生后，许多工农、文化、学生团体的负责人已被扫荡掉；各人民团体被封禁，已无法掌控主动权，只能任由自流地发展，而警方则可为所欲为！不管怎样，这次的反迫害斗争体现了人民群众、工人大众不怕牺牲，不怕暴力行兕的大无畏精神，却是值得赞扬！

“九一八”事件影响深远，启迪了职工运动者及职工会在城市斗争中更好地掌握斗争艺术，必须无时无刻更充分地暴露英殖民者及其衣钵传人的真面目，加强扩大有组织的队伍，动员广大群众力量，结合全国性的群众运动的形势发展，在时机成熟时，开展合法斗争，迫使它们陷入谷底，落荒而逃时，实现人民的愿望。

“九一八”事件发生后，工运趋于低潮时，顽固的反动的资本家又伺机瓦解工会组织，再挑起事端，意图扑灭工运。例如 1957 年 1 月据报导：“福利”和“郑古悦”两家巴士公司，又再开除工友，不承认工会，违背之前已签定的劳资协议书。这就说明了政治与工运的关系，职工会领导工人大众行动起来反对英殖民者及其傀儡，争取实现民族独立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必然的。

（八）建筑工联与各工团联合发表声明

“各业工厂商店职工联合会”被无理封闭后，建筑工联、华洋百货店员总会和鞋业工联发表联合声明指出工人的严正立场：“三万五千名工友从此便失去了维护他们切身利益的组织，他们的切身利益便遭受了打击，前几个月中，他们的遭遇便证明了这点。”

“过去三万五千名工友曾展开了改善生活待遇的斗争，都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都普遍地获得了初步的改善；且教育了无数的工友，使他们更坚强地团结在“各业”的周围，共同保障工友辛苦取得的成果。-----现在顽固的资本家便向工友进攻，如减薪毁合约等，什至变本加厉的集体开除工友的行动，是全星工友所不能容忍的。”

“我们强调指出，如今三万五千名工友失去了维护他们切身利益的组织 and 所遭受资方无理的打击，政府当局必须负全责。---事实上我们也完全明白，林清祥先生所说‘注册官的决定正是林有福政府粉碎那些坚决反对它的团体的另一个典例’，我们认为当局不顾工友们的切身利益的决定是完全不合理的，是完全违背了工友的切身利益。”“在不合理的社会中，任何站稳人民立场的团体或有正义感的社会人士的行动，必然会遭受到殖民统治者的种种阻挠或打击，什至于逮捕或封闭的强硬手段对付。我们呼吁工友们认清目前的处境沉着应付，不应灰心丧气，而应更坚强我们的信心，去争取和保障我们的切身利益。”

“林清祥先生关于‘各业’被吊销注册后对工友们所指出道路的号召，是完全正确的。”1957年2月15日十六工团致公开函予林有福，陈述有关工团及社团人士最近被驱逐出境之事。“吾等非常关心未经公开审判而无理被拘留与被驱逐出境的工团及社会人士，政府在未通知被驱逐出境者之家属与亲友之前，就在2月11日将彼等驱逐出境之突然行动，表示非常惊奇。吾等期待政府能履行在选举时所给予人民修改驱逐出境法令及其他不合理法令之诺言。尤其是在第二次独立谈判将临之际，吾等期望政府能在工人支持之下修改有阻碍与损害工运发展和人民利益之不合理的殖民地法令，且拒绝执行一切不合理的法令。”公函提出了三项要求：一、废除驱逐出境法令；二、公布被驱逐出境者之名单；三、提出公开审判那些在驱逐出境法令下仍然被拘捕者。

1957年4月11日，星市十六工团发表了联合声明，呼吁劳资合作，要求政府当局“负起因‘九一八’事件所造成的后果的责任”，声言将全力支持全星工友为保障基本的生活、维护切身利益的斗争。

声明指出“最近几个月来，劳资纠纷事件接二连三的发生着，许多的资方趁着工友受‘九一八’事件的影响后就利用这机会向工友进行一系列的进攻和压迫的行动，在许多顽固资方的工厂里停工、减薪、撕毁合约、无理改变工作条件，甚至于集体开除工友；特别是对积极的工友采取毒辣手段的事件很普遍。例如福利与郑古悦两巴士公司、谦拜工厂、花莎尼汽水厂、马来影片厂……等等。这些都是报纸有刊登的，还有类似事件未在报上公布的还很多。这些劳资纠纷几乎全部是因资方趁机对工友采取压迫手段而造成的，至于要求改善生活待遇的只有极少部分，如渔业工潮。……这些都是和以前劳资纠纷有所不同的特点，对一切类似遭遇的事件，作为全星工人阶层的我们，是绝对同情和支持的。”

“劳资纠纷和工业不安，是与整个社会经济结构和当权者不合实际的劳工政策及一些不讲理的资方只顾大量赚钱，而忽视照顾工友利益的错误态度分不开的，没有一个工友不想与开明资方合作，也没有一个开明资方愿意制造劳资纠纷。”

“为什么会造成目前劳资纠纷的恶化呢？主要是那些不讲理资方迷恋于‘九一八’事件对工友发生的巨大影响和其一贯压迫工友的本性分不开的。许多真正维护工人利益的工人领袖被捕，强有力的工会被封掉；政府当局又没有负起‘九一八’事件引发的严重后果的责任，对保障工人利益的事情，或阻止不讲理的资方的压迫行动，都置之不理。”

“目前新加坡还处在英殖民主义统治下，工商业的发展，尤其是民族工商业，受到殖民地经济政策的限制外，还遭受殖民地大资本家的压制和壟断，致使本地工商业不能够发展和繁荣，甚至于停滞和破产。……在摆脱殖民统治，争取自由、独立的全星工人，民族资本家及各阶层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

“我们一向来主张劳资真诚合作，互相照顾，互惠互利，劳资纠纷才能减少和避免恶化……工人之所以组织起来，就是为了通过集体力量，来保障自己的利益。现在局势已发展成这样了，广大的工人正准备起来维护自己切身利益和保障……我们呼吁僱主们保持和发挥劳资合作的精神，在劳资两利的原则下，和平协商，解决劳资间的一切问题。”

“最后，我们要求政府负起‘九一八’事件所造成的后果的责任，采取切实的步骤，适当地阻止不讲理的资方的压迫行动。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指出，全星工人必然是团结一致的。我们将在精神上、物质上支持工友兄弟为保障基本的生活，维护切身利益的斗争！”

十六工团：建筑工联、电车工联、汽车僱联、书业工联、黄梨总会、咖啡工联、理发工联、纺织工联、特士司机会、茶餐酒吧工联、无线电工联、华洋百货店员总会等。

1957年6月13日，巴士工联召开紧急大会，授权中委会在任何必要时采取全面同情大罢工行动，支持福利和郑古悦两巴士公司罢工工友，大会号召全星工友兄弟和社会人士，展开一次“抵制行动”，抵制乘搭福利和郑古悦两巴士公司巴士車，立即得到出席大会的全星各工团的热烈支持，都表示决以物质上、精神上和行动上，全力支持罢工工友；严厉譴責资方利用工会來对付工会的恶毒阴谋，并一致指出“交总”会员不应该再继续出车，以免破坏自己工友们的利益。建筑工联代表与其他廿余工团代表出席了会议并发表了讲话。当时“交通业工联会”主席沈瑞生托辞与资方有合约关系，“交联”与资方没有任何纠纷及为了维持交通便利，拒绝采取“实际行动”支援罢工工友而宣称仅作精神上与物质上的支持而已。这就是当时“职工总会”属下“交联”表面上表示同情，而实质上是在干着破坏工潮、分裂工友团结的真实面目。

1957年6月15日，全星卅二工团联合发表声明，全力支持巴士工联提出的“实际行动”，并号召所有工会属下会员和公众人士，支援福利和郑古悦两巴士公司罢工工友。声明说“巴士工潮已经进入了廿天了，纠纷的要点就是收回八十二名工友和承认巴士工联会问题。巴士工联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以求和平解决工潮。在过去七个月來，工会曾呼吁

車主公会出面協助解决纠纷。同时首席部長林有福还从英倫來电荅应协助解决纠纷，不但没有協助却又到欧洲去了。……巴士车主公会虽召开会议，但没有作出有用的建议，我们工团正在注视車主公会是否能作出解决事件的决定。巴士車主公会有十个成员，其中福利和郑古悦巴士资方已经作出对工业和谐有害的事，如果其他八巴士资方对工业和谐是忠诚的话，就应采取行动解决工潮。”

“巴士工联已号召全星工人和社会人士支援福利和郑古悦巴士罢工工友。我们工团决给予全力支持。”

卅二工团：泛星、建筑、海港局、黄梨、全星、无綫电、鞋业、缝业、胶业、造船业、商店、纺织、咖啡、車业、电車、食品、籐业、理电髮、机械、书报印务业、茶步酒吧、木器、五金、海產、巴士、汽车、驳业、砖业、洋人、火电鋸、製罐、漁业。

当“各业工厂商店职工联合会”被封，失去了工运领导中心后，建筑工会主动和各工团联络，互为往來，交換意見，关注及协助新成立的工会；关注政局的发展问题和工运面临的各种问题，声援罢工工人的斗争问题；在共同关注的问题下，召开各工团代表会议，各自发表独立的意見，通过协商取得一致意見后，就发表联合声明，阐明立场，表明看法，進行共同的斗争。这是在工运失去了中心领导的非常时期，建筑工联和而后泛星工联在推动团结各工团，发展工运，所作的努力！

以上所引述的有资料可循的各种联合声明，说明了当时各工团的紧密联系，互相支援，没有被白色恐怖的局面所吓倒；反而促使各工团更加自觉地团结行动起来，共同抵禦各种迫害，继续开展维护工人利益的各种斗争；展现了各工团领导工人们斗争的坚强信心，也展示了工人持久斗争的特色；坚持了各职工会朝正确发展的方向推进，发扬了群策群励的斗争精神。

这一时期工运趋于低潮，而各工团努力进行整顿、巩固工会组织并积极地开展各种文化教育工作和文娱活动，鼓励工友们参加，使工会会务更迅速发展，做好工人思想建设的任务。

（九） 泛星各业职工联合会的建立与发展过程

“九一八”事件发生后，在白色恐怖迷漫下，“各业工厂商店职工联合会”瘫痪了。由于情况混乱，“各业”僅存的少数中委及各區干事于 1957 年 2 月 10 日继续召开了会议，委任代理委员，填补被捕者空缺。名单如下：主席何杰副 K.Y.穆都、許南星，总务史立华，副郑激发，吳宓士，陳亞送，林石塔，陳德华，財政：蔡作成，副王祿夫，委员：陳水生，梁再明，曾松坤，符月好，陳瑞生，何兆波，郑景文。意图恢复“各业”的运作。

史立华说一个九人代表团于最近謁見社团註冊官。申訴勿以“暴动事件”加諸于三万五千工友的代表机构而封闭工会。

由于中委会致力恢复中央领导机构的工作和决议重新恢复各区行政组织系统。小坡区执委会于2月11日召开全区工作人员会议，委任各区分会代理职员。

之后中委会临时工作委员会即推举林安沪为区委会主席，试图恢复会务活动，可是第三天林君又被逮捕了。他们觉得“各业”工会的解禁已是无望了。

当时要取消“各业”的理由就是这二项：一、工会被用为作不符合该会宗旨和条例的用途，二、该会的基金被用在未经该会条例指定的用途上。

1956年11月21日，注册官孙崇瑜已援职工会法令发出了通知书给总务林清祥，阐述了为什么工会不应被封的理由。为此，总务林清祥（在牢内）根据事实坦率地详尽地回复了注册官的来信，他指出“关于取消注册所基于的第一项（甲）点及（乙）点的理由：1956年10月27日凌晨二时，我与本会全体中执委都在密驼律147至151号会所，当时正实施戒严，而我们并没有和武吉知马律87号本会分会作当面的接触，我对于（甲）点和（乙）点所述事件一无所知。我同我的委员会绝不会容许（甲）（乙）两点所披露的行动，而且倘若所述为事实，（实际上我们已经否认过其真实性）这些事情显然是在分会职员所不知晓或不同意的情形下发生。”

第二项（甲）点的理由：本会执委会核准购置‘时代报’出版社三千元股份，并与业主签署了一份合约。其中同意假如与法律有抵触，这笔钱将归还本会。……我们不以为这件事违犯本会章程。第二项（乙）点：去年9月中旬，劳工阵线联盟政府正着手肃清他所指的‘颠覆份子’。政府的行动是如此嚣张。我的工会的职员相当肯定这只是政府对付的工会，即新加坡最大和组织好的工会之前的一种预示。”他还对关于防止基金落入政府手中；十万元现款放在铁箱中，锁在会所后房里，不翼而飞等来龙去脉作了详细的解释。

由于注册官不满意林清祥的答复，刻意取消“各业”的注册。林清祥经过在监狱内及外的中央执委磋商后一致决定放弃上诉。他说“我认为你的决定是林有福政府坚决反对它的团体的另一个典例。”回复注册官不上诉！

当时“各业”临时中委会曾发表了简短声明：“虽然本会总务林清祥已理直气壮毫无隐瞒答复注册官所提出的四项问题，并呼吁当局应以本会三万五千会员之切身福利为前提来处理有关本会前途之事。然而，当局却似毫无所动，居然将本会解散了。”

“我们希望会友们不要悲观，不要失望，过去坚强无比的‘各业’是建立于会友们的坚固团结的基础上，只要我们有自信心，更加强大无比的新的‘各业’，仍旧可以在同样的基础上建立起来！”

我们知道，当时英殖民者及其傀儡都把工潮发生及各种由它们制造的动乱全算到由林清祥等人领导的强大的“各业”工会的头上；而且锁定林清祥等人必须被消除掉，进而剿灭工人运动的强势发展。所以它必须无中生有，制造藉口，泛加罪名，例如工会人员全被逮捕，会所被封锁，任由警方搜查，财物文件等被取走。若会所内的财物文件等遗失，谁应负责。事后以官腔文告要人解释，以为这可以不受予柄，岂非怪事。

当林清祥回复孙崇瑜的信时，已料想到“各业”工联的命运了。如果再上诉，徒费时日而已！对“各业”工联的会员极不利的。所以希望在外中委和分会干事必须事先即时做好安排和组织新工会工作，是当时一项紧迫的任务。

既然恢复“各业”的运作已不可能了。以“各业”这样庞大的会员人数，就只能以分散方式解决。他们分别安排了会友参加到原有同性质的工会，例如建筑工联、书业工会（57年8月11日后改为书报印务业职工会）、机械工联、商店工联、无线电工联（后为电气及电讯工联）；有条件筹组单一行业工会的申请注册新工会：例如胶业僱联、造船业工联、五金工联、食品饮料工联、海产工联等。

当时还有于3月26日已获得注册的综合性的全星工友联合会。该会总务刘烈明曾在报章上呼吁前“各业”工联的会员加入该会。有一部分会员参加了该会依然还有大部分未参加。（后来该会还于57年6月创刊出版了“马来亚工人报”，这是星洲自紧急法令实施后，第一间工会出版大型的报纸，纯粹报导劳资纠纷、工人生活与活动及工运问题；还设有副刊“工地”，刊登工人文艺。不过马来亚工人报仅出版五期，就未见再出版。）

据说当时另有间综合性工会派人与“各业”临工委接洽商谈合并事宜，谈商结果，工会主席、财政由临工委推举担任而达成协议。但过后该会反悔，遂告吹。之后该会的宋国良提出以他自己已注册的综合性的“大众工联”合并。该会总务安东尼与临工委代表经过数次谈商后达成协议。主席一职由临工委委派担任，财政蔡维杰，总务安东尼；双方同意归并后进行改组。执委会由原七人扩大至廿一人，人选由临时工委负责推举，当时该会仅有五百余人而已。据说当时临工委会议时，曾发生意见分歧，有人提议参加“全星工友联合会”，因而引起争论，无法取得一致意见，另一些委员坚持按原计划进行工作，寻求和大众工联合并。

据反映“大众工联”是于1955年4月4日取得注册，是一间不太活动的灰黄色工会。当该会领导层改组后于1957年4月改名为“泛星各业职工联合会”而正式诞生了。这种借壳生存发展的办法，不失为好办法，但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不是轻而易举的。尤其是黄色工会，它的负责人会紧紧把持住权力，利用各种手段阻止改组；更何况当时工友们对黄色工会是很反感的，不愿意去参加的。以“泛星”的情况看来，是相当顺利地完成了改组工作！

依据当时情况的反映，临工委好似处于被动没有主动出击。当有人提议“全星”比较具备条件的工会时，临工委为何不派人与之洽谈，了解详情，作较多方面的比较思考后，才作出决断而是直接拒绝提议者的要求，而出现不愉快气氛。其真正的原因却不得而知。

我觉得临工委会议意见分歧，既不是原则性的，如何化解，通过协商，做好“各业”会员的善后工作，才是良策。因为当时参加什么样的工会而能改组成功，尚是个未知数，在非常时期，首要关注的是“各业”会员必须要有组织机构代表保障工友们的利益，当需多方面寻找适合工友们的工会，接洽商谈，避免闪失时机，以致带貽误。

兹录下从“大众职工联合会”改名为“泛星各业职工联合会”并进行改组后安排的执委会人选：主席吴宓士副宋国良，总务：安东尼副郑激发、郑景文，财政蔡维杰副王禄夫，

组织主任梁再明，宣教主任蔡作成，劳资主任林石塔，委员布旺，陳德華，游家祥，陳瑞生，加林，郭松柏等。

在工会组织方面，由于会务的发展，会员的增加，宣教文化文娱活动的兴办，为了促进联系，加强团结，为了会务发展的需要，成立了四个分会：第一分会巴爺利峇区，第二分会大坡区，第三分会小坡区，第四分会武吉班让区。这样可使各区依据各区的具体情况，以各种形式紧密联系各厂、店、行业单位干事，促进互为联系，交换工作情况，方便带动工作。

“泛星”特刊曾说：“组织工作过程中，贯穿着一个重要的组织原则——以各民族工友的利益和团结为主，加强各厂、店、行业干事与工友内部团结，來维护工会组织和工友的切身利益。”又说“会议生活和集体访问，……已成为会务活动的主要组成部分。”

1957年10月修改了章程后，提出了会务方针：“加强团结，巩固组织”、“统一工运，共同奋斗”，作为开展会务活动的指导方针，大力推动各种工作。

由于“泛星”已有了巫印族工友加入，他们对工会工作也热忱，也很关心会务工作。为了适应工作的需要必须设立馬來工友事务部，負起加强馬來民族工友间的团结工作，照顾、反映馬來民族工友们的要求和情况。馬來事务部于1960年10月26日组成。該部首項工作是调查属下所有馬來族会员人数：計巴区一百七十人；大坡区八百五九人；小坡区六百四十二人；武区四百一十九人，共二千另九十人。他们曾召开过各厂店馬來干事联席会议，分析成立馬來事务部的意义及讨论如何推动馬來事务部的工作。出席会议者為數不少并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也曾举行了属下所有馬來族会员庆祝禁食節联欢茶会，还有节目表演：舞蹈、諧剧、男子服装展示、拳术、音乐演奏等。

这是其他工团所没有的。由于“泛星”已成为各民族工会所使然，有条件做好民族工作，所以必须关注做好馬來族和印度族工人的工作，促进各民族工人的团结，推动各民族工人的共同斗争，是“泛星”工会的重要任务，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的一环！

“泛星”工联的运作是“各业”的雛形模式，继承了“各业”的优良传统，罗致了工人干部和文化工作者，更广泛地开展了各种活动，解决了“各业”遗留的善后工作，对工运作出了贡献！

（十）1957年8月22日大逮捕事件

1957年8月4日，行动党第四届常年党员大会在羽球馆召开。新报记者观察到这是一个不平常的会议。从开会的形式、时间的长度及整个大会的意义，都跟往年几届大会有显著的不同。入场检查非常严格，不论新党员或老执委都一律凭证入场。选举党中委也是从来没有用过的秘密投票。在平静中隐藏着巨大的风波。

新报记者也发觉是党内出现各种不同成分的党员的意见分歧，几个月以来都无法达致团结，一致对外。两派党员的歧見已趋于表面化，摊了牌。当时的各政党，当接近于选举时期，各政客为着趋炎附势，为未来的选举取得一些政治资本，纷纷想挤上各政党的高

级职位，难免发生一些内鬩的趣剧。行动党的内部斗争，与其说是争权夺利，毋宁说是思想斗争，是党内温和派和激进派的思想斗争。

李光耀还发表长篇演说。着重说明行动党不是共产党的外围组织。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长远目标，与共产党没有分别，只有方法上有分别。主张以和平合法手段达到这个目标。他说马共如能像印度共产党一样，放弃武装和非宪制的斗争方法，那么我们是应该允许共产党出来在民主制度下作和平的竞争。但他忘记了一九五五年的华玲和谈，马共要求结束战争，要求在宪制下和平合法活动，却被英殖民者及其傀儡断然拒绝，而且还要挟马共必须投降。他为什么不按事实来说清楚而是用英殖民者的口吻重复说唱！

他还说中央执委中，有八人是对行动党在过去所跑的路线负直接责任。他要求所有党员，凡是赞成这一个动议的，应该将这八人重新选入执委会。反对这个动议的就一个都不要选。既然选举是秘密投票，怎么还可以指名选谁，又何必秘密投票！

当时李光耀提出一条重要的动议，规定行动党在未来的行动中跑温和路线，接受新宪制，反对颠覆条文，同时为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和非共的马来亚的长远目标而奋斗。授权新的中委会修改党章和整顿党内组织。王永元附议。

党员大会对这个重要动议与选举中委皆以秘密投票进行。结果以绝大多数通过了这个动议；而中委人员却起了变动，王永元、哈伦加森、依斯邁拉欣落选。增加了四个新人：陈贡元、陈翠瑞、陈世鑑、王才安。

李光耀公然公开要党员选举他的八人集团却落了空；结果在複选时拒绝担任重要职位。8月13日又召开中委会会议，在力劝无效后，只得进行複选，结果如下：主席陈从今副陈贡元，秘书：知知拉惹副陈世鑑，财政王才安副吴文斗。

其实，所谓激进派（报章上所用的）並沒有提出激进的动议；如果是争权夺利的话，为什么还要一而再地让李光耀等人继续担任要职。所以说新中选的中委要夺取领导权是不能成立的。他们只是要坚持依照行动党的反殖党綱行事，在新中委会里制衡行动党滑坡地变质而已！不料距离複选后不到二星期，英殖民者及林有福政权，迫不及待地即于1957年8月22日采取迅雷不及掩耳，掃蕩了行动党的重要职位的新中委（知知拉惹除外）及各支部负责人，共有30多人银铛入狱。这决不是偶然的，是替李光耀集团清党，解除后患。以后李光耀集团重掌了中委会改变了党员大会选举法，沿用教宗的选举法。即由中委会委任幹部党员，再由幹部党员选举中委，而不是普选，已没有了民主选举。从此李光耀牢牢控制了行动党。

1957年8月22日的大逮捕事件，被逮捕的有陈从今（行动党主席），陈贡元（副主席），陈世鑑（副秘书长），王才安（财政、車业工联副主席），吴文斗（副财政、車业工联秘书），蔡垂良（支部执委），朱修兴（支部秘书），邢福源（支部主席），戴秋声（支部秘书），杨再喜（支部执委），陈清漢（支部秘书），陈木庭（支部主席），符俊良（支部副秘书长），段文华（支部委员），謝瑞怀（支部委员），林辰业（支部委员）周最林（党干部）。这次逮捕事件也波及工会负责人：泛星工联：梁再明（中央执委、造

船业工联秘书），郑激发（中委），林沙烈（受薪秘书），林戴偉（受薪秘书），蔡作成（中委），林石塔（主席），蔡偉杰（财政），詹密星（海港局工联秘书），李清华（建筑工联总务），楊啟主（建筑工联副总务），藍平（鞋业工联秘书），邓觉民（纺织工联受薪秘书）；报馆人员：傅无闷（新报董事），李西浪（新报主编），易润堂（新报採訪记者），朱然（国星电影製片厂经理）。

从行动党党员大会中委会的改选到複选那么短暫的时间内，英殖民者就命令採取逮捕行动党重要人员來思索，当时局势又处于低潮，没有群众运动发生。被逮捕的大部分都是行动党新的领导层和各支部的重要干部以及各工团的负责人。这些人也没有作出任何行动足以危害英殖民者的统治利益，而需要迫不及待的採取逮捕行动镇压，这些人或許是政治部已确定为“親共份子”。很值得深思！

当然啦，李光耀早已不止一次申言要和“親共份子”划清界线，他早在党章里添上了“非共民主社会主义”的招牌，以免拖累他爬上权力场。显然地，这些人（姑不論是不是真的親共份子）是为替李光耀心目中认定的“親共份子”而当陪葬礼！作为牺牲品！这也是英殖民者幫了李光耀一个大忙。让它解决了党内的异己份子及各种纷争。

三、1959年至1963年

（一）1959年新宪制大选及人民党事件

我们知道，人民行动党是统战机构的政党形式组织。成立时是李光耀、林清祥、方水双等人所领导，上层领导多是受英文教育者，少数是左翼人士，而基层党员、干部绝大多数是劳动阶层及知识份子，它是适时成立的具有强烈反殖路线的政党；又恰在西方反共之風炽烈时，因而在西报上常遭到颠倒黑白反动言论的攻击，为了淡化这种压力，不影响行动党被有藉口对付，使之生存下来，林清祥辞去副秘书长职位，又在行动党第二届中委会选举时，林清祥等好多名工会负责人自动退出选举，这引起党员们的愕然！以不谋在领导位置，堵塞英殖民者的藉口对付是天真的。如今回想起来，既然行动党是统战的共同反殖的政党，为了反动反共的压力，而放弃了领导的主动权，又怎能带领党员大众始终一贯反殖，争取民族解放呢？又怎能避免和阻止反动政权的镇压、逮捕行动呢！更何况早已有了对付、消灭“颠覆份子”的事实例证。

看看当时所发生的事实：1956年“9·18”事件，林清祥、杨高锦等一大批工会负责人被逮捕下狱；1957年“8·22”事件，行动党新中委、支部人员及工会负责人又遭到大逮捕投入牢房，尔后随之纷纷被驱逐出境。这时期左翼反殖力量及工人运动遭到严重挫折，困难重重，只能加紧重组，聚蓄力量，加速整顿，扩展组织力量，以迎接未来的斗争。

由于李光耀已经修改了行动党的纲领及各种星马合并的言论与行径的毕露，已隐约反映了李光耀力图放弃真正反殖的大方向，坚决与“親共份子”划清界线；同时频向英殖民者送秋波，取悦于英殖民者，为他爬上权力場添砖加瓦。当时的职工会、民间团体依然

处在五里雾中，依然寄希望于行动党，想方设法团结行动党，以取得谅解共同反殖斗争，并面对 1959 年新宪制大选。

从当时星洲的大环境观察，摆脱英殖民者结束殖民的统治，争取独立自主的斗争，已摆到日程上来，是首要的政治任务。广泛动员人民的力量，作好统战工作，集中力量，在共同反殖的基础上，步伐一致，才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这是从大局考虑问题所作的决策的。因而，还诚心实意协助李光耀行动党在求同存异下共同奋斗呢！

格于当时整个大局的反殖趋势和行动党内部的纷争，及李光耀受到挑战急于寻找“权威人士”解危，才有方壮璧于 1958 年会见李光耀时，坦然说清：1957 年行动党内风波与他无关，仅是他们的自发行为，以释疑于李光耀，急于以此“修补”左翼力量与行动党的裂痕，达到共同反殖斗争的胜利。其时各工团也一样支持行动党。并没有分道扬镳。他们见面时，李光耀曾为了确认方壮璧的身份和权威性，要求方壮璧，促使郑越东退出工人党并辞去市议员职务，而方壮璧不疑有他直爽答应他的要求。（仅根据十二讲里的说词）李光耀并把方壮璧冠于“全权代表”的名衔，因而传遍了星马，都知道有个神出鬼没的“全权代表”方壮璧！

后来的确发生了郑越东退出工人党辞去市议员职的事件。其时工人党在市议会选举取得三席，正在发展，他害怕马绍尔的崛起，骨子里心谋打击工人党，减少竞争对手，假藉方壮璧的手来打击工人党，让它自生自灭。当时行动党已取得了市议会执政权，王永元当市长。他举起了大扫把横扫一通，又摒弃了象征英殖民者的权杖的表演，激起了人民的共鸣，也增加了王永元的声望！

依据当时星洲各政党的状况来考量，已别无选择，除了行动党之外，其他的却难于担负起反殖的政治任务。虽然对行动党也有所不满，却归咨于内安委会的操控与作祟，但对行动党李光耀的言行没有清楚认识，至于历史问题则一无所知，仅从某些人士不够真确的信息反映，轻易的在表面上加以肯定他的反殖意向的戏法而失去了警觉。

左翼职工运动者好心为怀诚恳寄希望于行动党在即将来临的大选中获胜，以全民的力量作后盾，肩负领导人民代表团赴英伦谈判时再力争独立自主，还政于民。为了实现这个重要的政治任务，是不可能全力支持人民党候选人。人民党虽是左翼进步政党，但它的基层组织，远没有深耕起来，群众基础不广泛，影响力不大，在政治上的活动也没有积极开展起来去，这要工团倾全力支持是难于办到，更难于取得一致意见。

就当时情况看，虽有人察觉行动党李光耀在星英第二次谈判时态度模棱两可，孰不知那时李光耀掌控的行动党和英殖民部大臣波德早已搭上了同一条船！大家亦没有识破李光耀空耍反殖的策略手段和伎俩；而在统战中负有领导责任的又没有主动出击，采取既要团结又要斗争的策略手段，抓住对方弱点，主动制衡对手。因而由于天真诚实不疑有他而一厢情愿踏错步子，因而后来常被人詬病！

我们知道，新加坡之所以有民选制度，那是在日本投降后和平合法时期，英殖民者为了欺骗人民，伪装民主，施行改良政策，安抚人民的不满情绪，缓和冲突，遂于 1946 年由英皇颁布了“新勒令”，允许立法议会部分民选议员，并于 1947 年首次举行部分立法议员的民选，惟选民却是英殖民者圈定的；1952 年又一样举行第二次；1954 年出炉了“林德宪制报告书”，并于 1955 年根据“林德宪制”施行首次立法议会选举，劳工阵线胜选组织了政府，马绍尔当了首席部长，政务司依旧是英国人；首次星英自治谈判失败，马绍尔愤而辞职由林有福替代；1958 年依据“星英协议”颁布了“自治邦宪制”，并于 1959 年 5 月举行了“自治邦议员”选举，当时有 11 个小政党和一位独立人士参选，人民行动党在 51 席中取得 43 席，人民联盟 4 席，华巫联盟 3 席，独立人士 1 席，人民行动党取得执政权。

当时人民党派出 4 名候选人参加大选，意料不到的全败下阵，四区候选人的按金全被没收。虽然如此，人民党并不气馁，反而更积极活跃起来，开办各种文娱文教活动，办党报、特刊等及展开政治活动，热火朝天的再干起来。

1959 年大选前，有关人民党候选人，牵连到建筑工会，本是由一人参与却闹了双包案。工会完全不知道正副总务二人被推选为候选人，而总务汤君也没有照会知悉于工会；由于总务负责工会的会务，工会当然不同意他参选只同意副的吴君参与。经过了解谈商也无法解决，后来知悉不派出人选，事情就不了了之。但事出意外，一些人民党工作人员（有泛星、建筑的；当时泛星小坡区分会与“建筑工会”同在一个会所）为了拉拢“建筑工会”工作人员帮助竞选工作，不惜以散布不实和宗派的个人攻击流言，说成吴君争不到当候选人而反对人民党。原来正总务不顾工会反对而执意参选工会也没有料到。为了不让流言扰乱会务运作及让工作人员明瞭真象，只好作出澄清。这是建筑工会成立以来第二次碰到的。

数拾年后，赛·扎哈里在回忆录里说：“一九五九年大选前夕，方壮璧向李光耀的要求低头，确保没有人民党候选人在大选中获胜，结果的确如此，以此向李光耀证明他权威性的存在。”

我读了赛先生的书后，对于有关人民党事件及其四名候选人的按金全被没收的少有的左翼政党落败的情状，赛先生的悲痛是可以理解的。但不应情绪化地完全归咎于方壮璧个人身上，那是当时星州局势发展所使然，也是方君在执行任务和统战策略时所犯下的错误，并不能单纯构成“出卖”人民党的罪名，显然地，或许是不太了解详情吧！而作出不太理智的断定。我是敬佩赛·扎哈里这位马来同胞的，也得说句公道话！

现在再看看方壮璧在“天若有情，谈笑间”怎么说：“当时以‘修补’与行动党的关系作为出发点的策略考虑是不正确的。---首先就弱化我们面对的地位和力量。其实，当时对方是完全需要我们的支持和‘护航’的。----我们却采取了妥协和退让的态度，希望以此来取得对方的信任和谅解，以换取对方‘共同团结反殖’。这样的偏差，实质上是‘策略上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方壮璧说：“1958 年的‘郑越东事件’，是因为急于要对方谅解而作出错误的处理”“一九五九年‘人民党候选人事件’，是处于要争取稳定局势，加强行动党与英国谈判的筹码，决定给予行动党‘全面支持’的错误想法所作出的错误处理。”

他没有逃避责任，搪塞和掩盖掉所犯的过错，澄清了事实，还是可以理解的！在当时他为了负起被委托的任务，才去会见李光耀，其实李光耀早已放出风声要找“权威人士”，解决纷乱不一的意见，虽无法达致目的而作了馊事。但这种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勇气，是值得赞赏的！不过这也说明方君在执行统战的策略上与当时的实际情况的判断上不相符合，忽略了执行统战策略必须以力量作为基点。采取既团结又斗争的策略方针，考虑对方所处的现状，掌握住主动权进行谈判才能达到一定目的。这是事后他思索出来的经验教训，给予后人的警惕作用是可取的。相反的，李光耀那种过河抽板的行径，是耻予人的！

1959 年的选举，英殖民者也帮了行动党一个大忙，使李光耀集团揭露了“劳阵”的周瑞麒接受了美国馈赠的五十万元事件。新加坡人民顿时哗然！当时林有福的人民联盟政府已是臭名昭彰，加上这一重槌的袭击，也就一蹶不振。加以左翼运动的全力支持，行动党已是胜券在握。大选结果，行动党取得了执政权。在选举前，李光耀曾申言，与行动党有关的八位知名的工运人士必须释放，才宣誓就任。

原来李光耀一路走来在每个月甚至 1 个星期内，以“探监”为名，到监狱内游说，把这些入料理到和他合流。结果有人写了一份信件，其他人都签了名，只有林清祥不懂签名而已。蒂凡那又写了第二份声明：“实现社会主义的目标与手段”，已准备好了在 1959 年 6 月 4 日获释时在报章上公开发表。这就是李光耀安置的“紧箍咒”，随时都得向他的旨意转圈圈，不得违误！

1959 年大选行动党胜利了，在中委会推选总理人选时，看来是非李光耀莫属，令李光耀难堪的是王永元和他平票，主席杜进才有二票，才救了他。尔后王永元成了他的对手，提出了另一套纲领，结果被清除出党！但是，在芳林区补选时，无党派的王永元在没有工团的支持下居然取大胜。我们也没有再三反思，这是怎么回事！！

（二）建筑工联的会务活动和出版物

建筑工会会务的发展壮大，必须拟出指导方针，以利于按步就班工作，也便于作会务检查，纠正缺失修正错误，使会务朝正确的方向发展。以下是历年会务方针：

1957 年“加强领导 巩固组织 争取实现八小时工作制”

1958 年“检讨二个月来之工作的执行情况并补充工作计划的新内容”

1959 年“加强领导 巩固组织 大力展开宣传工作 争取改善工友生活”

1960 年“关心工友福利 做好团结工作”

1962 年“加强宣传教育 捍卫工人利益”

1963 年“巩固厂单位 加强政治教育”

1962 年適逢建筑工联成立六周年暨鲁班先师诞辰纪念，遂于 7 月 21 日假羽球馆举行盛大的纪念大会。不料遭到警方阻挠干预，不准节目演出，否则不能举行大会。工会负责人当场和警方理论并交涉，抗争辩诬不是举行卖票公演节目，而是工会会员排练的纯为娱乐会员而已。当时羽球馆人潮热烈，出席的工友、会员极众，就不再理会警方，宣佈大会正式举行。

工会主席李清华在会上发表讲话，呼吁工友们团结一致，支持工会的号召，在即将来临的全民投票中，以投空白票反击行动党的横蛮独裁措施，并广为动员，宣传发动工人们起来捍卫民主的斗争，总务杨小黑作了关于“团结一致、捍卫民主、动员力量、发展会务”的工作报告。各工团代表出席踴躍，发言的有泛星，缝业、木器、纺织等均一致強調，全民政治斗争的重要性及迫切性，并呼吁响应投空白票的号召。

大会通过四条决议案：

- 一、本大会強烈抗议当政者横蛮通过全民投票法案，本大会号召全体工友在行将来临的全民投票中投空白票，以示不承认投票结果和不信任当政者；
- 二、本大会严重抗议当政者剥夺人民结社、集会自由的基本权力，并号召全体工友为保卫民主而奋斗；
- 三、本大会全力支持正在合情合理的罢工斗争的工友，并呼吁全星工人兄弟姐妹予一切物质上、精神上的支援，直至罢工工友获得胜利为止；
- 四、本大会呼吁本行业工友团结起来，提高认识，继续为争取工友的愿望的实现，废除多层包工制，享有劳工福利及合理的劳工赔偿，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促进建筑工友生活的改善。

接着是大会另一主题节目：演出反映建筑工人的生活、工作和斗争的话剧“在建屋工地上”，这出剧是工会话剧组及导演陈英俊认真辛苦排练的，而且真实地在建筑工地排练，并摄取剧照留存；还有百人合唱大演出等。这是建筑工会诞生以来，最大规模，观众最多的集会，是值得一提的！

建筑工会成立以来，就非常注重宣传与文化教育工作，提高工人的思想与政治认识，除了举办文教与文娱活动外，文字宣传也不可或缺。因此都很关注工会的出版物，使之广泛传播，既能训练出工人写文章写报告，又能使工人文艺发展起来。工会的出版物、板报、壁报、书法等等都肩负了这个责任。

建筑工会的出版物为数不少，早期的已散失殆尽，无从寻觅。当年都是鋼板手写油印的告工友书，会务报告及传单、小册子等等。

1958 年工会二周年会庆暨魯班先師誕辰纪念，出版铅印的四大版大报型的特刊。内有篇宣委会“关于工友之思想意识、活动情况和工作问题之报告”，这整版的长篇报告阐述了一、建筑工友所面临的问题：（一）工友没有得到教育，普遍上是文盲；（二）黄色与色情的泛滥；（三）工場的赌博现象；（四）本行的复杂情况；（五）工友的散漫情况；二、目前宣委会的活动：根据重视工人教育，提高工友文化的认识，在工场設立了好几班识

字班，后因出现种种难题而停办了，但提出必须继续重视工场的活动；三、对工作中产生不良倾向的意见：（一）缺少联系 各忙各的，（二）工作自由散漫 没有纪律性，（三）宗派主义与小集团；（四）宣委与干事失去联系；（五）缺乏对时局的认识。

这篇报告是得到执委、干事们的意见反映而收集和经过到工场与工友们接触、了解、目睹工场情况及当时工会内所出现的问题和活动情况所作的调查研究后而写就的。这是对推动工会会务工作有所帮助的；也是对执委、区委、干事们及工作人员对建筑工地及工友生活情况的认识，作到心里有数，掌握实际情况，做好宣传教育、组织工作，而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提醒警惕工会内冒出的不良倾向（虽不是已严重化）的重视。未雨绸缪，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特刊也刊登了专论文章“论当前工人运动”：一、当前工运的总任务，二、当前工运的处境，三、当前工运的迫切问题。

1959年5月9日，第四届会员大会出版了“1958年会务工作报告”（打字油印本）

1959年10月3日“会庆三周年暨鲁班先师诞辰纪念”特辑。（印务局印的小型本）。特辑除了会务、宣传、组织的报告、知知拉惹、陈维忠律师的献词外，尚有工运论文：一、“当前局势和工人运动的发展”，文章阐述了：（一）目前的政治局势（二）工运与政治（三）职工会的责任（四）工运的独立性与主动性（五）工会与政治（六）职工运动的团结与统一（七）当前工运面对的问题。由于当时对工运统一问题出现意见分歧，尤其是政府企图控制工会而写的表明工会的独立意见，供各工团参考。还有“本会对包工制的意见和向政府提呈的备忘录”。

1960年6月20日出版了定期“会讯”第一期。封面是建筑女工红头巾的画像。内有“何以联总被撤消”、宣委会新指示、工友写作篇章。

1960年10月，“建筑、木器、砖业、火电锯、造船业五工团联合庆祝周年暨鲁班先师诞辰纪念特刊”的出版（文化印务公司印刷）。有发刊词“我们的共同愿望”，五工团的会务报告，“土木联总筹组及被吊销经过”，“星洲职工总会的变迁”，知知拉惹的“社会主义在我国”，职工总会主席巫旺的“工人斗争”、“联合邦职工运动的简述”、“叛乱平息的印尼职工会活动”等文章。这是一份颇具份量的特刊，可以了解五工团的共同愿望与会务情况，联总被吊销经过，星马印二国工运的变迁发展经过。有着历史价值。

1961年3月15日出版打字油印“关于常务委员会对于展开向领导层提意见的决议指示”。这篇类似工会整风的文件，是建筑工会负责人意识到要领好一个健全的，能发挥强大作用，必须要有工会领导层、执委、区委、干事们及工作人员在统一意志下，同心同德、团结一致；及时发现错误、不正之风，（例如自由散漫、背后批评和议论、涣散人心的伎俩等不良倾向），能即时纠正，阐明严守纪律的必要性。这种纯洁工会领导层、区委、

干事们及工作人员的思想工作必须确实做好，否则，久而久之，工会就会四分五裂，或各自为政，陷于纷乱的局面，是无法抵御面临更大风暴的袭击。

当时会议决定广泛向领导层提意见，展开自上而下的批评。新的常委会决心把不良的工作方法与工作作风力求改革，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务使成为其领导会务工作向善向上发展的坚定不移的中心；成为积极工作，起带头作用的工作模范。在这样的基础上要求大家提出意见，展开批评，领导上及负责人将诚恳并虚心听取与收集各种意见，接受大家善意的批评。这个决议正是让大家有充分表达意见的机会。提出意见与批评应基于工会的利益，以工人阶级的立场，以民主方式与正当的方法表达出来。

这是一项大胆不怕出乱子的颇具现实意义的决策。

1961年4月22日出版了报纸的“全星建筑工联第五届会员大会常年报告书”。文章有主席李清华的“坚定信心，勇往直前”献词，总务吴仲桂的会务报告“在新环境里的工作任务”，副总务杨小黑的“看见成绩，找出缺点，有勇气，有毅力，克服工作的错误”的报告，财政梁俊章的“共同努力，把工会的经济堡垒建立”，组委主任张清华的“以具体的事实，掌握组织艺术，让组织工作生动地开展”，宣委会主任李健的“把定方向，结合会务，做得深入，既全又好，宣教工作才有骨有肉”。还有劳资纠纷大要（1960年1月至1961年3月）。

1962年2月22日“庆新春工友联欢晚会”特辑（打字油印本），有关于把文娱活动献给工人大众；文娱下乡的问题及其他有关康乐活动的篇章。

1962年4月第六届全年（1961年3月至1962年3月）会务工作报告（文化印务公司印）。有会务报告：一、坚持团结 坚持发展 继续为维护工人权益而斗争，二、驳工业不安之谬论，三、建筑女工之处境、四、我会举办“五一”周展览演出及各项活动的图照。

1962年7月21日出版的“庆祝六周年暨鲁班先师诞辰大会特刊”（文化印务公司印刷）内有文章：主席李清华：“发扬先师精神、面对斗争考验”，总务杨小黑：“团结一致、捍卫民主、动员力量、发展会务”的报告，泛星主席陈德华：“严厉裁决历史罪人”，古晋建筑工联贺电，马六甲建筑职工联合会贺词，陈军：“反大马运动的现阶段”，少凡：“二年前后建筑工人的生活与斗争”，野花：“大马计划的种族主义特征”，“历年会务总方针彙编”，漫画：人民的力量；捏死公鸡怕天亮；十年来建筑业工资水平变动图。历年会员人数图表；工人生活、文娱活动、罢工斗争现场等图片；实地拍摄的“建屋工地上”的剧照及大会提案等。

这本特刊是编委会花费许多心力编辑而成的，颇具重大意义的。从工团、乡村团体、南大学生团体、校友会、本总会、分会的全体成员都刊登了贺词，建筑商公会和众多建筑公司也都刊登了广告贺词，是建筑工会空前未有的。这也说明了全星工团、文化艺术团体、南大学生团体、乡村团体及建筑商公会和建筑商的鼎力支持。

1963年3月8日“庆祝妇女节”特辑（打字油印本），是工会妇女组有关女工们的心声。

（三）“泛星工联”的会务活动

1959年6月以后，“泛星”的会员直线上升达三万多会员。各种文教和文娱活动，就能更普遍扩展起来，这就必须解决人手和指导员缺乏的问题。他们通过“反黄周”的各种活动，发掘了工人阶级里蕴藏着许多艺术人才，作为文娱活动的主力军。我觉得这是个颇具现实意义的不全靠外来人材的作法。值得称许。

兹引述“泛星”主席陈德华的话：“文娱活动早已成为工会会务活动的一部分，如果说工会的文娱活动是不容忽视的话，那就因为它是有效的教育工友工作之一部分。”“我们希望工会之文娱活动能够正确地沿着这条道路与这个方向发展，而文娱工作者也能够与工会文娱活动相配合，从事于创造一些具有高度教育性与艺术性的作品，以便推广工会之文娱活动，通过工会文娱活动广泛的展开教育工友之工作。”

“在此时此地，工会之文娱活动应该是附属于工会会务活动的一部分，否则往往会把整个工会发展变成文化团体一样。更有些成员自从参加了工会文娱活动后，也就渐渐地演变成‘钻牛角尖式’的研究起‘艺术’来了，生活开始脱离工会会务方针，慢慢地疏远了工友，变成了超然派的“艺术家”，若有此风，委实不可长。……”

依当时“泛星”出现的情况，陈君的这番话是提得及时的。毕竟工会不是艺术团体，不能越俎代庖而漠失了工会的重要任务。

陈德华君所指出的不良倾向，在建筑工会方面并没有出现，反而是参加活动的成员、负责人及外来指导人员，都融化在工人队伍中，共同推动工会的会务工作，也成为工会的生力军。这或许“泛星”已是一间大工会，工作人员纷至沓来，许多文化文娱工作者涌入，有以致之。

“泛星”的文教和文娱活动自五九年起，就比较有计划性，按部就班地热烈地开展，随后形成了一股热潮，各种活动迅速扩展，而且多姿多采，培养了不少艺术工作者，负起教育工人大众的思想建设工作。这是在工运中对工人的精神面貌作出了值得称许的贡献。当时除了“书报印务业工会”、“建筑工会”外，少有工团能与之匹敌。

关于文教方面计有高级文化班、文化班、高级班、中级班、低级班、干事班、巫文班、缝纫班；还有各区的小学一年级至六年级各班和初中一、二年级；并划一各区学期制和统一教材。形成了有系统的学习制。

关于文娱方面举办“泛星杯”乒乓比赛，作文比赛、演讲比赛等。举办郊外野餐、爬山、绕湖；联欢会、座谈会、电影招待会等。话剧组的排练计有“大选前夕”、“怒火在苦难中燃烧”、“岁寒图”、“走向胜利”、“夫妻之间”、“陞官图”、“我们要行动了”、“风雨牛车水”等剧种。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在文教与文娱活动方面，“泛星”和“建筑工联”一样，选择编印适合工人学习的材料出版“工人读本”和讲义本（结合工会会务）及补充读物；关于话剧方面的剧本也选择本地创作为主排练；歌咏队的演唱歌曲也一样；另一方面，更注重在分会、厂、店、行业单位普遍开展，发挥更广泛的教育作用，是巩固组织，团结工友的有效方式和方法。

“泛星”还举办过大型活动，例如“反黄周”、“会庆周”等。这里引证五周年会庆纪念遊艺晚会演出的情景：“在会庆周，我们举行一连三晚的大规模遊艺晚会，进一步巩固在‘反黄周’所吸取的工作经验及所发掘的人才；另一方面深入工人群众中去发掘更多的工人艺术人才，在二十个节目中全由我会工友当演员，其中出色的节目有五百人大合唱，容纳了所有热爱文娱的工友。”

“这次演出一连三晚假快乐世界体育馆举行，总共约有三万五千名观众，大多数来自工人群众中。参加演出的工作人员共一千八百六十多位，这次演出获得成绩是巨大的，我会的声誉，深刻地印在星洲工人及广大各阶层人民的心坎里，‘泛星’的旗帜也就光荣的飘扬在新加坡岛上。”这显示他们洋溢出引以为自豪的浪漫情愫！

在这里，我想到戏剧家林明洲（已逝世），他是一位著名的本地剧本写作者和导演。曾化名赵万喜在“泛星”五周年纪念特刊所写的一篇文章：“重视培养工人写作者”。就当时工会的情况是深具现实意义的。

兹引述该文的数段：“我建议工会的宣委会应增设‘工人写作组’。一方面有计划地帮助工人提高写作能力；另一方面进行研究和收集几年来工运中所发掘和培养出来的具有典型性的优秀人物和富有教育意义的事件，用为作品的素材，以文艺形式予以反映，”

“一般文教工作的负责人和语文教师，对工人写作问题仅作了一些简单的解释，不是有计划地指导工友进行工余的写作活动，他们一路来的教学法，都是出几条题目让工友自己去‘摸象’。……常常被判为：‘文不对题’或‘文章太简单、主题不明确’。这样的指导学习的方法，严格说来是不够严肃的。”“目前一般写作者有一个严重的缺陷，就是他们少有机会去深入地了解工人的生活，因此不能从事这方面问题的写作。既然对工友的实际生活无所理解，作者怎能在思想感情上感受工人的疾痛，又怎能正确认识工人的阶级品质呢？必然地，他们写到关于工人问题时，仅能简单地从理论的概念出发，根据一知半解的知识，勉强地硬写出来。这种情况多少可以说明本地出版物极少吸引读者的关心和重视的原因。”

“虽然工友的文化程度低，写作能力不强，但他们却具备了写作活动的最主要的条件——丰富的生活体验。几年来工人群众的生活，就是新与旧，进步与倒退势力之间的斗争生活；几年来的工人运动，正是具体表现了他们的爱国主义精神：再也没有人比工人群众更深刻地接受爱国主义思想的影响。他们是有可能描绘自己这一系列行动的，虽然技术上还有困难，但并不是大障碍，不是不能克服的。我们知道外国有许多工人作家，他们

经过有计划的鼓励和协助后，就能写出很好的作品。再者目前在工会事务上，对于书写人才还是非常缺乏的，这同样需要我们重视从工人中选拔幹才。”

这里引述了林明洲文章的片断，是想说明林明洲和“康乐”的一些艺术工作者对当时“泛星”的文艺和戏剧活动的关注而作出了贡献，是不应被遗忘的！

1959年后，“泛星”聘请了林清祥、方水双、蒂凡那、兀哈尔等为会务顾问。

“泛星”的出版物：1960年4月10日出版“庆祝五周年纪念”特辑，内有主席陳德華“过去、现在，将来”，法律顧問知知拉惹“穷人与富人的抗争”，会务顾问：蒂凡那“对工人阶级的新看法”，方水双“职工运动面对的新问题”，兀哈尔献词，多明尼“在一个法西斯国家里的工人运动”；总务、财政、宣教、组织的报告，星工“本邦自治所发生的工潮”，欧京赐的“反黄周前后经过”，趙万喜“重视培养工人的写作者”，会员人数表及工人文艺等。

1961年4月2日出版“第六届会员代表大会常年报告书”。

1963年1月14日出版“泛星报”号外：“为筹募福利基金举行文娱晚会特辑”内有主席陳德華“愿工人文娱更健康发展”，張新華“文娱晚会与福利工作”，陳一峰“职工会宣教活动的探讨”，李南耘“互助友爱是工人阶级的传统精神”，莫态熊“我会文娱活动的回顾及前瞻”，李慕虹“职工会文娱活动几个问题”，林萍“发展大众化戏剧”，班丹勇“多写些朗诵诗吧”，山多牧子“音乐家，祖国需要你”，高虹“戏剧与文学”，流云“工人戏剧活动的一些问题”，紅燕“伟大的作曲家---柴可夫斯基”，思彰“为什么要学习戏剧理论”，吳小龙“论喜剧的特质”，初习“论艺术工作者的群众作风”，漢“人民歌手---冼星海”，導演团“我们怎样处理‘风雨牛車水’等等”

“泛星”还定期每月一日出版的小型报纸的“泛星报”。1961年1月1日创刊，每份定價一角。内有会壇，专论，报导劳资纠纷，工地（工人文艺），工友通讯等等。出版了至少有二十一期以上，至终刊详情不知。这对“泛星”来说，既发挥了相当广泛的宣传作用，又培育了工人写作者，发展了工人文艺！

“泛星报”第五期刊載4月2日的第六届常年会员代表大会选出新的中委会，名單如下：主席陳德華，副多明尼、黃催云，总务布旺，副陳瑞生，四区总务：第一分会李朝明，第二分会洪君平，第三分会吳静明，第四分会陳丽英，財政林晶焰，副林生益，宣教主任莫态熊，秘书李南耘，組織主任張銘文，秘书張新华，馬來事务部主任布旺，秘书耶耶，中央委员許南星，金聚兰，潘开富，薛锦梅，陳垂送，中央查賬林彬彬、黃垂国，中央信托布旺、黃催云、陳瑞生。法律顧問知知拉惹，会务顧問林清祥、方水双、兀哈尔。还通过了五条議案及刊登了三位顧問的演说。文章有五一特辑，“怎样搞好工人教育”，“五一劳动节简史”，“当前劳资关系检讨”；会壇：“从五一谈到当前本邦工运之任务”。第八期会壇：“認清当前局势，反对分裂工运”；“憑何理由解散职总？”（内有商行僱員联合会及泛星工联的声明）；（1961年8月1日）。1961年10月1日第十期

会坛：“本邦工运面对新的挑战”，专论：“当前政治局势和星馬合併”，1961年12月1日第十二期会坛：“秘密投票和工会代表权”。

1962年3月1日第十五期会坛：“顺民者兴，逆民者亡”，“本邦十余宗工潮持久未决”“中委会议决设立福利部”，“筹募罢工基金获四万一千三百六十四元正”，及“绿园：工人文艺篇章”等。1962年7月1日第十九期会坛：“反对强横，捍卫民主”，报导“行动党压制民主实行独裁”（内有职工会工委会代表四十余工会对执政当局侵犯人民民主权利的專横行为，向本邦全体立法议员提呈备忘录各工团及民间团体等七十八个单位联合发表了，反对不民主的全民投票法案宣言’）及报导：“执政党对民间团体采取新攻势”，“工地及绿园：工人文艺创作篇章”等。

1962年3月出版了“泛星报”号外：“纪念国际妇女节特辑”。文章有黄催云：“我们的处境与任务”，方水双：“妇运的方向”，“星洲各工团”，“住联与乡联”纪念三八国际妇女节大会，各有四条提案及其他妇女问题等文章。

（四）抗议鲁孟巴被害和芳林补选风波及捍卫民主权力的斗争

1961年2月20日，泛星各业工联、巴士工联、黄梨工联总、全星建筑工联、书报印务业工联等卅二工团发表了联合声明，呼吁全星工友支持任何有关抗议刚果总理卢孟巴被害之大会，充分发扬了星洲工人阶级的国际主义精神。

声明说：“刚果人民敬爱的领袖，垂非人民反殖民主义的战士——鲁孟巴先生的遇害，已引起了全世界热爱自由、民主与和平的人士之公愤。”

“鲁孟巴先生之死，深刻地暴露了殖民主义的惨无人道；也说明了殖民主义已更加接近死亡，并不惜以一切殘暴行动为垂死的性命作最后挣扎。……我们坚信：鲁孟巴先生之死，不仅不会吓退垂非人民的反殖民运动，相反的，它将激起更大的反殖浪潮，並進一步教育了垂非人民以提防殖民主义所‘施予’的假‘独立’与‘自主’，以便为争取真正的独立、民主与和平而奋斗到底。”“……我们应本着一貫反殖主义的精神，为巩固本邦反殖主义力量而努力，以便以全民团结之力量去消灭殖民主义。”另者，各工团也动员了工人队伍，举行了和平合法的游行示威，以实际行动表示抗议！

1961年2月20日全星卅二工团也发表了联合声明，针对即将举行的芳林区补选，呼吁选民採取正确的态度和高度的警惕性来判断芳林区补选的政治意义，以便完成历史任务，奠下更巩固的反殖民主义的基础。

声明说：“……我们支持三位职工领袖（林清祥、方水双、兀哈尔）对芳林区补选局面的分析与看法，支持执政党。虽然执政党在执政期间是会有所犯下错误与缺点，我们相信在虚心与求同存异的协商精神下，是不难得到人民的谅解与予纠正的机会。”

声明说：“本邦执政党在錯综複雜环境中和极其有限的权力下执政，其所面对的困难是很多的。諸如：工运的统一工作及前政府所拘捕的反殖民主义人士的釋放問題等，仍然

因遭受‘公安委员会’的干涉而被阻。——如果没有用正确明智的政策与方法去领导群众，运用群众力量，而只是迁就，则不但难于逐一的克服这些困难，群众也势将自然产生不满情绪，甚至采取敌视的态度，这种不幸和更加困难的局面，结果使殖民者及其反动份子坐收渔利，造成人民的长远利益受损害。”

芳林区补选，是由于王永元被行动党开除党籍踢出局而后举行补选。卅二工团认为：这次错误的言论与行动导致劳民伤财的补选，表示十分惋惜。

1961年2月19日，王永元以芳林区支部十六条提案为政纲以无党派候选人参加补选并以极大多数票胜出。震撼了人民行动党，而李光耀集团在职工运动者及卅二工团的支持下依然败选而不知所措！

1961年5月1日全星近二万工友在惹兰勿杀足球场集会庆祝国际“五一”劳动节。大会主席陈德华致词说：“今天我们在这里开会的另一点意义，就是要来表达我们关于本邦时局问题的意见。我认为，右派反动份子和机会主义者，可能会利用因芳林补选的结果的刺激而轻举妄动，继续煽风放火，意图扩大和加深人民内部的分裂。这种可能的情况是不好的，危险的，我们要提高警惕性，我们要时刻强调这次左翼运动所表现的团结。”

“我认为，我们必须号召人民支持政府的‘四年经济发展计划’……更重要的是：我们对政府表示支持，是为了促进人民内部的大团结，增强人民的力量，以利面对人民共同的敌人，不懈开展反殖民主义斗争，争取结束殖民统治。因此，加强人民内部的团结，更深一层推进工运的统一，支持政府的四年计划，进一步发展反殖民主义，是今后工运的重要任务。”

李光耀也在大会发言：“最近芳林的补选，我们受到一个重要的教训。……为了大家的利益，须政府能实施工业化，这个基本条件，否则，几年以后，我们的社会一定改变得很厉害，对工人会不利，所以在需要时，我们一定弄清立场。请工友、农民、小贩等各阶级，说明关于谁要那一政党来领导新加坡人民的命运。……以前到现在有许多家伙，说要反殖民主义，例如王永元、马绍尔、林有福。行动党也如此说，但今日有转变！那些人认为要独立，行动党却认为这是幻想的口号。这是不实际与骗人的，如果可以实现，我们也不能走这条道路，因为这会带来灾难和分裂种族感情。……1959年后不同了，因为我须决定独立要走那一条路，是独立还是先合并。……谁是求同，求同则行动党要问求什么同，如一个国家没有包括行动党的立场的在内，则如何可以求同。……所以工会须负起这个责任，要不要实行支持行动党的政策。”

而林清祥则说：“这次芳林补选，王永元提出的口号比行动党提得更激烈，我们应该面对这个事实。”……“我们不要消沉，不以发现别人的错误抵消自己的错误。我自己曾犯错误，大家不应该。因此说这是左翼的失败。王永元的提案与口号皆比职工运动者更左，这说明芳林的选民更左，如何使他们了解现实与局面，这是我们的工作。”

林清祥的谈话中有句“不以发现别人的错误抵消自己的错误”，却没有说明什么是自己的错误。大概是“过左”吧！我却认为：与其说芳林区的选民更左，勿宁说我们已然落在群众后头更确切些。

不管王永元以他在市议会的声望的影响，和芳林支部十六条提案更激烈的关系而获得胜选。它的政治意义却是反映出星洲人民必须继续进行反殖民主义的斗争，争取实现完全内部自治独立的斗争，更何况当时有其他党派如人民党、工人党等都发表了同样的言论。而李光耀在国际“五一”劳动节大会上的演说已完全否定了走这条路，认为是幻想，是灾难和分裂种族感情的。是一条死路。

我们知道，行动党已经执政了近二年，有关工运的统一与团结，释放在内安法令下被扣留的政治拘留者及改善工人生活问题等等，在行动党政府不断弹唱都因受英殖民者、内安委员会的拮据和阻挠以及右派反动份子的破坏，而无法实现，以此搪塞，以期缓和人民的不满情绪，达到掩盖行动党政权背叛人民利益的勾当的真面目。芳林补选行动党候选人一败涂地后，却不正视纠正它的错误举措，反而要胁工人运动及工会和工人归顺与执行支持行动党既定的政策。因此，李光耀集团歇斯特里地、声嘶力竭地，胡说乱道各种已破产的言论，反而只图利用不法手段不顾后果地宣传，要挟星洲人民支持其无以名状的“合并计划”。他还更进一步提出在“求同存异”下求什么同，断然说只能在行动党现在的政策下(即合并独立)求同。已明显告诉我们：与行动党的反殖统战已亮起了红灯，只能听从它的指挥棒了！这也更显露了英殖民者、东姑和李光耀集团已经相互勾结在一起，(虽然他们之间存在矛盾)已准备全面向真正反殖的人民运动开火了！

我们不能只责难职工运动者及工会负责人犯错误，我们只能怪自己缺乏对统一战线的理论基础的认识，不懂得利用矛盾的运作和以团结斗争团结的策略使用，结成广泛的统战力量；在面对实际斗争时，放弃了主动权，又在确认统战对象时，又被其表面现象所蒙骗而失去了洞察力和警惕性。尤其在关注当时的大局的前提下，别无选择的确认锁定最有可能的单一统战对象而且给予全力支持是有极大危险的，这更成为它肆无忌惮地玩弄各种骯髒手段；迷惑我们，使到我们举棋不定陷入困境。正如林清祥所说的，我们不是神仙，能未卜先知！当它的真正面目尚未完全充分暴露时，发动人民群众的斗争，难免会犯错误，这是实际现场工作者引为戒的。是不能随意责怪个人，只能当为经验教训加以吸取。

1961年11月14日，星洲四十二工会发表了“星马合并与宪制进展意见书”的长篇声明，详细阐述了职工会对星马合并与宪制要求的立场与意见。这篇声明于11月15日在“星岛报”上全文刊登。

声明指出：“作为社会改革运动中重要一员的工人阶级，我们不但关心着自己的生活利益，而且更关心我国人民的整体利益。因此我们不能不对这个对我国的政治前途及与全体人民利益有极大影响的合并问题，发表我们的看法；特别是有人准备将合并问题，像睹注般或买卖式地处理，我们更是不能坐视而不加过问。事实上，任何关心国家前途及

人民利益的爱国人士，誰都不能在这个重要关头保持沉默的。基於此，我们準備在此向本邦执政党、各立法議員、各在野党及有关团体，提出我们对星馬合併的見解及本邦宪制進展的建议。我们相信，在民主制度下人民的意見是必須受重視的，尤其是代表本邦劳动人民的意見，是不应被忽略的。”

“我们认为，恢复国家的真正统一的任何一种形式的政治结合，首先必須是符合人民利益。星馬两地的真正合併，自然是意味着两地重归统一，这是完全合乎逻辑的。10月14日星洲各工团干事大会曾一致通过：‘要实现真正统一，星洲必需以和联合邦各州同等的地位加入联合邦，星洲人民享有和其他各州人民的同等的权益，和过同样的政治生活；而现在持有公民权的人士，应自动成为联合邦公民，星洲有权按照人口比例选派足夠的国会议员，出席国会。这是实现真正统一的基本条件。任何忽视这些基本条件的合併，是虛伪的，违反人民利益的‘假合併’，我们将坚决加以反对。”

这是各工团一致坚决表明的立場观点，是不能以任何買賣式討价还价的。否則就不是真正的合併重归统一。但是東姑政权和李光耀政权各怀鬼胎，各出招數，企图拿出卖人民利益做交易，而达到各自不可告人的私利和权欲！这是必須及时暴露他们的真面目，动员全民民主力量起來斗争，不能任其出卖人民利益而有所得逞！

声明又指出：“李光耀先生以本邦自治政府首長的身份，在人民毫不知觉的情况下，竟然和東姑举行了三个月的关于‘合併’问题的‘密商’，在他们发表公报后，人们约略地知道其中点滴的情况。九月十日副总理杜進才‘为了澄清局面’才简单地解釋新馬之间的安排，‘是合併進联合邦成为一州。’他又说‘我们安排等于合併，因为星洲人民将会选举代表直接進入联合邦国会，星洲和联合邦任何其他的州唯一不同点，是星洲政府保留更多权利’，‘所有星洲公民和联合邦公民，都将成为新联合邦的公民，因此，根本没有誰成为二等公民的问题。’至此，我们对李光耀花了三个多月所得的‘成绩’，才有点领略！”

声明又说：“就在这种混沌不清的局面下，本邦人民摸索了好些时候，直到10月16日，联合邦首相東姑·阿都拉曼才把整个真象比較坦率地告诉了我们，他在向联合邦国会提出‘大馬计划’动议时，曾经表示：‘我说过馬來西亞的所有各州享有同等的权利和地位，然而由于星加坡作为一个市州的特别地位，我认为新加坡最好是以‘夥伴’的基础來參加，’李总理和東姑间所谈商的‘合併’葫芦中的膏药原來是‘夥伴基础’的貨色而已，星洲不能和各州享有同等权利和地位，当然这种所谓‘合併’已经是四不像的怪物了。東姑还更加肯定表示：‘不过有一件确定的事，就是要避免大量的不愉快与麻煩事，我们是不能和新加坡完全合併的’……東姑說：‘工作团将检讨给予联合邦与星加坡分开的公民权，而具有单一国籍的问题。’……这种所谓‘夥伴’式的合併，星洲人民的民主权利完全丧尽了，也完全失去了作为一个国家中人民之尊嚴！……人民不接受这种‘假合併’的安排，正如不接受作为人家的奴婢一样，人民要求的是平等权利，互相尊重，共享繁荣，国家領土真正统一与独立的理想。”

声明指出：“当整个‘合并’问题的真相昭然若揭之时，李总理又变出另一套幻术。10月25日在记者招待会上，装出自信的陶陶然地说：‘合并谈判有相当进展，星洲65万公民之中，有32万人自动得到联合邦公民；通过申请手续，约有10万人可成为联合邦公民，按照国会分配，我们可得十八位代表。……’言犹在耳，过了二天又发表了一篇‘澄清声明’：他举出‘合并方式有A、B、C三种’而在(B)方式中，他不再提起有多少万星洲公民可以成为联合邦公民，而只能成为‘联邦国民’，42万公民，十八位国会代表统统不见了。他们只成为和联合邦境内无公民权的外籍民一样的所谓‘联邦国民’，自然没有权选举国会代表。……经过三个多月的‘密谈’的合并计划已经完全被暴露了，尽管李先生再施展什么手法或再来几次‘澄清声明’，但越变越澄清，人民对‘假合并’虚伪面目就越看越清楚了。”

为了“合并独立”问题，李光耀挖空心思，幻编了许多所谓“理由”，例如“合并独立，可以消灭殖民主义”、“如果拖延合并，星洲经济的扩展，就会受到限制，人民的生活就会越来越苦，入息和就业机会越来越少；不合并星洲就会像“水”般没有前途；工资、利润、生意就会减少；还有更为严重的总有一天，不可避免地其中一个地区就会通过武力来逼使另一个地区跟自己合并；也还有无中生有的民族问题：没有和联合邦合并而自己独立，这样将成为华人沙文主义的城市；就会像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一样引起种族主义战争；还有所谓‘教育与劳工’自主权；公民权与国民等等颠三倒四的花言巧语喷出。这些谰言各职工会声明详尽地作出了驳斥，不再引录。

声明还指出：“本邦四十三单位职工会，曾于今年6月9日发表的联合声明中说：‘今天，我们必须把反殖民主义的具体内容明确地提出，而我们认为基于目前的客观条件及人民的迫切需要，在1963年星英宪制谈判中，坚决要求废除内部治安委员会及任何类似机构，取消英国代表拥有干涉本邦内政的特权，争取实现真正的完全的内部自治，给本邦人民享有充分的自由和民主权力，这样我们才能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人民的愿望，而改善人民生活。’‘要求完全内部自治权力只是现阶段的中心任务，……只要殖民主义存在一天，反殖民运动是绝不会停止的。’”“在此，我们还必须郑重地指出：目前的执政党已经公开表示‘当前任务，已不是向英国斗争’的亲殖民主义立场，而且还提出‘假合并’主张，意图出卖本邦人民的利益，准备把国家前途导入危险境地，它已失去广大人民的信心，怨声载道到处皆是，无疑地它已不能承担人民的付托了，因此，我们认为目前应举行一次全民大选，让人民选出足以信任的政府，处理本邦前途的重大问题，唯有如此，才能消除目前不安与混乱的局面，人民的利益才能获得最有效的保障。”

1961年12月30日顾问林清祥在第十三期的“泛星报”发表了献词：“新的一年新的任务”。

文章提出：“1961年过去了。这是个怎样的年头呢？这是个斗争的年头。一个反对政治倒退，反对分裂工运，坚持把反殖事业进行到底，坚持实现工运统一，要求政治上有更大自由与民主，要求经济生活获得进一步改善的年头。”“……本邦人民的命运被当‘豕仔’送交给联合邦的反工人政权，工人的斗争果实是会受到摧残的。这便要求我们

以更大的努力与决心，在政治上去揭穿行动党式的‘假合并’”。 “反动派与殖民主义一向宣传着工运脱离政治的思想，一些工运的中途变節者，今天也大力地推销这种理论，这些人企图使工人运动脱离政治现实，成为一种单单为了加薪五分錢而展开的运动。他们也尽量渲染个人的智慧与才幹，希望工人放棄組織力量而把一切寄托予某些个人在議价桌上与仲裁庭上的智慧。工人运动的中途变節者与社会主义的叛徒们，在发现他们不能輕易地瓦解工人的政治思想後，竟卑鄙到耍起种族主义的火种來，他们在干着一种危險而绝望的勾当，企图使工人运动从基于共全经济利益基础而组成的阶级运动变成为种族性运动，在民族与非民族工运的反动口号下，这些人极力挑拨一个民族的工友与另一个民族的工人间牢不可破的团结。”

“在新的一年里，我们必须继续在政治与思想上去揭穿这一切違背工人运动利益的言行。我们應該对那些已经走錯了路而準備回头的朋友表示欢迎。对于那些已经对我们的运动完全失去了信心而准备拋棄我们的人，让我们祝贺他们前程好，並说声：‘再見！’如果这些人不但拋棄我们，且企图阻止工人运动的向前发展，我只好说声：‘对不起！’並給予必要的反击。” “我们中很多人对旧势力在自己思想上的浸透之嚴重性，往往无动于衷，在‘不要得罪对方’、‘老朋友、亲人、老同事’、‘难开口’等名堂下，对朋友的错误也不敢加以批评；大家互相掩蓋彼此的缺点，而旧势力就更加得势了。如果我们战胜旧势力，我们是应该具有坚决与持久的斗争精神，因为旧势力有它一套使新势力妥協的办法。” “.....我们应更緊密地团结起來，在思想上坚决向旧势力展开批判，在政治上团结全民继续为反对假合并，反对工运分裂，要求更大自由与民主，要求取得更美好的生活而奋斗！”。

这是一篇重要声明，也是一篇強有力的战斗檄文。提出了目标明确的政治斗争任务。号召全星人民团结一致动员一切力量，捍卫民主权力，反对‘假合并’，争取完全的内部自治、独立的斗争，把反殖民主义的斗争進行到底！也从此，开展了更为错综复杂的，激烈的，尖銳的反殖斗争，掀开了新历史篇章。

（五） 有关工人运动的统一与团结及职工总会的组织

工人运动的统一与团结，是工运发展的需要，也是经济与政治斗争的需要。在英殖民统治的现实环境与实践中，大家都已明确了必須促使各工团及工人大众认识到在统一意志与共同目标下，以强大的团结力量，發揮工人阶级的先锋作用，才能帶領人民大众起來反对英殖民统治，争取实现馬來垂(含星洲)的和平民主自由独立实现民族自决，也才能建設自己的国家。这是馬來垂(含星洲) 广大人民的願望，是符合广大人民的利益的！

舍此别无他路。自从有了工人运动的发生、发展，也就为此而奋斗不息！战前，约于1928年间，就有了地下工会组织，例如海港、星华建築等组织较嚴密的地下工会的出现，他们处于极端艰难的环境，展开教育、组织、动员各行业工友，進行改善工人生活和民主自由的斗争，發揮了工人的斗争，促進了工运的发展。一九四一年日本法西斯軍隊佔領前夕，星洲已有了一個拥有七十单位的地下“星洲各民族各业联合总会”的存在，潛

伏在地下领导推进各种抗日斗争。日本投降后于 1945 年 9 月 6 日，在建筑工会会所召开了全星各工团代表联系会议，一致通过公开组织“星洲各民族各业联合总会”并于 10 月 25 日于南天酒楼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民主方式选出了各部职员，便正式成立了。在这一时期，工运是基本上统一了。在总工会的统一意志与共同目标的领导下，各工团进行各种经济斗争及民主人权的诉求和抗议，并以实际行动击退英殖民者的各种迫害与镇压行动，使工人大众在经济与政治斗争中不断觉醒起来，不断地动摇和削弱英殖民者的统治根基，使之不得不进行“宪制改革”，“施行殖民地民主”等政治改良欺骗的手段，缓和人民大众的反抗斗争。例如当时的全马性各民族的“人民新宪草”运动的全民斗争，也是个突出的例子。

1948 年 6 月英殖民者悍然颁布“紧急法令”，全面镇压了工人与人民运动，逮捕了无以计数的工人运动者与爱国民主人士，大量驱逐被捕人士出境，全马陷入了白色恐怖，工运遂处于低潮状态。

1951 年林有福响应英殖民者的呼吁，进行所谓“合法工运”的民主点粹，组织了“职工总会”。参加者也仅有十八个单位，那些较有代表性的具规模的工会都不参加；参加的是说英语的白领阶层及印籍工人而已。当时要筹组新工会难之又难，唯一办法必须通过“职总”申请才能拿到注册证。却必须参加“职总”并由它委派秘书负责作为先决条件。当时的“职总”仅是作为调解人的角色而已，更何况是政府所扶持的，很多工会都不想加入。

“各业工厂商店职工联合会”于 1954 年宣告成立，是一个真正代表工人利益的组织，无形中成为了工运领导中心，连同“九五工团”成为了统一工运的基石，形成了工运发展的强大势力；成了与林有福的“职总”分庭抗礼的进步工运中心，在共同的意志下，发出一致的意见，统一步伐反对英殖民统治，争取自治独立的斗争。这时期“各业”的林清祥等人起了重要作用，发挥了工运领导者的杰出才干。我曾于 1955 年间在“各业”庆祝一周年纪念前油印的会务报告的小册子（记忆中“各业”仅有的一次）里见过有一篇关于统战问题的文章，至于内容，由于时日已久，印象模糊无法记起，可能比统一工运更广泛的统战问题。经已无法见到原件，不能确定。这里仅是说当时“各业”已有人提出了工运团结统一问题。

由于“职总”是个空壳的莫名其妙的组织，鉴于处境不妙，有被工人大众摈弃的厄运。1956 年以后，曾数次呼吁统一工运，却是虚心假意，不进行民主改革，更何况曾于 1955 年巴士工潮时充当了破坏罢工工友斗争的工具，已是臭名昭著，也就无法取得共识达成统一团结。

“九一八”事件后“各业”被封闭，工运失去了领导中心。但是，各进步工会依然团结，互为联系，在建筑工会的推动和“各业”临工委的努力下，解决了“各业”会员的安置问题后，各工团成立了秘书处；这时“泛星”工会改组成功，以崭新的姿态出现了。从 1957 年至 1959 年间各进步工团都联合起来经过协商取得一致意见后，发表了许

多联合声明，表达了对劳资问题、宪制问题等等关系工运发展的意见。这时期，各工团都着重鞏固内部组织，关注加速发展工会的文教和文娱活动，提高工人的觉悟。争取更多更广泛的工人群众参加工会，成为有组织有领导的工会集体力量。这是统一工运不可或缺的。1959年6月在新宪制下实行民选，行动党取得了胜利而执政。当时有许多人以为统一工运可以完全实现了。行动党政府提出新的“职工会法令”，使“职总”成为法定机构；所有其他工会归并为十九行业工会；实施工业关系法令及取缔黄色工会等等。大家思考到的都是对工运有利的一方面。

但我们也知道处于一个比半殖民地还不如的“须固”内部自治，要完成统一工运不是轻而易举的，为了弄清工运的各种问题，作好思想准备，面对未来。因此，建筑工会在“1959年10月3日庆祝三周年纪念暨鲁班先师诞辰”特辑里发表了集众意见由小尔写的一篇题为“当前局势和工运的发展”。提出数点意见：关心与瞭解当前的政治局势，是任何职工运动者的职责，因为工运是不能避开或超越政治的。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促使朝向正确的方向发展。我们不要在取得了一个阶段的胜利后，思想就僵化，忘记了一切，把工作松懈下来，满足于现状，这是极端危险的！是不利于工运的发展、团结与统一的。

过去反动与黄色工会人员高喊工运与政治无关，但事实上正是利用工会以遂其政治野心，把工会变成政党的附属品和作为自己的政治资本。我们知道，仅仅限于经济斗争，不进行社会改革，就无法保障斗争的成果，而易于陷入工联主义的泥坑中。而当政者则必须施行广泛的民主政策，工运才能正常发展。

关于工运的独立性与自主性，是工会一贯来坚守的原则。工运不能随意为政党所驱使与控制；也不能毫无批判地以个人的政治见解追随政党的路线，否则，就会陷入政客们的政治野心的迷途中。任何政党只要其纲领及措施符合广大人民的利益与工人阶级的愿望，则工运将给予全力支持。工运在任何情况下都会主动地公开表达自己的意见与要求。

关于职工运动的团结与统一，当时有人提出由政府立法强制与人为强求迅速达致工运统一，是不切实际的主观片面性的想法。当时，据政府统计注册的工会有226间会员十三万多名（包括黄色工会与同性性质工会）；工人就业有四十五万名，有组织的工人占总人数的35%，还有65%，（即一半以上）的工人还没有组织起来。这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大问题。35%有组织的工人分属于226间工会，造成工会组织与工人力量的分散；同行业里又存有二个以上的工会；也存在对抗性的黄色工会，常被利用来破坏工人改善生活待遇的斗争。为了更好地维护各行业工人的生活利益，解决同行业小工会的经济薄弱与人力不足，同行业工会应从速统一组织起来，成为以企业性工会为基础而组成联合的总会。

凡是真正谋求工运大统一的工会负责人是必须作更全面与深入的瞭解工运发展与工团的实际情况以及工人的觉悟程度，以集众之智慧，研讨各工会提出的各种意见。团结一切持不同见解的工会（黄色工会除外）。壮大工会的力量，形成工运统一的领导中心。

当时建筑工会反对由政府包办，迅速以法律规定及行政命令硬性归併为十九行业工会的作法，认为不切实际，不瞭解各工会各自存在的现实问题，更不符合结社自由的原则；也是預防还在英殖民者控制下，一旦反目相向摧残工运与工会（例如“各业”当时面临困境的发生）。这不仅是建筑工会还有其他工会也一样有意见。

从各工团表达了对工运统一的方法与步骤的意见后，引起了争论，经过协商后，终于取得一致意见；以十九行业单位为基础而统一工运的原则，保留原有工会，只以“联总”为组织形式组成统一机构领导属下各工会的运作，这是最实际也符合各工团的意见。

1960年5月4日，当时的“职总”则成立了九人秘书处。秘书长：甘达三美，行政：巴尼，政治与情报：兀哈尔，教育：林清祥，工业纠纷：方水双，调查研究：蒂凡那，组织：詹密星，社会福利：多明尼，财政：欧傑吉。

各工团迅速行动起来，根据统一工运的原则筹组了四间“联总”，即“陆路运输工友联合会”，“全国土木建造工程业联合总会”，“工厂及工场僱员联合总会”，易名的“全星水路运输工友联合会”。1960年1月以后各联总皆获准注册，并申请加入改组后的职工总会。

以“全国土木建造工程业联合总会”为例，五工团各派三名代表于10月15日组成十五人筹备委员会积极开展工作，以“陆路运输工友联合总会”获准注册的章程为蓝本，经过必要的增删后，於1960年2月12日获得注册。筹委会于2月19日召开了注册后第一次会议。並决定于5月29日召开第一届会员代表大会，商讨会务发展方针及选举第一届职员，同时决定于6月26日假羽球馆举行盛大的庆祝“联总”的成立大会。4月25日正式申请加入改组后的职总，并派了七位代表出席了4月27日召开的职总常年代表大会。筹委会本决定出版“全国土木建造工程业联合总会成立大会”特刊，旋由于“联总”于5月23日突遭当局撤消注册；由于筹备工作已达成阶段无法放棄。於是五工团负责人乃决定以“五工团庆祝周年暨鲁班先师誕辰纪念”为名继续出版特刊，而大会改为九月四日在原地点举行。庆祝大会又被迫不得不放棄举行。而后各工团各自举行，特刊继续出版。四个“联总”工会，只有“全国土木建造工程业联合总会”出版了一本特刊。内有五工团第五届职员表，五工团的会务工作报告及其他文章。虽然刊名已改了，内容却依旧，是工运史上没有的，頗可宝贵！

5月23日劳工律政部長的來信这样说：“在新职工会法令未生效前，不准有任何新职工会注册，或修改名称和章程。”这是不成理由的理由；后据部長面告职总秘书团谓乃“存有若干安全的原因”。6月2日职总召开了全星各工团代表大会，商讨对策，6月5日职总秘书处向报界发表声明，对当局提出强烈抗议並表明立场：一、全面反对政府吊銷三个“联总”和一个工会的行动；二、必须依据新职工会法令和职总的章程，继续实行统一工运的步骤；三、全面反对内部安全委员会对职工会合法成長的任何干預，职工运动已经充份的成熟和发展，是以有责任地给予新加坡工人和人民履行它的任务，因此，我们有责任抗拒干涉职工运动合法成長和独立的任何外來势力！

当时几乎所有进步工团，几间强大的工会，例如三间“联总”及易名的水路运输总会、泛星、商行、軍港、海港等都参加了，并拥有了一批站稳工人立场，始终与工人阶级站在一起的职工领袖，负起领导新的职工总会工作，并获得全星工人的支持。但在秘书长甘达三美的一纸公函，而没有任何合法手续，就被“合法”宣布解散了。所有不被行动党控制的职工会和一些不愿沦为行动党工具的工人领袖，在商行雇员联合会的倡议下，举行一个八十二工团代表大会，会议上宣布一致通过“工运宣言”并产生了一个新的“职工会联合总会”筹备委员会，负责执行今后统一工运的艰巨任务。这就是“职工会联合总会”（SATU）的诞生。

1961年8月22日公开发表了八十二工团宣言。表明当职工运动面对着受政府控制的威胁，以及面对着政府的御用傀儡正在进行分裂工运活动的危险的时候，我们必须再一次重申职工运动的独立性。并反对历届政府限制工会职权和削弱工运影响的各种不良意图。政客们企图把他们的个人斗争带进工运舞台的时候，所有工人和职工会便有责任制止这些无耻之徒，从而维护工会的权威。

建立工业和平和经济繁荣，便需要有一个民主的职工运动。工运领导人首先必须对工人效忠而不是对政治领袖效忠。任何违背这项原则的工运领导人就是工人阶级的叛徒。我们要谴责甘达三美先生及其集团邀请劳工律政部长解散新加坡职工总会的不法行为。甘达三美先生及其集团容许将他们作为职工运动者的地位被利用来进行党内的斗争。新加坡工人应该注意他们这种罪无可恕的行径。

如果新加坡工人要保障和促进他们的利益，那么，就必须要有个统一，有纪律及民主职工运动。基于这项理由，我们便只好摒弃那些容许工运成为一个已经失去人民信任的政府的工具的人，并离弃任何由政府所创设的虚假的工运中心。

我们知道，李光耀口口声声表示是为工人争取利益的，行动党是亲工人的政府。他曾担任多间工会的法律顾问，替工人解决劳资纠纷事件，都引以为荣，却不能不引起我们的置疑，哪又为什么连这件对工人有利的工运统一的初起步，还没有进行任何活动，在极短时间内，竟然引起“内安会”光火而加以吊销注册，而李光耀又为什么不吭声，难道我们不觉得蹊跷吗？我们又一次陷入“从大局出发”团结支持一个单一统战对象的考虑，为李光耀政权开脱不真正反殖民主义而要弄的手段。职工运动者忠诚老实地一贯原则性地支持执政党，极尽所能的维护工业安宁，稳定局面，关照执政党的处境，以期团结一致，争取民主权利，期待结束殖民统治。这种诚意，行动党并不买账，反被咬一口妨害治安和执政的绊脚石！由于我们没有看到它已经掉转头对付左翼职工运动，蓄谋把工运变为它的御用工具，利用甘达三美、蒂凡那等工贼分裂工运统一，另立“职工总会”（NTUC）四处招兵买马，拉拢工团参加“职总”，甚至到国际上策动其他国家工会的支持，造势成为名誉上受到全面支持的局面。当局对于要求“联总”再给予注册已全然不管了。工运统一又遭到了破坏性的挫折！

职工运动者忠誠老实地坚持一貫原則性地支持执政党，行动党並不買賬，反被咬一口妨害治安和执政的绑脚石！由于我们没有看到它已经掉转头对付与消灭左翼职工运动，蓄謀把工运变为它的御用工具，它们则称之为“共生关系”，利用甘达三美、蒂凡那等工賊全面控制工运，另立“职工总会”（NTUC）四处招兵買馬，拉攏工团參加“职总”。当局对于要求“联总”再给予註冊已全然不管了。工运统一又遭到了破坏性的挫折！

当“联总”被取消註冊，解散新职总后，工賊甘达三美、蒂凡那、何思明等公然搞分裂工人运动，四处出动拉攏和扶持了一些原已不復存在的工会，收買分化一些立场摇摆不定的份子，急促间成立了一个所谓拥有三十七工会的全国职工总会（NTUC）。

另一方面，行动党的御用工賊借着当权者的资助在国际上進行活动，第一次和李光耀等一伙人以官方代表訪問了埃及的开罗，南斯拉夫及印度等国；第二次和劳工部長等一伙人以半官方代表出席国际劳工机构在日内瓦举行的第四十六次会议；通过这些国际活动，他们力图游说争取外国人的支持。幻图拉攏一批对星洲工运情况不瞭解的外国人士的支持，以壮其声势。乘着全国职总的一次常年会员大会的举行，花了大笔公款邀请外国人士參加这次大会，借这个机会通过报章和电台大事渲染，而蒂凡那借机吹嘘垂非各国的工运人士是站在他们一边的。造势成为名誉上受到全面的支持。他異想天开以这种蒙骗外国工运人士的骯髒手段，來打击左翼职工运动，是徒劳的！新生的职工总会早已在醞酿中而宣告成立了！

星洲职工运动终于進入了新的里程碑，这个新的职工会联合会（SATU）是以民主方式选出的具有代表性、战斗性的合法的总工会，是得到全星工人及各工会的强力支持和广泛参加的捍卫和改善工人利益的战斗堡壘！总工会要负起工人付托的任务，也要面臨严峻的考验；它不仅要击退來自行动党御用工运者的分裂和破坏工作，也要预防行动党当权者和内部安全委员会以毒辣手段的对付，更甚的是武力镇压，我们是不能掉以轻心的！SATU 与 NTUC 在当时已形成了强烈的鮮明对照！

1961 年以后，馬來垂联合邦、汶萊、砂勝越、北婆罗洲等地掀起了反殖斗争的浪潮；星洲的反殖、反假合併、反大馬計劃，争取完全内部自治独立的群众运动此起彼伏不断高漲，英殖民者的衣钵传人的政权处于風雨飄搖中，危在旦夕，英殖民者的统治根基溃敗；而李光耀政权也差点阴沟里覆没，这时英、馬、星三方的内部治安委员会迅速采取了所谓保安行动，即“冷藏行动”，進行全面的大逮捕行动，以武力镇压，扫蕩群众运动，又一次阻塞了宪制的合法斗争的门径。这就是遐迩皆知的史称的 1963 年 2 月 2 日大逮捕事件。这个行动也延续不停的逮捕和封闭了七间强有力的职工会及五间乡村、小販团体。这也是李光耀真实地插入了林有福的血手套里。以达到他处心积虑全面扑灭人民运动和工人运动的罪恶行径。

附：七间被封职工会及五间乡村、小販团体名单：

泛星各业职工联合会、全星建筑工友联合会、商行雇员联合会、全国海员工会、巴士车工友联合会、磚业工友联合会、机械雇员联合会。

乡村人民联合会、乡村住民联合会、小販总会、小商公会、小販联誼会。

从此，星洲职工运动、民主政治运动面临着不断的灾难性的厄运。所有职工运动领袖与各左翼职工会负责人及“社陣”民主政治工作者，都被搜捕入狱了，局面陷入了混乱，重整工作处于极端艰难的境地！而行动党御用的 NTUC 乘机大事活动，乘火打劫，以达到它的可耻目的！

1963 年 6 月馬來亞社会主义阵线机关报“火焰报”上发表了陳兵题为“到底誰是真正代表工人阶级利益？”，副题“是左派职工运动？是机会主义者？”的文章。文章較全面地分析了左翼职工运动与 NTUC 的本质区别；阐述左翼职工运动的奋斗目标，揭露 NTUC 对工人阶级利益及民族解放的危害性。

文章指出：1961 年 7 月职工运动分裂了，有人说是坏事，有人说是好事。……坏事是工运分裂了，一部分工人被误导了，工运的发展增加了阻力；好事是左翼工运和机会主义者，改良主义者分清楚了。……他们公然申明要把工运分裂並和行动党勾结，由行动党强行把前“职总”解散。既然分裂是这些人造成的，责任就应由这些人负责。

左翼职工运动一贯來就不曾掩饰自己的奋斗目标，也一贯站稳工人阶级立場，不曾被英殖民者收買或向它投降，成为殖民主义的俘虜；也不曾被资产阶级收買或向它投降，成为资产阶级的俘虜。……左翼职工运动要在長期的奋斗中，建立一个没有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社会主义社会。当英殖民主义者侵略並统治馬来亞（含星洲）时，左翼职工运动必然要高举反殖斗争的大旗，争取民族解放，使人民获得独立、自由，民主、和平，结束英殖民统治。……这就很清楚的表明左翼工会，绝不害怕被人乱骂参与政治斗争，必然被看成为是自己应担当的历史任务。也必然和各种民主运动結合起來，共同斗争，联合和团结各阶层人民和各民族，组成广泛的反殖爱国统一战线，并且成为斗争的主力军和领导者。正如这次反殖反大馬的运动，左翼职工运动表现了无与伦比的战斗力和雷霆万钧的意志，组成了广泛的人民的反殖爱国统一战线，发挥了斗争威力，使反动派感到心惊胆寒。事实证明：当左翼职工运动强大时，这个战线就坚持、巩固、发展起來，在斗争中发挥威力；在组织上，一贯來坚决主張团结工人阶级，反对分裂，统一职工运动，言行一致，遵循贯彻这一主張。在斗争上，应该依靠工人力量和斗争，绝不依靠所谓个人智慧，明智和机巧灵活，也绝不投机取巧和走机会主义路线。在行动上，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绝不在自己的綱领上写上美丽动听的词藻，而在行动上干違反工人阶级立場和利益的勾当，欺骗工人阶级；在思想上，始终以工人阶级的先进的革命思想作为指导方针，1962 年 5 月 1 日国际劳动节，为了展示力量，让反动派看着工人的威力，组织了六、七万工人的空前浩大而又偉大的庆祝大会，就足以说明一切了。正由于这样，一路來就特别受到英殖民当局和反动派的仇視，尔后受到非共民主社会主义的行动党当政者的仇視；他们串通勾结时隐时现地采取压制，也时时刻刻找机会，找藉口以高压行动摧殘，企图消灭这股不可抗拒的力量。左翼职工运动的发展道路，也就是在艰苦性和長期性的迂迴曲折的道路上发展。

这是左翼职工运动和人民利益結合起來的群众运动斗争的实质，也是主流社会历史发展的正义性和进步性斗争的延续发展，是不容忽略的！

全国职总 (NTUC) 集团，是以蒂凡那、何思明为首的机会主义集团，是行动党在工运中的御用工具。他们没有长期奋斗目标，没有一定的斗争纲领，仅有的目标是争取增加工人工资几角而已，进行改良欺骗！……过去这些人也领导反殖斗争，喊革命口号，大嚷大叫为工人阶级卖命，可是殖民主义还没有消灭，工人还没有翻身，却摇身一变，挂起非共民主社会主义的招牌，嘴里嚷着民主或民族职工运动，却大力支持新殖民主义的“马来西亚”支持英殖民者，联合邦反动派和行动党勾结逮捕职工会负责人与干部等……在政治上要在殖民地这副腐朽的国家机器换上非共民主社会主义。在组织上分裂工人团结，成为执政党削弱工人力量的工具；在思想上，散布资产阶级意识，利用改良手段欺骗工人，麻痹工人思想，使工人放弃斗争，解除自己的思想武装。

他们无视工人阶级的贫困和穷苦的生活，无视资本家残酷压迫与剥削工人的事实，反而指责工会“把职工运动当作有组织的无休止的贪婪，而不顾整个社会的利益，”（蒂凡那语）这简直是白日说梦话。

事实明显展示了工人集会、结社、言论和出版自由的基本权力已被剥夺，职工会联合总会的注册没有下落，职工会负责人大批被逮捕，被诬蔑，被控告，职工会内部事务经常被横加干涉，罢工受到种种为难压制和破坏，警察无理逮捕工人，反而保护资本家破坏工人和平纠察。行动党御用工运者也配合起来大行邪道。依照他们的话说：就是职工运动必须由非共社会主义者控制。说得透徹一点：就是要削弱和消灭左翼职工运动，全面控制工运，他们就可以心安理得为英殖民者和资产阶级效劳了！

这就是行动党政权的御用工具蒂凡那、何思明等所把持的职工总会 (NTUC) 的本來面目，而助纣为虐的蒂凡那当上了总统，尝到总统的滋味却落得悲哀的下场。至于 NTUC 的秘书长及其职员属下各工会的人员大都是行动党人及部长议员们掌控住；同时还成立“平价合作社”，保险公司，入侵各类中小企业的生意经营；已发展到各行各业无所不包的局面；操纵垄断市场，蜕变为庞大的财团，已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各工团代表的总工会了。它还抬出“劳资政”共生关系的招牌，究其实仅是“资、政”而已！在这种压迫性的威胁下，工人担心生活与工作无保障，只能静默和无声抗议而已！

我们知道，自从 56 年“9·18”和 57 年“8·22”事件后，虽然工运领袖被捕及“各业工联”被封禁，有组织性的工人人数却更增加了，组织上，领导上和斗争经验也丰富了；在形势和左派工运的影响下，受英语教育阶层的公务员、书记、行政人员、店员、商行雇员及工人都先后觉醒，参加到工人斗争的队伍中；乡村的农民和村民皆动员起来，形成了工农的一股强大力量，并和其他各方面运动联合起来，在“社会主义阵线”及工会的领导下，在反殖反大馬的斗争过程中，团结一致地展现了自己的力量，重创了英殖民者及反动派的气焰！在这一阶段的历史时期，李光耀集团自导自演的各种无奇不有的说词和自相矛盾的行径的反面教材，是极好的，极妙的为星洲人民及工人们公演了一出出邪剧，也使人们上了一课课不可多得的教育课！虽然后来“合并”了，却不到二年，李光耀集团就被東姑集团踢了出来。由于李光耀集团的强烈的自私的政治野心，和他们之间的利益矛盾，東姑领受不了而光火；本是“独立就是死路”却骤然变为“现实”，这对李光耀

是个极大的諷刺，他的言行破产了！不得不落泪了！尽管后来有色盲者，称之为所谓开国元勋或是其他什么东西也好，实质上依然是英殖民者掌控并在其扶持下而生存。有人称为假独立，总之是不能改变那时期的历史事实！也不能腰斩掉星洲“独立”之前的历史发展，所以有人曾指为是怪胎，而且还是莫名其妙的怪胎！它有什么忍耐、高超智慧，不费吹灰之力临盆生出了星洲“独立”呢！这是星洲人民不可思议的！按照他的说法是星洲“独立”既是一条灾难深重的死路！走不得！！那又为什么要盲干下去，听其言观其行，他说过要保护英国人的利益尤其是聳立着象征殖民地的莱佛士塑相绝不能被拉倒！绝不允许星洲人民作乱的举动的发生。星洲人民的斗争历史不是无端端从 1965 年以后才有的。之前，馬來亞(含星洲)人民的反殖，争取独立统一的馬來亞民主国家的斗争，及后星洲人民争取完全自治独立的斗争已历时百余年了。馬來亞(含星洲)人民的极艰苦、長期曲折的反帝、反殖的英勇的斗争历史事实，却被束諸高阁，不宜让人知曉，有損于它的所谓“反殖面目”！当然啦，更忌諱于英殖民者、東姑的慷慨奉送而不能自圆其说。

1963 年 3 月 18 日陳兵在火焰报上写道：“历史事实不断证明，当人民群众的斗争运动达到足以动摇反动派的统治根基的时候，一切反动派就会抛弃了它的伪民主(法西斯及軍国主义者則連伪民主都没有)，而以高压手段(包括暴力)來摧毁一切要求自由，要求民主，要求独立的民主力量，这不管在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及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都经常出现这一事实。星洲行动党政权，联合邦反动政府和英殖民地当局相互勾结而進行的“冷藏行动”的“二二事件”也正是这一事实的说明！虽然手无寸铁的左翼工运与工会在力量悬殊下被扑灭了，当劳动人民再也不能忍受压迫与剝削的深重灾难下，火种自然又会燃烧起来！

星洲的李光耀政权是在美英帝国主义卵孵下而出现的，是确实的怪胎！我们不能忘记星马本是一家人，是唇齿相依，鼻息相通的一个马来亞国家！不管怎样艰苦困难，须经过長期的斗争过程，工人大众必然会奋起促使星马复归真正的统一！

后语

时代是一面镜子，它映照出每个时代连续发展起来的不同特征和不同的发展内涵。不管怎样，每个时代都朝前发展，不断改革变化走向进步；只要压迫、剝削不根除，人权没保障，社会现实没有真正改型，人民的抗争就不会停止；如今世界已进入了电子时代，资讯科技飞快发展，信息快速传递，任谁也无法阻挡；改革、开放、营造新社会的浪潮必将更迅猛！这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不管是奴隶的、封建的、资本的、殖民地的各种形态的社会，都具有不同程度的压迫和剝削，剝夺人权，奴役人民，欺詐豪夺的共同属性，因为生产资料，资本财富等都集中在当政者及财团手上，形成官商合一，社会贫富两极化，这就常常引起战争，掠夺殖民地，侵犯干涉国家主权，倾軋、侵略等等人为的灾难，依然在不断发生！

马来亞(含星洲)从殖民地、半殖民地到独立；星洲从海峡直辖殖民地，内部自治到星马合併，又到星马分家各自独立所加诸人民身上的种种灾祸犹未已！可以肯定，只要人民经

过不懈的努力和各种抗争，就会不断醒悟起来，凝集各种力量，汇合成强大的推动力，把变革社会的历史巨轮推向前进。我们知道，当权者的倒行逆施是不得民心，贪腐不时暴现，不得不在变换各种手法，耍弄各种哗众取宠的戏法宣传，来修补社会的烂疮疤，掩盖豪取巧夺的阴魂，以消除人民的不满情绪，我们是不应视若无睹，也不能听信美丽的谎言，星洲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是不会受愚弄的。必须行动起来，制止横蛮专制，推进民主运动，社会变革才能向好的路子前进。

人民是爱好和平不要战争的，不要压迫和剥削，要民主和平等安定的生活。当今世界格局早已起了变化，美国主宰世界，任意发动侵略战争，横加干涉各国主权，围堵、制裁、插手国与国之间的纷争等已不能遂其所愿了。虽然目前世界各地依然动乱不安峰起，至于掌权者自己设定的民选制度，都要耍弄各种手段作弊，以把持政权，把政治当为私有权力，加上当政者的各种横蛮行径措施，怎能不迫使人民行动起来抗争呢？更何况当今是电子信息等高科技时代，已由不得他们随心所欲，胡作妄为了；俗语说：自作孽不可活！

当今世界各地又出现了罕有的自然灾害，危害人民的性命和生存，必须扼制贪婪危害自然界的不法行径，总之是消除天灾人祸！是值得再三深思！

世界必须要和谐稳定，造福人类生存发展。经济的发展，政治的变革，科技的发达，资讯的普及，人民的觉醒，已经在促进世界新民主运动的韧劲，使社会本质的基本条件加速具备，国家社会达到真正变革转型，朝向进步方向挺进，那才是人民的真正的愿望。

我们也不应忘记，崛起的新生力量是柔嫩和脆弱的，没有深厚的根基护卫，难于抵以禦强大的狂风暴雨的袭击和肆虐；没有经验，缺乏正确的实践理论指导，在国家民族解放事业的搏斗中遭遇到挫折失败，但却不是永远的失败，无需感到气馁；应该深信新生的力量是有生命力的，前仆后继，直至战胜腐朽的力量，推进社会变革继续前进。这是社会变革不可抗拒的历史发展规律。

我们必须清醒知道，只有世界各国人民自觉行动起来，摧毁那些贪婪的、腐化的政治权力机构，还政于民；由各国人民自己从各自的国情采取正确的方法解决各自存在的问题，推行真正的民主选举组成人民政权，消灭压迫、剥削的社会根源；防止自然界的灾害；广泛开展新民主政治，以期达到世界大同。

2013年5月14日再改
2013年5月28日再次改正本
2013年11月再次改打后修正本
2014年1月再次改打后修正本

写点林清祥 杨小黑

林清祥是一名真正的职工运动者，是工人阶级和人民利益的捍卫者，是工人先锋战士，也是一位人民利益的捍卫者；是五十年代以后最受拥护和爱戴的群众领袖，是家喻户晓的具有高尚品格和视野开阔的政治家。

1950 年当他在华中唸书时，由于反对英殖民当局的不合理教育政策，强要实行初中三年级会考而罢课抗议，遂遭到逮捕，监禁了一年半。后投身职工运动。当我写星洲工人运动和反殖斗争时期的历史行程，必然提到林清祥而缅怀起他来，感触良深！

1954 年“各业工厂商店职工联会”成立时，他和楊高錦、林振国、陈国伟及一批工会干部齐心合力组织、领导、推动与发展了工会会务，全全力争取改善了工人的工作条件及生活待遇，促成了一个庞大的坚强的拥有数万名会员的工会组织；同时关注了星洲宪制斗争的局势，开展了群众运动及表达了人民群众的诉求，形成了反殖民主义统治斗争的中坚力量。由于斗争与发展的迅速，“各业”在林清祥的领导下，团结了各工团，使各工团在处理劳资纠纷及罢工斗争中相互支援，发挥了团结斗争的力量，“各业”无形中成了工运的领导中心，工人的战斗堡垒！这是当时环境下林清祥出色的特出表现！

1955 年林德宪制选举时，林清祥在武吉知马区中选为行动党的立法议员，还是星英宪制第一次谈判的代表团团员之一。他赞同马绍尔要求完全内部自治，并要组织统阵作为马绍尔的后盾，同时主张实行多语言政策，说明他是完全站在人民一边的。

1955 年“五一二”福利站工人罢工事件爆发时，他是重要的斡旋人员，他顾全大局，捍卫工人权益设法平息纠纷，促解决工潮；其时英殖民当局及马绍尔曾指责工潮发展起来的严重局面，是为少数共产党人所煽动的，林清祥据理批驳马绍尔不清楚认识工人的悲惨处境，并公正地出而处理工友的合理要求而屈服于英殖民者，重复英殖民者的谰言，藉口迫害工人。林清祥理直气壮地捍卫了工人利益，终于取得了胜利。

林清祥向来所依据的是和平合法的宪制斗争的途径，而英殖民当局并不遵循所制定的宪制方式，让人民以民主方式争取自治独立，要求结束殖民主义统治的愿望，反而被认为是损害英殖民当局的既得利益，是他们的眼中钉、肉中刺，非拔除掉不可！因此，林清祥及“各业工联”就被锁定为必须消灭掉的对象。1956 年 9 月 18 日事件发生后林清祥就被逮捕，“各业工联”被吊销注册。迨至 1959 年 5 月大选后才获释。一九六一年后他和行动党分道扬镳，另组社会主义阵线。于 1963 年 2 月 2 日第三次被逮捕入狱。林清祥面临了惨酷的牢狱之灾！

林清祥第二次被逮捕时，他和李光耀的行动党同是立法议员。由于林清祥等八人被逮捕时是与行动党有关的工会负责人，李光耀为了所谓守信誉，也为了争取星洲人民在 1959 年大选时支持行动党，曾公开申言在选举胜利时，必须先行释放与行动党有关的八名被捕人士后才愿意上台执政。在这之前，李光耀已经

表明了与“親共份子”划清了界限，申言是“非共民主社会主义者”，更由于1957年8月行动党内发生了意见分歧，中委会选举时，李光耀集团的人马有些人落选了，李光耀集团公开申言不担任重要职位，迫使新中选者不得不亮相担任重要职位。1957年8月22日英殖民当局及林有福政权见机不妙展开扫荡行动，逮捕了新中委及各支部的负责人，为李光耀集团进行了清党。与此同时，据传有人频繁地进出监牢内，心里有数游说被捕的八名工会负责人，当行动党执政时，只能听命于执政党，不能有谄谀，亦不能越雷池半步，进行分化拉拢，各个击破。意图改变他们的政治观。结果只有林清祥不卖账！释放后被安个有名无实的财政部秘书的职位；静观林清祥的向背，随时可唸咒收抬。

1959年当他出狱后，曾先后到泛星、建筑、造船业、砖业、木器、火电锯等工会的欢迎会并发表了精彩的演说，说明了他依然关注职工运动；担任了泛星工联的顾问。由于行动党当权派抛出了不利于工人运动的团结与统一和反殖斗争的举措，暴露了当权者乖离了反殖路及工人运动方向的真面目，1961年林清祥及时发表了战斗宣言，他争取说服了被蒙蔽的工运人士和政治工作者，筹组了“社会主义阵线”并担任秘书长，团结了各工会及民主人士参加工作，好多行动党的议员也倒向“社阵”；开展了反大马及“假合併”的群众运动，争取真正的星馬复归统一。形成了广泛的群众运动，所有这一切几乎要埋葬了行动党政权。

由于这样，1963年2月2日英拉李泡制的大规模的逮捕行动，企图一举消灭左翼运动、工人运动，挽救垂死的行动党政权，进行了名也曰“冷藏行动”的杀手锏，林清祥等人又被捕下狱。这次不仅是英殖民当局，还加上了拉李要把林清祥从政治上消灭掉，尤其是李光耀集团做得更绝！由于这样，政治部特务人员就可用无所不用其极的手段对付林清祥，使他的身心受到惨无人道的摧毁，精神受到严重的创伤，出现行为乖异，使他成了人生悲剧的对象。

我们是不是应该深沉的反思，在星洲的牢狱内，“政治谋杀”的例子不是鲜闻的，以前的有华中校长、民主人士薛永黍，群众领袖林垂亮，纺织工联总务罗华林，后来有曾福华等人。而李光耀政权是害怕承担这种“政治谋杀”的罪名，更何况林清祥是公开合法的名闻遐迩的群众领袖、工运人士及“社阵”领导人。

囿于信誉与政治利益攸关的顾虑，它只能利用慢性、渐进的手段对付，修理得使之无痛无伤地变成精神分裂的多重困扰，而无法控制摆脱而出现的思路混乱的行为乖异！

一个身心健康，精神正常的人，怎会在牢内无端端地出现不可理喻的生活行为异常，反复不同的各种反常行为表现，有人难于置信是一个领袖人物的所为的！据说当时同牢的个别难友不惯，而以言语反讽，但也有人多方照顾与规劝而没有悲剧性发生。

在公开合法活动的某些个别人士遭捕时，以为坐牢即可安心读书，修身养性，那是天真的，是不知牢狱为何物！除非和政治部合作，卖掉良知，或者同意公开上电视台表白和

发表声明，这是行动党政权对付政治拘留者惯用的得意的伎俩，软硬兼施迫你成我“里外不是人”而自生自灭！

曾与林清祥同牢房的人出狱后，写了回忆文章記述了林清祥在当时行为乖异的各种表现，作者还煞有其事地把林清祥被捕前夕在泛星工联中委会开会时所发生的的不尋常事件所見到“不良印象”，而联系到他在牢内的表现，一口咬定这不是一个群众领袖所应有的！在没有准确了解内情，仅凭“不良印象”而妄下定论，是轻率的不负责任的凭空臆测！牵强俯会的说词。

大家都可以看到，李光耀政权终于达到要在政治上毁掉林清祥的一生，使他不得不放弃政治活动并离开星洲而流亡到英倫。这也引起有人以言行的非议与冷漠对待，斥責、远离他。这只能令仇者快，親者痛而已！却正中李光耀的下怀；也达到了要他“里外不是人”的目的。不过，已有人对清祥在 1963 年前领导工人运动，反殖斗争给予肯定的赞赏：说他是人民战斗力量 and 精神的象征。

林清祥被放逐到英倫，经历了一段极艰苦困难的工作生活的煎熬后，又回到星洲和老友们相集在一起，依然态度和藹，热情关怀，例如陈德华患病住医院时，他几乎天天去探望，使大家都感到心情舒畅倍感还是老友一个！而过去曾提议创立“各业工联”尔后被捕驱逐出境的苏文生老友，也从中国来星探亲时也探望林清祥，相互叙旧，他们曾提到书写“各业”的创会史，只可惜林清祥过早逝世，无法看到书写“各业工会”的历史篇章而感遗憾！

有人对林清祥有这样的评价：“人民要拥戴维护人民利益的英雄；殖民者及其傀儡却要毁灭掉英雄。”我们又怎能轻易忘怀呢！随然他后期出现这种令人遗憾的作为，哪是谁造成的！尔后他所表现的诚直的老友情，难道不能釋怀谅解吗？

历史事实已展现，擎天柱已定，任谁也无法扳倒！

有诗为证：

锋芒初露在书斋，改地换天上讲台；

工农烽烟先士卒，民主独立将相才；

英雄横遭牢籠祸，豪傑厄运气長埋；

送君先去不需淚，功业英名自天來！

2012 年 7 月 7 日搞

2013 年 5 月 1 日修

炼狱 杨小黑

一、

不信鬼神不信邪心，亮心安，
自爱、锐眼、矢志，就奉献；
奔赴义举崭露修来的祺缘；
——云海翻腾飞焰，
——大地激情午剑！
星火燎原，轰然硝烟迷漫！

不期落入“皇家山”魔窟火焯！
饱嚼恐怖炼狱宴，
血腥魔手时时突击抡拳，
连连日夜“疲劳审问”熬煎，
身心之碎烈不知昼夜时段，
睁不开双眼昏倒迫问点！
冷水淋泼他躺在石敏地板，
身子软绵任由摆弄摧残！

二、

挟持入暗房料理惩办，
乍时吼声突大作，耳际贯穿，
遽然惊醒心乱转！
审问员分四组谗打手轮值转，
说谗说不灵，悻然退返！
调来醉鬼疯癫就遭难！

又来说谗不玩武力弹，
可恶媚眼奸笑声喧：
“聪明的不吃亏在眼前”，
“好汉交代，好处不完”，
“肌肤不痛，我可保证万全”；
“放你自由时，不会图报复变脸”！
叛徒`审问员怯生生试探！
走时丢下句：敬酒不吃，再等吃罚酒！

三、

斗室躺下，频频浮现幻影片，
挥不去“莱佛士”鬼押见！
密麻“飞机”轰炸，
针刺处处冒血斑，
满身肿红痛急遽，
血涂黑牆宣战！

“疲劳审问”不间断扮演，
旨令禁说“不知道”！持枪展现，
不然一枪毙命，按“逃跑办”！？
闭口不语却着了跆拳道领先，
再嚼了散打圈！
脚踢心胸，又击下不洵，
特大“雷吼”声轰贯成神经惊吓患！！
接踵脑轰心伤耳聋目眩！

四、

不料千岛流亡事弓穿，
冷眼面对追问怒火燔，
双手被扣任虎狼鎚遍再三！
黑夜漫漫更漏残，
突闻声声摧命的呼唤，
深深刺痛了我心田！！

从兹载上了“大骗子”誑冠！
思虑清析，把住良知关，
心安理得再玩它连番！！
斗室独囚心不寒，
报纸餐包吸入眼，
凌云壮士刻石传！
凝结血渍诗歌卷，
心吟强记不计年！

一九七七年九月廿文丁太平营
一九九七年九月重修